新建設

一九五二年　**七月號**　（總第46期）

「矛盾論」解說（一）　李　達

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榮孟源

讀「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朱劍農

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沈志遠

中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研究　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　胡　繩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　馬　特

從伏爾加—頓運河的通航想到中國的今天、明天與後天　馮雪峯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蘇・斯傑潘尼揚著　林　秀譯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矛盾論」解說（一）……………………李　達（一）

·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榮孟源（一一）

讀「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朱劍農（一三）

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沈志遠（一七）

對於目前中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研究……………………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系（二四）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胡　繩（三四）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馬　特（三五）

從伏爾加—頓運河的通航想到中國的今天、明天與後天……………………馮雪峯（四〇）

譯　文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蘇·斯伊諾尼揚著　林　秀譯（四二）

人民民主國家的新知識分子（續）……………………蘇·杜勒岩斯金著　勁　晉譯（四五）

新書介紹

介紹「歷史唯物論」……………………長　冬（五一）

學術論文提要……………………（五四）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五九）

學術簡訊

新建設　月刊

一九五二年　七月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　達　*沈志遠
*吳　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　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　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田家驥　雷潔瓊
樊　弘　*鄭　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北京前門外延壽寺街

訂　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零售每冊四千元

「矛盾論」解說（一）

李達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一〕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二〕。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說明〕「矛盾論」是論「事物的矛盾法則」的學說。它是革命行動與科學研究的指導，是認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關鍵。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是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唯物辯證法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把這個法則當作唯物辯證法的中心問題發展了。例如馬克思的「資本論」，完全地貫徹着這一法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等著作中，也發揮了這個法則的精神。但是當馬克思主義被歐洲的革命事變證明為眞理之後，資產階級就派出它的一部分代言人，以修正派的面目來魚目混珠，把馬克思主義修改成機會主義。當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和平」時期，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幹的是出賣馬克思主義的勾當。那些修正派的黨徒，如伯恩斯坦等，用新康德主義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用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而造出了他們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第二國際的領袖之一普列哈諾夫，當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期，曾經寫過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好的著作，但他並不曾了解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也不曾了解當作哲理科學看的唯物辯證法。而把對立統一的法則解釋為實例的總和。只有列寧（和他的最忠實的學生斯大林）纔護衞了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把對立統一的法則當作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來了解。他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在「關於辯證法問題」中，他又說：「統一物之分而為二，以及我們對其各矛盾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他又說：「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這樣一來，辯證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揮。」列寧基於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原理，應用對立統一法則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於帝國主義時代世界與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分析，在其經濟學、國家論及許多哲學的著作中，都充分地「解釋和發揮」了辯證法的本質、核心，表明了這對立統一法則是辯證法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有決定意義的法則。

毛澤東同志師承列寧的遺教，不但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獻，研究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吸收了現代科學上的新成就，充分地、詳盡地、明晰地「解釋與發揮」了論對立統一法則的學說，而且具體地、靈活地、巧妙地應用了這一學說於中國革命問題，建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並用親身領導人民革命的經驗，豐富了並發展了這一學說。「矛盾論」，如同「實踐論」一樣，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寶貴的理論收穫。

正因為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所以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必須涉及廣泛的方面，必須涉及許多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

也許有人要問：對立統一法則只是辯證法的諸法則之一，例如斯大林在他所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例舉了辯證法的四個基本特徵，而對立統一法則只是四個基本特徵之一，為甚麼說我們把那些關於對立統一法則的問題弄清楚了，就算是「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呢？這個疑問是容易解答的。本來，列寧在規定辯證法「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時，說「需要解釋與發揮」。關於這一學說的「解釋與發揮」，

列寧在「關於辯證法問題」、「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等著作中，對於辯證法的許多範疇和特徵，給了很多寶貴的指示，他着重地指出，只要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即對立統一法則，我們就容易理解辯證法的其他範疇特徵。他在「關於辯證法問題」中指示我們：「只有把發展看作對立的統一，才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運動』的鑰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飛躍』、『連續性中斷』、『向對立的轉化』、舊東西消滅與新東西發生的鑰匙。」斯大林綜合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提出辯證法的四個基本特徵。他指示我們：首先要用聯系的觀點去看問題，因爲一切事物都是聯系着，都互相作用，互相制約，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其次，要用運動、發展的觀點去看問題，因爲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着，發展着，舊東西必然死亡，新東西必然生長，爲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其三，要把發展看做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要看做單純量變的過程，即看做是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不要做改良主義者；最後，要把發展看做是對立面的鬥爭，無產階級爲了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斯大林是教導我們依照這樣的程序應用辯證法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但在這四個基本特徵之中，對立的統一及鬥爭，仍然是最基本的特徵。所以他說：「這種對立面的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與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與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由量變進到質變這一過程的內容。」

不離了解：事物的差別，即是矛盾，千差萬別的事物的聯系，即是矛盾的聯系；矛盾即是運動，運動即是矛盾；由量變進到質變的發展過程，舊東西死滅與新東西生長的過程，即是舊事物的矛盾統一轉變爲新事物的矛盾統一的過程。所以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貫串於辯證法的其他法則和範疇的最根本的法則，我們只要能够把關於研究這個法則的上述六個哲學問題弄清楚了，就算是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爲主要的目標。

〔說明〕蘇聯哲學界一九三〇年以來，清算了德波林派的孟什維克化的唯心論。這是哲學上列寧斯大林階段的重大事件。由於對布哈林派機械唯物論和德波林派唯心論的鬥爭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就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德波林本人原是一個孟什維克，十月革命以後，他的孟什維克的根性仍未改變。他披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外衣，却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行新黑格爾主義的修正。他認爲唯物辯證法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自然觀及歷史觀的綜合。這便是說，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加上唯物論，就是唯物辯證法。這顯然是孟什維克化的唯心論。馬克思在「資本論」序文中明白地說過：「我的辯證法不但跟黑格爾的辯證法根本不同，而且是它的直接的反對體。」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唯物論的，而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論的，這個根本的區別，是大家所知道的。德波林不但不能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反而成了黑格爾唯心論的俘虜。因此，他在他的著作中，從物質的一般論點和規定起，到論理學的構造問題爲止，都貫串着孟什維克化的唯心論。因而把唯物辯證法改變爲抽象的方法論。所以德波林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首先表現爲理論與實踐的分離，使哲學脫離政治，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復活了第二國際孟什維克的最有害的特性；其次表現爲對於哲學的黨派性的曲解，使哲學離開黨的政策與方針；其次表現爲對於哲學上的列寧階段的無理解，不能履行列寧所指示的戰爭唯物論者的任務，因而使哲學變爲與現實不生關係的、缺乏戰鬥性的概念的遊戲。因此，德波林派對於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完全缺乏理解。他們不知道「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把「對立的統一」曲解爲「對立的和解」，完全忘記了列寧所說的「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而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命題。其次，對於辯證法的範疇，則表現爲脫離具體的、個別的東西的抽象的普遍的東西；對於主要的矛盾與主要的矛盾方面，則表現爲庸俗的相互作用，（例如承認理論與實踐具有同等意義，把實踐溶解於理論之中。）由此可見，德波林派的孟什維克化的唯心論，實際上是主觀主義，是教條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

一九三〇年以前，德波林派的哲學，在中國頗爲流行。當時德波林派對於布哈林派的機械唯物論的鬥爭，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我們研究辯證唯物論的人，還不能辯別出德波林是站在孟什維克化唯心論的立場去批判機械唯物論的，因而把他看作是哲學研究的指導者。無庸諱言，德波林派的唯心論的主觀性、片面性和抽象的方法論，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內部，曾經發生了極壞的影響，使黨內出現了一些教條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分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有「理論」而無實踐，常是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去看問題，也不知道靈活地、具體地應用對立統一法則去研究客觀的革命形勢，强調矛盾的普遍性，忽視矛盾的特殊性，不能辨別主要矛盾與主要

矛盾的方面，有時把對立的統一理解爲對立的和解，而忽視對立的鬥爭，有時强調對立的鬥爭而反對對立的統一。黨內的這種教條主義，違反了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會使革命事業，遭受過重大的損失。追本溯源，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德波林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一九三〇年以後，由於蘇聯淸算了德波林，中國也展開了對德波林派學說的鬥爭。但這種鬥爭沒有很好地結合當時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未能克服教條主義的缺點。眞正能够在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晶——「實踐論」和「矛盾論」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著作。在「矛盾論」寫作的當時，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還嚴重的存在，所以毛澤東同志指導我們說：「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爲主要的目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教育的工作幹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都經常的遭遇到很多新問題。「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裏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裏就有問題。」（見「反對黨八股」）我們要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是要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爲要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就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的指示，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對矛盾的兩個基本側面加以調査研究，去理解矛盾的性質，然後進一步去分析矛盾，就問題中的矛盾作一番系統的周密的調査工作與研究工作，才能懂得問題即矛盾的所在，才能發現基於基本的兩個矛盾的側面所發生着與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矛盾的側面，就可以做綜合的工作，提出解決問題即解決矛盾的方法來。我們只有照這樣去認識矛盾與解決矛盾，才可以避免發生教條主義的偏向。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爲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爲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爲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着）。」〔三〕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說明〕我們知道，唯物辯證法是研究宇宙的一般發展法則的科學，即研究自然、社會及思惟的一般發展法則的科學，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宇宙觀。但在人類認識史上，形而上學那種哲學，也研究宇宙的發展法則，它是與唯物辯證法根本對立的宇宙觀。在唯物辯證法方面，自然與社會的發展法則是客觀的辯證法，思惟的發展法則是主觀的辯證法。主觀的辯證法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在形而上學方面，所謂宇宙的發展法則，完全是主觀的恣意的產物，是把頭腦中臆造的發展法則，注入於自然和社會的客觀現實之中的東西。因而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兩者的發展觀是完全不同的。如列寧在「關於辯證法問題」中所說，形而上學「認爲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辯證法「認爲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爲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着）。」他接着指出：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忽視了事物的自己運動的源泉，或者把這個源泉移置於事物的外部——神、主體等；辯證法的發展觀，主要的注意正是放在認識「自己運動」的源泉上。因此，形而上學的發展觀是死的、無生氣的、乾燥的。而辯證法的發展觀是生動的，只有它才能使我們理解事物的自己運動的源泉，暴露客觀事物的發展法則。關於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下面再作詳細的說明。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佔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爲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說明〕形而上學，也叫做玄學。亞里士多德曾著有「形而上學」一書，依照他的說法，形而上學是「後於物理學」的意思。在哲學史上，凡是以超出形體以上的精神、理念、神、靈魂、自由意志等爲對象的哲學，都叫做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唯心論的世界觀。在中國，孔孟學派的學說，都是形而上學，主要地支配中國思想界達二千餘年之久。在歐洲，自從亞里士多德以後，這二千多年來，基本上也是由形而上學支配着歐洲的思想界。就歐洲方面來說，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例如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十九世紀初期德國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法國唯物論者們雖也承認事物的運動，但把最單純的機械運動形式，當作普遍的運動形式。他們把運動解釋爲位置的移動，把運動解釋爲外的壓力，物體是由外的壓

力而改變其位置的。這種把力學的運動當作宇宙萬物的運動（除力學的運動外，還有物理學的、化學的、生物學的、社會的運動），把運動當作外的壓力的見解，顯然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並且，法國唯物論者，不能把唯物論應用於歷史的領域，而用唯心論的見解去解釋歷史，他們反對過去封建社會而擁護新的社會（即資產階級的社會），卻不知道新的社會與過去社會的歷史的關係，而把過去的社會認爲是人類的錯誤和愚昧的產物，因而主張根據理性來改造社會。這種半唯物半唯心的哲學，顯然是形而上學的。其次，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比較法國唯物論當然是進了一步的，但費爾巴哈因爲反對黑格爾的唯心論，卻連黑格爾的辯證法也放棄了。他不能把黑格爾的辯證法作唯物論的改造，完成自己的唯物論，所以他的唯物論是缺乏辯證法的唯物論，變爲反歷史主義的哲學。因此，費爾巴哈把他的哲學上所注意的中心的人，看做抽象的，超越時間空間的、生物學上的人，不是屬於一定社會和一定階級的實在的人，沒有社會性，也沒有階級性。這顯然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他也和法國唯物論者一樣，在歷史領域中不能貫徹唯物論，反而落到唯心論方面去了。他排斥了宗教，他把所謂友愛代替了宗教，形成了唯心論的社會觀。所以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

形而上學認識宇宙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這個方法，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時代，是人們所採用的唯一的方法。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的到科學的發展」中所說，這個方法，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人即已開始採用。直到十五世紀個別的自然科學逐漸發展的時期，這個方法就逐漸發展和鞏固下來。從這個時候起，科學家認識自然的基本條件，就是把自然界分解爲個個部分，把種種自然過程和自然物分類爲明確的種別，把生物體內部的種種形態作解剖的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傳給人們的遺產，就是使人們習慣於把自然物和自然過程從全部自然的總聯系中分離出來，而實行個別的觀察。這就是說，不在聯系上觀察自然，而在孤立形態上觀察它；不在其運動上觀察自然，而在靜止上觀察它；不把它當作根本變化的東西去觀察，而把它當做固定不變的東西去觀察；不觀察於其生，而觀察於其死。這種見解，經過培根和洛克兩人從自然科學移入於哲學時，就產生了十八世紀特有的偏狹思想，即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從此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就爲資產階級學者所通用所堅持了，因爲這些方法把宇宙萬物當作固定不變的東西去觀察的，憑藉這些方法，就可以造出資本主義制度萬古長存的理論來。

歷史的車輪進到了十九世紀以後，人類的認識史就突破形而上學的階段進到了唯物辯證法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由無產階級最偉大最傑出的領袖馬克思所創造所完成的。馬克思創造唯物辯證法，是有其深厚的廣大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基礎的。在社會經濟方面，歐洲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高度的水平。生產力的發展，呈現了空前的廣大的規模，正如「共產黨宣言」上所說，「資產階級在它不到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一切過去各時代加起來還要更衆多更偉大的生產力。」由於生產力高度的發展，資本主義就開始了「自我批判」，即自己暴露自已的矛盾，由於生產的社會性質與佔有的私人形式的基本矛盾的發生與發展，就產生了並發展了其他一系列的矛盾——工場的有計劃組織與生活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都市與農村的矛盾、佔有條件與剩餘價值實現條件的矛盾（即經濟危機）等。那基本矛盾的發生與發展，在社會集團中的表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即階級鬥爭的發生與發展。例如：一八一六年，英國勞動羣衆，演出了破壞機器的大暴動；一八一九年，英國曼徹斯特勞動者，在要求選舉權的名義下，舉行了一次大示威運動；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四年，法國里昂勞動者舉行了兩次大暴動；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二年，英國憲章派的勞動者舉行了最初的政治的鬥爭；一八四四年，普魯士西列吉亞紡織工人開始了第一次的暴動。這些次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表明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剝削的反抗，他們已由自在階級轉到自爲階級了。在自然科學方面，十九世紀以來，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都建立了一定的體系。這些科學，對於辯證法供給極豐富的日見增加的材料，表明了「自然是辯證法的證明」（恩格斯語）。在其他意識形態方面，有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有過「勞動價值說」的偉大發現（雖然只是一個端緒）；有英法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批判了資本主義，暴露了它的罪惡（雖然它沒有認識階級矛盾的本質，沒有認識無產階級的動力）；有德國的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把自然界、歷史界、精神界的全部，當作不斷的運動、變化、變形、發展的過程去考察（雖然它的辯證法是唯心的，必須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總起來說，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的暴露，階級鬥爭的發展，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上的成就，證明了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發展，並不是形而上學的，而是辯證法的，即並不老是演着同一的循環，而是創造着現實的歷史。因此，「關於宇宙及其發展、人類的發展，以及那些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關於這些，如要得到精確的概念，只有依靠辯證法的方法，經常地考察到成長與消滅、進步的變化與退步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的相互作用」（「社會主義從空想的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的哲學的實踐的活動，

首先是從社會的‖歷史的領域開始的，即是從政治的‖實踐的領域開始的。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認定無產階級是社會革命的偉大的動力，首先闡明了歷史領域中的辯證法，再由歷史的辯證法進到自然辯證法，而在革命的實踐上把兩者統一起來，創造了唯物辯證法，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的武器。

唯物辯證法創立以後，引起了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因爲在唯物辯證法面前，腐朽的資產階級的勢力雖然龐大，却是必然要消滅的，新生的無產階級勢力雖然微小，却是必然要成長與壯大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爲社會主義社會所替代。所以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就採用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來對抗唯物辯證法，此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來對抗唯物辯證法。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是唯物辯證法的公開的敵人，我們容易辯認它。至於庸俗的進化論，却僞裝着自然科學的面貌，容易混淆人們的視線，我們必須揭破它。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爲，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爲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覆地產生爲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爲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爲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四〕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爲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爲資產階級所擁護。

〔說明〕資產階級爲了對抗唯物辯證法，仍舊採用了早已過時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庸俗進化論，也是採用這個方法考察世界事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再用恩格斯的話概括起來，就是「它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的互相聯系；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見它們的產生與消滅；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態，而忘記了它們的運動；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做一句話說，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第一，是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作各自孤立而不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的東西，它認爲研究事物應當一個個的去研究。例如庸俗進化論者魏士曼，把生物體和它所生活的環境隔離開來，主張生物體永遠不受環境的影響，並且生物體的遺傳性，還與生物體本身無關，而是寄託在種質上面。種質是獨立存在的，外界環境與它不生關係，它是永生不變。因而一切生物和它們的遺傳性都是彼此孤立而互不相涉地生存着。第二，它認爲地球上一切形態和種類的動物、植物和人類，都是開天闢地以來永遠如此，永遠不變的。例如魏士曼的種質連續說，主張生物體內有種質和體質的兩種東西，各有不相聯系的物質和功用。他認爲種質是獨立存在的，種質可由生殖細胞傳達於後代，並且親體的種質與子體的種質連成一貫，子代的種質早已存在於親代的生殖細胞中，不折不扣地遺傳下來，就是說，子代的種質即親代的種質。照魏士曼的主張，生物體適應環境的變異是沒有的。一切生物的種類和性質，是永遠相同的。至於生物的變化，只是單純的增長，是生物體原有的特質因取得外界營養而長大的結果。第三，它把局部的、片面的理解，推及於宇宙全部的理解。例如現代的機械唯物論者，仍把力學的運動，看作是一切自然和社會的存在的運動。又如庸俗進化論者，把關於生物界的不正確的見解，來說明社會現象。例如魏士曼主張生物體內部淘汰說，說細胞組織與原生質之間行着生存競爭，好像各生物個體行着生存競爭一樣。於是把生存競爭說，搬到社會領域中來應用，藉以證明資產階級的鬥爭及競爭的必然性。依照這種見解，社會羣鬥爭的結果，必然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帝國主義對於落後民族的統治與剝削，正是天演公例。這是魏士曼主義或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社會法西斯主義。總起來說，形而上學家的見解，是主張世界一切東西，都是各自孤立的，都是永遠不變的。縱使說有變化，那也只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一種事物只能反覆地產生爲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爲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形而上學家，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認爲社會制度，從世界有人類以來，直到現代，都

是相同的。他們把資本解釋爲謀生的工具，而謀生工具，在世界開始有人類的時候就有了的。原始時代有漁人，他的謀生工具是釣竿；有獵人，他的謀生工具是弓箭。這釣竿和弓箭，就是原始人的資本。可見資本主義從原始時代以來就有了的，因而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從原始時代起，經過奴隸制時代、封建時代，直到資本主義時代，都是同樣存在的，並且在將來的社會主義時代也會同樣存在，因爲那時代的人類也要有謀生工具即資本，所以私有財產制是萬古長存的。他們也會承認人類社會是有發展的，譬如說世界人口逐漸增加了，物質生活逐漸豐富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規模比較原始時代擴大了。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社會的發展。社會爲什麼有發展？其原因何在？形而上學家的答覆是：社會發展的原因，不在社會的內部，而在社會外部的地理環境中。這原是地理學的環境觀，資產階級初期的學者們早已發表過了。地理學的社會觀，主張世界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由於地球經緯度的不同，由於海洋、河川、平原、山地、氣候、土壤等等的不同，就產生出各民族不同的特性、風俗、習尚、宗教和經濟狀況，因而形成了各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同的程度。這種社會觀，其用意在於說明自然環境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而在社會以外的自然環境中，去探求社會發展的原因。這種社會觀，在資產階級中，流傳已久，影響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曾創立了所謂「地理政治學」作爲法西斯的理論，說一切國家的政策，要由其所領有的自然財富的欲望所決定，鼓吹殖民地的奪取，是滿足這種欲望的手段。這種社會觀，也還影響於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譬如考茨基、普列哈諾夫、和布哈林關於歷史唯物論的曲解，都感受了這種社會觀的影響，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唯物辯證法，主張事物發展的原因是因事物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學家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爲了對抗唯物辯證法，偏要單純地從事物的外部去找尋事物發展的原因，因而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也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爲他種質的現象。這種見解顯然是反科學的。科學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由於量的發展而引起質的變化，這就是突變。同樣，社會也經由量變而引起質變，這就是革命。所以唯物辯證法認爲「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經過緩慢變化，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家否認事物的質變，等於否認革命，否認階級鬥爭，來擁護資本主義制度。關於宇宙萬物絕對不變的思想，在歐洲方面，有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舊機械唯物論，在二十世紀有現代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有庸俗進化論，這些都是擁護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動理論。在中國方面，從古就有儒家所主張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學說，長期地爲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舊的和新的機械唯物論，以及魏士曼、孟德爾、莫爾干等的庸俗進化論，都先後輸入到中國來，則爲資產階級所擁護。宇宙觀的黨派性、階級性，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着和互相影響着。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爲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爲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着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爲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

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爲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爲雞子，因爲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着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爲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着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說明〕與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世界是一切物質的物體及其現象的互相聯系、即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着的統一整體的發展過程。一切事物在聯系中發展着，在發展中聯系着。我們認識任何一個事物，首先要考察它與其周圍的許多事物的聯系和差別，確定它與其他事物不同的質，指出它與周圍條件的關係。否則如果用孤立的方式來考察某一事物而不考察其與周圍條件的關係，我們就決不能認識這一事物。

其次，這一事物與其周圍的許多事物聯系的發展着，它本身也是發展着的。我們必須考察它由一種運動形態發展到別種運動形態的過程，由一種質轉變爲別種質的發展過程，並進而追求它的自己運動的源泉，自發的發展的源泉。這自己運動或自發的發展的源泉，不在這一事物的外部，而在這一事物的內部，這即是它本身內部所包含的矛盾性。世界任何事物，絕對沒有不具有內部的矛盾的。從原子起，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最複雜的現象，到人類的思惟爲止，一切事物或現象，都各具有其內部的矛盾。事物內部的矛盾，即是事物的自己運動的、自發的發展的源泉。正因爲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纔能引起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雖然一個事物處於它與周圍許多事物的聯系中，它的發展不能不受周圍條件的影響，但這種外部的影響，只能是它的發展的次要的即第二位的原因。例如生物體，只因爲它內部有新陳代謝，細胞不斷的更新，所以它能吸收外界的營養而自發的發展起來。假使它本身沒有新陳代謝，沒有細胞不斷的更新，縱有良好的環境，它決不能有發展，這是很明白的。唯物辯證法這種發展觀，強有力地粉碎了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即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所主張的外因論或被動論。不難了解，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只能表明事物的範圍擴大了或縮小了，或者在數量上增加了或減少了，却決不能說明事物的質變。因爲形而上學那種只講數量的增減的學說，是從機械學的觀點產生的，機械學只研究對象的速度、數目和容積，至於事物的千差萬別的性質，事物在其運動的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的變化，機械學是不能說明的。

在唯物辯證法看來，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明，「矛盾本身就是運動。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置移動即是矛盾。因爲移動着的物體，很難確定它在一個地方。它在同一的刹那時間，處在一個地方，同時又處在另一個地方。不斷地設立矛盾，又不斷地解決矛盾。這就是運動。」又如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如米邱林所證明，生物體與周圍的生活條件是密切聯系着的。陽光、空氣、溫度、濕度、養分等外圍的生活條件，固然能夠助長生物體的發展，但這些外圍的生活條件，是通過生物體內部的代謝作用（即矛盾）而起變化的。生物體不斷吸收外界的物質，組成爲自己身體中的物質，並且又分化出簡單的物質，把它排出於身體之外。所以生物體雖由於吸取外界的物質而成長，但仍是通過生物體內的代謝作用而顯現的。

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人類社會生存於自然環境中，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對此，不能予以輕視。但就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環境的關係的歷史來看，這種歷史是人類社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環境是演着主導作用的。所以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社會本身之中，不在外圍的自然環

境之中。例如歐洲許多國家，地理與氣候條件是相同的，但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年以前曾經是受着帝國主義侵略的落後的國家，現在快要進到社會主義了。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從前稱霸歐洲，現在則變爲美帝國主義的附庸了。三十多年前的蘇聯，還是沙皇主義統治着，現在快要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了。從前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後來變成帝國主義者，現在則變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朝鮮和越南的人民，不過幾年，都脫出殖民地的狀態，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國家了。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中國在百多年以前還是獨立的封建國家，一八四〇年以後，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現在已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了。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固然，地球和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着的，但其變化的顯現，動輒以若干萬年爲單位，而人類社會的變化則是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所以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不在地理環境之中，而在社會本身之中。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見解，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所以原始社會由奴隸制社會所替代，奴隸制社會由封建社會所替代，封建社會由資本主義社會所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由社會主義社會所替代。

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不但不排除，而且還對外部的原因給以正確的估價。如前面所說，一個植物體，生長於外部自然環境之中，空氣、陽光、溫度、濕度、養分等，是助長生物體發展的原因之一，這是無可否認的。但這些外部的生活條件，必須通過這植物體本身內部的新陳代謝作用，纔能生長起來。它發芽，它開花，它結子，要經過幾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這些質變，完全是它本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又如這一植物體，若處於變化了的生活條件之下，它本身也必發生變異，它既有變異，同時也能遺傳，它就能夠把變異的性質鞏固下來，遺傳下去，以後如再發生變異，就再度遺傳下去。這類的變異與遺傳，根本上是它本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又就社會來說，自然環境是社會的糧食倉和材料庫，它當然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原因之一。在原始社會的最初期，人類的生產技術非常幼稚，完全受自然環境的支配。但當生產技術逐漸進步，從事於農業和畜牧業以後，人類就能再造自然，從此社會內部的矛盾，就成爲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自然環境的力量只是第二位原因了。當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適應於生產力的水平時，社會就能充分利用自然的資源，增加物質的財富，社會就能向前發展。反之，當社會的生產關係障礙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停工減產，不能照舊利用自然的資源，就必須改革生產關係（即革命），纔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唯物辯證法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就國際關係來說，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影響是時常存在的。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當一個國家發生了重大的事變時，世界各國都要引起重大的變動。例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單是開闢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一聲砲響，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爆發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間的矛盾爆發了。在歐洲方面，有德國、奧、匈和意大利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在亞洲方面，有五億人民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殘餘的許多帝國主義者都嚇得發抖了。十月革命在國際上的影響是空前巨大的。在這裏，要着重指出的，中國的人民革命，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全是事實。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白說過，中國革命是「走俄國人的路」的。但是否可以由此引出「革命外因論」，說中國革命完全受了十月革命的推動呢？這個論調顯然是不正確的。十月革命的影響，是通過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作用的。中國的先進份子——共產黨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了中國社會，正確地認識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即中國必然要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人民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共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眞理。所以，中國革命的變化的內因，主要地是人民大衆與統治階級、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人民大衆推翻了統治階級、中華民族驅逐了帝國主義的結果。有的頑固派，素來反共反革命，便揑造出所謂革命外因論，說中國從秦漢以來，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是很美滿的社會，只因爲辛亥革命把倫理本位搞壞了，所以引起了大混亂。頑固派硬說中國早已不是封建社會，現在更不是甚麼半封建；中國仍是獨立國，現在並不是甚麼半殖民地；中國從古只有分業，沒有階級，更沒有階級鬥爭。因此，據他們的說法，最好的改良的方法，就是在蔣匪幫統治之下，從鄉村建設入手，建立新倫理本位的社會就行了。照他們的說法，中國共產黨在沒有階級的中國社會中來分裂階級，製造階級鬥爭，是完全受了俄國革命

的影響。頑固派一向是用這種反動的見解作爲反共反革命的論據的。頑固派直到革命已經勝利而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以後，仍然不相信新政權能夠持久，採取觀望的態度。到了最近，全國廣大人民狂熱地擁護着新政權，人民民主專政越來越鞏固了，頑固派感到驚奇，却還歪曲地說中國共產黨分裂階級，製造階級鬥爭的路線走對了。這種革命外因論，徹頭徹尾是反動的。

再就戰爭舉例。第三次國內戰爭，在初期，美蔣匪幫軍隊有四百五十萬人，無論人數、地盤、物質條件，都比人民解放軍爲優，所以它得以暫時占居優勢，對解放區實行戰略的進攻。而人民解放軍，不能不忍受痛苦，實行戰略的防禦。如果人民解放軍方面，在這時沒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揮，是可能戰敗的。但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所進行的戰爭是人民革命的戰爭，並且有無比英明的指揮，終於通過美蔣匪幫軍隊反革命反人民這個弱點，起了「我軍越戰越強，敵軍越戰越弱」的作用。如果美蔣匪幫不是與人民對立，不是本身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頂，則人民解放軍雖強，就不易把它打倒；又，如果不是因美蔣匪幫犯了大錯誤來發動內戰，深深陷入解放區的陷阱，遭受越來越大的困難，並且連續在指揮上犯了大錯誤，則人民解放軍雖強，美蔣匪幫之失敗與顛覆，就不會那樣的快。可見在軍事上，也是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

「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頭堡壘」，而「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四三九頁）。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是蔣介石匪幫大資產階級戰勝了無產階級的結果。但當時無產階級先頭堡壘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如果沒有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集團，放棄了革命領導權，放棄了武裝鬥爭與土地改革，敵人是不容易攻破這個先頭堡壘的。這一次的失敗，顯然是外因通過內因，起了作用。所以，當黨清算了陳獨秀派的機會主義，建立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重整了黨的陣容時，中國革命就踏進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時期。但在這個時期中，黨內又發生了冒險主義，左傾機會主義者把黨的革命事業領導到錯誤的方向，以致授敵人蔣匪幫以可乘之隙，使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但到遵義會議以後，這冒險主義的偏向得到了糾正，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我們的革命事業，就重新發展起來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中國人民的革命與建設的事業，永遠在勝利中前進着。

說到這裏，我們要聯系到最近的「三反」鬥爭和「五反」鬥爭。新國家成立以來，資產階級曾經表示願意遵守「共同綱領」，願意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的搖搖欲墜的私營經濟在國營經濟的領導與扶助之下，呈現着欣欣向榮的氣象。他們對新國家也曾付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剝削鞏棄、不勞而食、損人利己、唯利自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等思想，便發展起來成爲五毒思想了。於是他們便違反「共同綱領」，反抗工人階級的領導，更進一步要篡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他們也懂得了堡壘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道理，便撒佈某些缺乏財經工作經驗而犯了官僚主義的幹部，誘引某些容易接受糖衣砲彈的在農村工作過的幹部，並利用某些供他收買的新幹部和舊人員，使用「拉過去」和「派進來」的惡毒方法，向着黨和政府機關進行猖狂的進攻，使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遭受了不可計量的損失。但是，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着的黨，是經過了三十多年革命鬥爭鍛鍊了的黨，是永遠不被攻破的工人階級的先頭堡壘，縱使有絕對少數被「派進來」和被「拉過去」的壞份子，也是很快地要遭到清算的。同時，千百萬的工人階級，是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徹底性的階級，他們有充分的勇敢和機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所以全國各地「三反」鬥爭和「五反」鬥爭的偉大勝利，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在新民主主義時代，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實行着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只要資產階級清除了五毒思想，遵守「共同綱領」，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必然團結他們，幫助他們，發展他們的於國計民生有利的事業。「五反」鬥爭以後，各地私營經濟事業的新氣象，便是明證。這樣看來，一個革命的政黨，要領導革命得到勝利，就必須依靠自己的政治路線的正確、和它的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着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此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却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說明〕斯大林說過：「辯證法是源於希臘文『Diolego』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眞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爲思惟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衝突，是發現眞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惟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成了認識自然界的辯證方法……」（見「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周秦諸子的學說中，有不少關於辯證法的見解。例如老子的「道德經」，惠施學派的「合同異」學說，公孫龍學派的「離堅白」學說，易傳的「陰陽」學說，墨子學派的「墨經」等，都含有辯證法的要素。在歐洲方面，古代希臘的哲學中，有很多辯證法的學說。例如伊奧尼亞哲學家塔列斯，說水是萬物的發端，連生命也是由水發生的。這種見解的根柢，是認爲一切物質都是單一的東西，都可以互相轉變。這是歐洲最初的唯物論，也包含了辯證法的萌芽。又如赫拉頡里圖，用「萬物變動不居」的命題，表示他的動的宇宙觀。他又用「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這個比喻說明自然界及人事界的一切變化。至於變化的原因，他主張一切變化是在矛盾中進行的。他說「鬥爭是萬物之父，萬物之王」，這是辯證法的根本思想。不過古代的辯證法帶着自發的樸素的性質，因爲當時的自然科學並不發達，並且受了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還不可能創造出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在歐洲古代，在上述唯物論的樸素的辯證法之後還出現了唯心的辯證法。亞里士多德的論理學，到處都提起了辯證法的問題，研究了辯證法的思惟形式。强然他的哲學是唯心論，他的論理學是形而上學的，但對於意識的辯證法的構成，對於論理學，却留下了不朽的功績。歐洲到了中世紀以後，哲學變成了神學的奴僕，思想界完全受了形而上學的支配。直到十五世紀以後，資本主義經濟逐漸發達，自然科學的研究，不斷地暴露了自然的辯證法。從此歐洲的許多哲學家，如笛卡兒、斯賓諾莎、康德、菲希特、謝林等，對於辯證法都做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唯心論的基礎上，集辯證法之大成的哲學家，要推黑格爾。不過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論的，並且還受了他自身的和當時的知識範圍所限制，所以他的唯心論的，並且仍是形而上學的辯證法，把一切事物弄得顚倒，把世界的眞實關係弄得顚倒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爲階級鬥爭的實踐創造了精神的武器。他們首先在革命的實踐的基礎上把唯物論從自然領域擴張於歷史領域，綜合了人類知識史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即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創造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從此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這個偉大的理論——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論，經過列寧和斯大林的發展，內容更加豐富了。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了中國，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無產階級先進份子就用它作爲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造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前進。毛澤東思想，正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歷史中的應用與擴大。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敎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了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說明〕我們學習辯證法，主要地是要善於應用矛盾法則，考察我們在革命與建設事業中所遭遇到的問題中的矛盾。首先對於問題要做詳細調查研究工作，指出矛盾的所在，理解矛盾的性質，認識其運動的方面，再進一步作系統的周密的分析，了解問題的面貌，然後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這樣，任何新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們能够深刻地掌握着事物的矛盾法則，我們就決不會向困難低頭，任何橫在我們前面的矛盾，都可以靠我們堅決的信心和毅力去克服它。所以具體地了解這一法則，對於我們革命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蘇聯紀念斯大林語言學論文發表兩週年

六月二十日是斯大林的著名論文「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發表的兩週年紀念日。爲紀念這篇天才著作在蘇聯科學界所發生的偉大影響，蘇聯科學院特從十八日起舉行科學會議，會期四天，與會者將聽取十二個報告。出席會議的有蘇聯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作家等。在開幕會上，蘇聯著名的語言學家維諾格拉多夫院士發言指出：斯大林的偉大著作的出版，不僅給語言學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而且對於解決其他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也有極大的裨益。

兩年以來，蘇聯大量出版了斯大林的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現在這些著作已經用蘇聯各民族的三十八種文字印行了八十七版，總計八百多萬冊。蘇聯科學院出版局已刊印了若干種關於語言學各重要問題的基本研究書籍。國立教科書出版局已發行了一億三千八百萬冊按照斯大林的論點編成不同文字的教科書。知識出版局已刊印了十五種關於語言學各種問題的普及小冊子共一百五十多萬冊。

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榮孟源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主席的報告。讀過之後，就個人所能瞭解到的幾點，箚記如下：

一

毛主席教導我們，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

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就是發動侵略戰爭。這種侵略戰爭，不但是損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損害其本國人民的。因此，「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

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只有保衛祖國，打敗侵略者，中華民族才能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這就是我們的愛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一開始，就領導羣衆進行抗日鬥爭；九月二十二日正式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隨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地工農政府和紅軍都相繼發表抗日宣言，東北共產黨員更組織抗日武裝（後名抗日聯軍），直接與日寇搏鬥。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命令紅軍改編爲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綫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綫，爲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

各國人民大衆的眞正的愛國主義與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這樣眞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偉大的祖國和人民、對於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乃是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並主張各國人民的友愛團結。這與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排外的、煽動各國人民互相敵視和仇恨的民族主義毫無相同之處；也與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的使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的閉關主義毫無相同之處。當時有的人搞不明白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爲什麼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還有一撮反革命分子汚衊中國共產黨堅決領導抗日戰爭爲拋棄國際主義。毛主席斥責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人「這些愛國主義的行動，都是正當的，都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塗的人，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才會瞎說我們做得不對，瞎說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二

毛主席教導我們，堅持統一戰綫和堅持黨的獨立性。

統一戰綫，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之一。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毛主席說：「爲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

當抗日戰爭初期，有的同志還不很了解「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爲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爲了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路綫，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綫」。因此，表現爲「左」傾關門主義。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曾提出了「『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在本文中更明白地教導大家說：「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爲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總之，「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

防止「左」傾關門主義，防止把獨立性認爲是絕對的而破壞了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不是抹殺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抗日戰爭初期，在統一戰綫問題上一些同志所犯的錯誤，主要是右傾遷就主義的錯誤。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綫」，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綫』」，那就是遷就蔣介石集團，拋棄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七七」事變以後，蔣介石集團被迫抗日，被迫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可是他就在那時定

下了「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毒計。雖則，蔣介石集團也和日本侵略者打過幾個回合，可是，他同時又和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接洽投降。蔣介石集團不只在宣傳方面汚衊和侮辱共產黨，而且在某些地區更繼續向共產黨進攻（如將閩粵邊區域何鳴同志所率領的千餘游擊隊包圍繳械等事），阻止共產黨在敵佔區收復失地，還企圖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民主制度。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支持的，一九三九年上海報紙說：「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投降）了。」如果中國共產黨放棄了獨立性，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區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不能鞏固和擴大，抗日戰爭的勝利也無從獲得。毛主席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指出：「『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在本文中更明白地教導大家說：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毛主席批判了關於統一戰綫問題上的遷就主義的錯誤，指出了在統一戰綫中有團結又有鬥爭的正確原則。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所發生的國內事變，完全證明了毛主席所說的這個眞理。中國共產黨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在統一戰綫中堅持又聯合又鬥爭的革命政策，放手發動人民大衆，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抗日力量，穩住了動搖者，孤立了頑固派，打退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幾次反共高潮，因此，也就堅持了抗日戰爭，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三

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有羣衆觀點。

在本文中毛主席根據中國革命的實貴經驗，把中國共產黨的高度的無產階級嚴肅性和密切聯繫羣衆的正確的組織路綫各方面，作了具體而扼要的闡述，特別是以密切聯繫羣衆的原則來教育每一個革命者。

毛主席所要的幹部，是從羣衆革命鬥爭中產生的，而不是像一些知識分子所想像的「天才」或個人英雄。毛主席說：「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鬥爭中，已經湧出並正在繼續湧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

毛主席所要的幹部，是和羣衆有密切聯繫的，而不是像一些知識分子所想像的那樣，只憑著他個人的知識，他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總之他只憑自己個人的品質，才可獲得相當意義的人。毛主席說：「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綫，服從黨的紀律，和羣衆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爲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綫。」毛主席反複地教導大家說：「共產黨員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衆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羣衆的利益。」「共產黨員又應成爲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衆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衆的學生。」

毛主席所要的幹部，是能緊密地團結多數的，而不是像一些知識分子所想像的那樣，不尊重多數，而一味强調個性表現和個人興趣爲首要的工作條件的。毛主席說：「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羣衆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於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羣衆之間的密切聯繫。」「共產黨員對於落後的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在長期戰爭和艱難環境中，只有共產黨員協同友黨友軍和人民大衆中的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揮共先鋒的模範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爲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毛主席所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問題，當是羣衆觀點。

四

毛主席教導我們，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從五四運動起，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較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二十年間（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八年），中國工人階級及共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確是日有進步。但是直到抗日戰爭初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還不很普遍，不很深入，一部分革命同志還把它當作教條看待。因此，毛主席不只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而且著重地指出：「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眞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

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和我國的歷史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來實現。我們中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可是對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並沒有加以總結起來。當然，帶有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意識的史學工作者是不可能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歷史的，祇有從「五四」運動以後，共產主義的史學工作者才提出了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如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等文），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績（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書），但是這僅僅是開始，是很不够的。因此，毛主席指示我們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又指示大家通過學習中國歷史，「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同時，我們「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有了革命的理論，有了科學的歷史知識，如果沒有對於當前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不知它有什麼特點，它有什麼規律性，那麼還是不能指導這個運動，所謂革命理論和歷史知識還是教條和空談，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毛主席指示我們，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他這樣說：「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 。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眞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 * *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內容是很豐富的，上述幾點，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對於毛主席的這篇文章，還須作更深入的研究。

讀「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朱劍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的中日戰爭，把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矛盾，提高爲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種尖銳的民族矛盾形勢之下，自然顯示了「中國人民，是處在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但是，誰是我們的朋友呢」？（「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以下引文凡未註明來源者均是引自此文）毛澤東同志在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前一天，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寫了一篇「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論文；第二天「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又給這個問題作了許多精闢的說明。這就給我們指出了當時我們能够交接到的朋友有兩類：一類是口稱同情我們的朋友，另一類是眞正同情我們的朋友；指出了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斯大林所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指出了斯大林是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指出了我們要擁護斯大林和學習斯大林。這個指示，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對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都是極其有益和正確的。

口稱同情我們的朋友和眞正同情我們的朋友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矛盾，雖然提高到主要矛盾的地位，但是國內的階級矛盾並沒有消滅，而是依然存在着；當時國際形勢的另一方面，也還依然存在着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而帝國主義當中，也還存在着英、美、法帝國主義集團和德、意、日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

國內依然存在着的階級矛盾，表現在抗日戰爭中存在着兩條相反的路線，即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和以共產黨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的革命路線。

帝國主義國家與蘇聯的矛盾，表現在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反蘇陰謀，特別是表現在日本不但侵略中國，並向蘇聯一再挑戰，企圖偷襲蘇聯，並以這種姿態來誘惑執行反蘇政策的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向它讓步。

德、意、日帝國主義集團與英、美、法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表現在日

本對中國的侵略，奪取了英、美在中國的利益；表現在德、意與英、法之間戰爭的爆發。

在這樣各種矛盾相互交錯的國際形勢之下，當時經歷兩年多艱苦抗戰的中國，歡迎國際友人的援助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應該歡迎什麼樣的友人來幫助我們，究竟什麼人才能够眞正幫助我們呢？

驟然一看，當時的英、美，好像也跟蘇聯一樣，是中國的朋友，其實，決不能將他們這樣等同看待，應該是有根本不同的原則性的區別。

「一類所謂朋友，他們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國人中間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稱他們做朋友。但是這種朋友，只能屬於唐朝的李林甫一類。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個有名的被稱爲『口蜜腹劍』的人。現在這些所謂『朋友』，正是『口蜜腹劍』的朋友。這些人是誰呢？就是那些口稱同情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另一類朋友則不然，他們是拿眞正的同情給我們的，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這些人是誰呢？就是蘇聯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這是毛澤東同志十三年前的指示，後來的事實完全證實了它的英明正確。因爲抗戰初期的事實，正如當時一個刊物的記載所說：「那時，蘇聯正在不聲不響的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軍火、汽油、卡車自西北源源而來，蘇聯健兒無聲無息地血洒長空，參加保衛中國。這前後美國還在以廢鐵裝備日本，英國則封閉滇緬公路，窒息中國。」（轉引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二〇二頁）所以，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時期，英、美帝國主義者便掀起了「不斷敦請中國議和」，準備犧牲中國和日本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法西斯德國對英、法的戰爭爆發以後，英、美帝國主義更希望趕快犧牲中國以求得和日本的妥協，而使日本不跟希特勒一起去反對英、美。

不用說，當時英、美集團在遠東的政策，表面上雖是同情中國，實際上是在援助日本侵略者；實際上並沒有給中國任何援助。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帝國主義爲了要把自己的勢力進一步伸入中國，企圖在戰爭結束後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市場，並使中國變爲其殖民地。因此，它才窮兇極惡地來維持甘充其走狗的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派了大批軍官來訓練和武裝蔣匪的反人民的軍隊，派了大批「專家」滲入蔣匪的反人民的政府，先後撥給蔣介石匪幫四十三億美元的巨額物資，以援助蔣匪幫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即使至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在全國大陸上已經獲得徹底勝利的今天，美帝國主義仍然橫蠻無恥地霸佔着我們的台灣。最近，還變本加厲地用軍用飛機侵入我國領空，撒佈細菌來毒害中國人民。

這樣鐵證如山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些帝國主義者，也像李林甫一樣，都是一些「口蜜腹劍」的朋友嗎？

從這許許多多事實當中，難道還不明白蘇聯的人民，蘇聯人民的領袖斯大林是眞正同情我們的朋友嗎？因爲斯大林不管是在抗日戰爭的初期和末期，不管是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的建設時期，都以弟兄般的熱愛，給予中國人民極其巨大的幫助和極其有力的鼓舞。

什麼理由使得斯大林對我們能够表現爲弟兄一般的友誼，張伯倫、杜魯門對我們則表現爲「口蜜腹劍」的惡毒的陰謀呢？

這理由很簡單，因爲，「資產階級……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之外，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系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同時，「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原料來源的鬥爭愈緊張，於是爲佔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帶拼命的性質」。（列寧：「帝國主義論」第六章）所以，「資本主義變成爲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卑劣本質，儘管張伯倫、杜魯門可恥地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然而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帝國主義者都是『口蜜腹劍』，張伯倫就是現在的李林甫。」（「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在延安慶祝大會的講話」）我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來看，由於帝國主義反動陣營的領袖，已經由張伯倫變爲杜魯門，所以杜魯門就是今天的李林甫了。

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呢，情形就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根本地改變了愛國主義、祖國的概念。現在在蘇聯，對於蘇聯人來說，熱愛祖國，保衛祖國，是與保衛社會主義一致的。這是新的最高類型的、擺脫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是與尊重一切民族，尊重他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尊重他們的自由和獨立分不開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眞正民族利益與全世界勞動者的國際利益，最深刻地結合了起來」。（尤金：「論蘇聯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

這是蘇聯人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實質，因爲蘇聯人民具有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高貴的品質，因爲「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所以事實又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他們是拿眞正的同情給我們的，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這些人是誰呢？就是蘇聯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在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所有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廣大人民，都遭受着

空前的貧困和苦難。這些貧困和苦難的根源，都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血腥統治和殘酷剝削所造成的，但是帝國主義者爲了表示對於被奴役者的僞善，同時也爲了進一步對他們進行奴役，就不斷地利用着各色各樣欺騙性的盟約和僞善的援助來推行他們的擴張政策。「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因爲「馬歇爾計劃」給予歐洲各國的，不是經濟復興，而是歐洲的各種原料之被剝奪，這樣就將歐洲資本主義捆縛到美國所統治的單一經濟體系的繩索上去了，這樣就給歐洲各個小國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和危機。至於「北大西洋公約」的性質，更盡人皆知它是直接準備新侵略戰爭的工具。

現實的教訓是最好的教育。五六年來嚐盡苦難的西歐各國人民，一方面固然認識到帝國主義者所作所爲的反動本質，同時也眼看着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眼看着蘇聯戰後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眼看着世界革命導師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他們已逐漸清醒過來，認識到帝國主義者之可恨與可鄙，也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方向、斯大林所指示的方向及其給予人類的貢獻是無比的偉大！

全世界的廣大勞動人民，愈來愈確信：資本主義已成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阻碍。只有遵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才可以給勞動人民的物質幸福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顯示出光明的遠景。

列寧和斯大林所領導的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產階級破天荒第一次在一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裏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並使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

當然，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與列寧、斯大林的英明領導分不開的。由列寧所發展並由斯大林所豐富了的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對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具有着極偉大的意義。

但在現在，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一個斯大林，那一個來發號施令呢？這眞是幸事，現在世界上有了一個蘇聯，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了一個斯大林，這世界的事就好辦了。革命指揮官幹些什麼事？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而要這樣，就要領導十幾萬萬人向壓迫者作鬥爭，而使之得到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斯大林要辦的事。」（「在延安慶祝大會的講話」）

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在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蘇聯已經變成強大的工業國家與集體農業的國家，蘇聯人民早已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他們那種愉快、幸福的生活，已經不是從前的生活所可比擬了。

斯大林所領導的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對粉碎希特勒侵略集團所起的決定性的作用，急劇地改變了階級力量的對比，從而能在戰爭後期和在戰爭結束之後，立刻樹立了革命力量的優勢，並且削弱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正是這樣的事實，才成爲產生東南歐和德意志等人民民主國家的決定性的前提。

蘇聯紅軍在擊潰了希特勒匪軍之後，接着就幫助中國人民消滅了日本侵華的關東軍，並幫助北朝鮮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還必然地會援助將來其他國家其他民族中間可能發生的人民解放的戰爭和民族解放的戰爭，還必然地會援助有利於保衛和平的戰爭」。（毛澤東：「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

所以毛澤東同志十三年前所指出的：「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在今天來說，已經有了許多更生動的事實可以作證了。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導師和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導師和朋友」。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經指出：「中國革命運動底力量是不可計量的。這些力量還沒有恰當地表現出來。它們將來還會表現出來。……誰要是現在和將來不估計到這個力量，誰就一定要失敗的。」（「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斯大林在我們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末期，對中國革命性質、中國革命領導權與中國革命中的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形式等問題，高瞻遠矚地告訴我們：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也是民族解放革命，其刀鋒是對準着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與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作鬥爭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國革命中起嚴重的作用。因此，中國革命是與各國無產者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直接啣接着的。」（「論中國革命底前途」）同時，「中國革命倡導者和領導者底作用，中國農民領袖底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同上）「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以克服民族資產階級底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底軌道上」。（「中國革命問題」）「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快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愈有力和愈強大。……應當立即從講話轉到行動，提出現在滿足農民最緊要的要求的問題」。（「論中國革命底前途」）所以，「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革命底特點之一和優勢之一就在於此」。（同上）

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這些理論上的偉大啓示，對於中國革命的實踐，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是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泉源之一。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已經勝利地完成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這與斯大林二十五六年前在革命理論上所給予我們的啓示和幫助是分不開的。毛澤東同志的話完全正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家、勞動者，才能眞正援助；而我們的事業，沒有他們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的朋友。」

斯大林不只是在革命理論方面給了中國人民很大的幫助，而且還給了中國人民許許多多物質上的援助。

十月革命後，蘇聯立即宣佈廢除舊俄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有一個國家把它們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

中國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聯派了軍事顧問團和軍用物資來援助我們。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我國東北，首先支援我國的是蘇聯，並且蘇聯第一個向日本提出了警告。

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第一個積極援助我國的又是蘇聯；自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之間，蘇聯援助我國抗戰的物資，大大地超過了美、英、法等國援助我國的物資總數。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一舉消滅了近百萬的日本關東軍，終於協助我國最後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了我們的東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又首先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五〇年二月，和我國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外並訂立關於貸款、經濟合作、貿易等協定。

以上所提到的，祇是蘇聯幫助中國人民的一些最明顯的事實。蘇聯的這些援助，都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進行的，這又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在過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理論上指導世界革命。現在加上一點東西，可以在物質上幫助世界革命，這就是斯大林的功勞。……使中國人都懂得：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只有斯大林，才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在延安慶祝大會的講話」）

我們要擁護斯大林，並向斯大林學習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我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這也是毛澤東同志十三年前說的話，在今天來看，爲了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進步的事業，爲了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擁護斯大林」就更成爲一種自然的要求了。因爲現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者爲着追逐超額壟斷利潤的可恥目的，正在繼續進行着侵朝戰爭，並公然破壞國際公法，向中朝人民進行萬惡的細菌戰。爲着同樣的可恥目的，美帝國主義仍然無賴地霸佔着我們的台灣，加緊武裝日本和西德，並迫使資本主義各國加緊擴軍備戰，還壓迫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運動和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下，我們就應該更加堅決地站在偉大的斯大林的旗幟之下，爲摧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並爲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事業的勝利而奮鬥到底！

那末，向斯大林學習什麼呢？「我們要學習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道理方面，一個是事業方面」。

首先，所謂的道理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理。「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斯大林同志……發揮了這個道理，發揮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爲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體很生動的道理來，這就是建立革命陣綫，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理論」。（「在延安慶祝大會的講話」）

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同志是這樣認眞勉勵我們去學習斯大林的革命理論，而毛澤東同志自己就是認眞向斯大林學習的最傑出的模範。毛澤東同志是斯大林的最好的學生和親密的戰友。他已經成功地把斯大林所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結合着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殊條件下提供了新的發展。

其次，所謂事業，「是把道理見之實際」，是「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

斯大林與列寧一起，在俄國建立了英雄的、布爾什維克的黨，一個新型的黨，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黨。領導俄羅斯工人階級以及俄國所有勞動羣衆，取得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把黨團結在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的周圍，動員人民的力量爲爭取社會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完全勝利而繼續進行鬥爭。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通過四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由於摒棄了舊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實行了新的、蘇維埃工業

化的方法，已經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上的強大的工業國家。由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千千萬萬的小農戶走上了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蘇聯人民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曾經高度地發揮了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英勇地擊潰了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人民對人民福利的盜竊者和對國家財產的浪費者，也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蘇聯人民把蘇維埃國家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們爲社會主義祖國財富的積累而忘我的勞動着。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經永遠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永遠消滅了經濟危機和失業的現象，這樣就保證了勞動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現在斯大林正在領導着蘇聯全國人民由「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社會，向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毛澤東同志說：「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在蘇聯的兩個五年計劃之前，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天天說蘇聯不得了，社會主義是靠不住的，但是在今天怎麼樣呢？……他們也都承認蘇聯是勝利了。」（「在延安慶祝大會的講話」）這是完全正確的。

「……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中國，正在準備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學習蘇聯工業化的方法，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工業資金積累的方法。學習蘇聯人民反盜竊和反浪費的鬥爭精神，來徹底完成我們的「三反」運動和徹底擊潰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五毒」行爲。

我們中國，還正在進行着偉大的抗美援朝的工作，這就需要學習蘇聯人民堅決爲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和援助被壓迫民族而戰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爭取抗美援朝鬥爭的更大勝利。

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我們必須向蘇聯學習。

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導師和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導師和朋友，我們要擁護他、要學習他。

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沈志遠

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沖洗了每一個角落，教育了每一個人，改變了每一種人對人的關係，同時也揭發了許多的問題。其中，關於怎樣認識資產階級（註）的性格、怎樣對待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是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政治意義的。這個問題的引起一般思想界、政論界的縝密注意和討論，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在毛主席所一再強調的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革命統一戰綫中，無產階級的黨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正確地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乃是重要關鍵之一。所以毛主席說：「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綫是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的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七二頁）

但要做到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正確地對待資產階級，首先必須正確、具體而細緻地認識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及其變動情況。明白地說，即必須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或二重性）有充分正確的認識。對這種兩面性的任何方式或任何程度的否定和模糊，都會造成政治上的嚴重錯誤，招致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目前全國「五反」運動正在勝利結束，爲了加速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爲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人階級如何團結業已清除「五毒」的資產階級來共同努力搞好生產，乃是當前黨和人民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務。在這一任務面前，對資產階級性格的任何片面見解，對資產階級的任何偏差態度，都是對革命事業有害的，因而是不能容許的。

這就是我們所以需要明確具體地認識資產階級的性格和正確對待資產階級的理由。

一 資產階級對革命事業的作用的兩面性

列寧曾教示我們，世界上沒有抽象的眞理，一切眞理都是具體的。毛主席

（註）本文內提到「資產階級」時，除特別表明者外，一律係指民族資產階級而言。

也再三教導我們對具體的事物必須作具體的分析，他在其傑出的哲學著作「矛盾論」中還引用了列寧的遺教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矛盾論」，人民出版社版，十七頁）

今天我們研究資產階級的性格問題時，也應該無條件地遵守這一條極頂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

因此，首先必須交代清楚，今天我們所研討的資產階級是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和一定條件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資產階級。我們說的是現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歷史階段的前期，即解放前的革命鬥爭時期，這個階級的生存條件的主要特徵是外國帝國主義、國內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和榨取；在這個歷史階段的後期，即全國基本解放後的革命建設時期，它的生存條件的主要特徵是工人階級通過國家政權的強有力的領導（包括國營經濟的領導和思想領導）和共同綱領的約束。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研討的具體的資產階級。在研討過程中，若不時刻牢記住這些時間、地點和政治等具體條件而來抽象地、一般地談論資產階級，就必然會陷於教條主義的泥坑，從而得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世界資產階級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錯誤結論來。

不錯，作為一個靠剝削勞動、追逐利潤為生的階級，中外今昔的資產階級是完全一致的、共同的。剝削、牟利——這便是世界資產階級的共同性。但是由於時間、地點和政治等種種具體條件的特殊性，資產階級卻不能不有各種各樣的：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有所不同；在同一帝國主義時期，壟斷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也有所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有所不同；資本主義國家與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更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中，解放前和解放後的中國資產階級也是有所區別的。

但是我們這裏只限於討論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二者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指出，是剝削勞動、追逐利潤；這是一切資產階級的共同本質；不這樣，就不成其為資產階級。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條件之下，既有資產階級的存在，就必然有人對人剝削的存在。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既然「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也就必須容許資產階級在一定限度內的剝削；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也正是這樣規定了。

但是為了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為了正確地對待資產階級（也就是說，為了正確地從事革命的政治實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重要的倒不是強調或誇大天下資產階級的共同性，而忽視或抹殺中國資產階級不同於歐美資產階級的特殊性。重要的恰恰是要適當地重視和正確地把握這種特殊性。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特殊性，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裏所說的「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正確地把握中國資產階級這一「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當前的革命實踐是有重大意義的。抽象地、一般地談論資產階級的「共同的醜惡本質」，或雖然表面上承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現階段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性，可是同時又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世界資產階級腐爛透頂而且反動到頂的時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參加了革命，仍與腐爛透頂、反動到頂的世界資產階級是完全一樣的。這是完全不合邏輯，不合事實的。同時，又是主觀主義的抽象觀和片面性的看法。

假使說，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與世界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的本質」的共同性，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的消極的一面，就必然引導到「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結論，因而與黨和毛主席對資產階級的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方針背道而馳，那末過分強調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殊性，它的積極的一面，認為即使在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也是能推動社會前進的，那就是右傾觀點了。例如白亞同志在其「試論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中（載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滙報副頁）寫道：「在革命勝利以後是否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便會成為『反動的，即阻礙社會前進的』呢？我們說，也並不如此。」這種看法顯然是右了一點。

這裏必須順便辨明一事。在一般的情況下，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下，剝削、牟利和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確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這裏確難找出什麼區別來。但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之下，即在日益堅強的工人階級領導和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在「共同綱領」的約束之下，剝削牟利和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是應該和可能有所區別的。符合「共同綱領」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剝削牟利是一種，違反「共同綱領」（或國家政策法令）的「五毒」手段的剝削牟利又是一種。前者是納剝削於「共同綱領」的軌道上，拿私的利益去服從國家人民的公共利益，或至少使私的利益與國家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後者卻是出發於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動機的無法無天、不擇手段，與國家人民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馳的一種剝削牟利行為，這種剝削牟利行為正是偉大的「五反」運動所要堅決予以消滅的罪行。自私自利的意思就是只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而不顧公共（國家、人民）的利益，所以自私自利的另一面，一定是損人利己、損公利私；唯利是圖（這個「利」當然是指私利）的另一面，一定是不擇手段、胡作亂為，也就為必然發展到「五毒」行為。

由此可見，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條件之下，剝削牟利不一定完全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行爲，符合「共同綱領」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剝削牟利，和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破壞國家人民利益的剝削牟利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拿私的利益去服從國家人民的大利益，或使私的利益與國家人民的大利益相一致，這樣的剝削牟利就不能完全算是自私自利。由此可見，在革命勝利以後（亦即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之下），還說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思想不是反動的，不是阻碍社會前進的，那就無異教人不必進行「五反」運動了。這種見解顯然是很不妥當的。白亞同志從這一見解出發，就公然得出了不能要求資產階級放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思想的結論，這是不足爲奇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留到後面再來討論。

從上面的評述，可知一切不從具體的客觀實際出發的主觀主義的片面性見解，都會導致政治上的錯誤結論來的。

那末，究竟應該怎樣來認識現階段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究竟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兩面性（或二重性）是怎麼一回事呢？

應當斬釘截鐵、簡單明白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與世界資產階級共同的本質，那就是剝削勞動，追逐利潤。這是一切資產階級之唯一的、決定性的本質。事物的本質是比較固定的東西，當某一事物本身沒有被消滅或否定以前，它的本質是不變的。例如資本主義的本質永遠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剝削：年輕時代的資本主義是這個本質，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仍是這個本質；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是如此，非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與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也是如此。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這一共同的本質出發，却發展成爲兩面性的性格表現：它有消極腐朽的一面，同時也有積極進步的一面。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時期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一面表現於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情革命和參加革命；它的消極一面表現於它對革命的懦怯、軟弱、動搖、甚至背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它的積極一面表現於它遵守共同綱領，在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從事於對國計民生有利的經濟活動；它的消極一面則表現於它基於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的違反共同綱領和政策法令的「五毒」行爲。

因此，如果認爲此時此地的資產階級從剝削和追逐利潤出發，必然會有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鋪張浪費、享樂至上等黑暗腐朽的東西，這種看法，對於當前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不很妥當的，因爲在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在共同綱領的約束之下，民族資產階級從其剝削勞動，追逐利潤的本質出發，並非必然具有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等的黑暗腐朽東西；他們從這一本質出發，也可能成爲眞誠擁護共同綱領、擁護工人階級及國營經濟領導的進步正派的工商業者。不承認這一條，就是否定當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不承認這一條，就是忽視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團結、教育和改造的作用。

現在要問：一個階級的積極性或消極性，究竟是依據什麼標準來評定的呢？我們認爲唯一的標準就看它的態度、行動和思想歸根到底是否有助於人民生產力的發展：它是束縛或阻碍生產力發展的，還是解放或幫助生產力發展的？在今天，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按照共同綱領辦事，老老實實在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領導之下經營生產事業，那它就有助於中國人民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起着很好的積極作用，人民應當表示歡迎。反之，他們如果違反共同綱領和政策法令，通過「五毒」手段來達到其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卑鄙目的，那就是阻碍甚至破壞中國人民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就對革命事業起了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人民必須堅決予以打擊，以至消滅。

二　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兩面性

以上所討論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態度和作用的兩面性，現在我們要來研討他們的思想是不是也有兩面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認爲應當予以肯定的回答。我們完全同意馮定同志的看法，他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今天中國來說，也有它的兩面性。在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能够有其積極的一面，便是眞實地擁護工人階級的領導，遵守共同綱領」（「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最後一節）。同時，馮定同志認爲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消極腐朽的一面，就是損公利私、損人利己的思想，即「五毒」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上的這兩個方面，均出發於同一本質，同一根據——剝削、牟利。因爲有利可圖，他們才可能有擁護共同綱領、擁護工人階級領導的思想，這就形成他們思想上積極的一面。同時，由於存在着剝削、牟利的思想，就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展成爲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的「五毒」思想，這就形成消極腐朽的一面。

有人說，今天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本質上完全是反動的、腐朽的、醜惡的，說它沒有任何的積極性和進步性，它決不能成爲推動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使之向前發展的力量，這種看法完全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符合事實的。假如承認資產階級對人民革命事業的態度和作用是兩面性的，而他們的思想却是完全反動腐朽的，那就等於把他們的思想同他們的行動分裂開來了。但是事實上思想同行動是分不開的。任何個人、任何階級，他們一定的行動、態度和作用，總是

從他們一定的思想意識出發的，而這種思想意識又是他們的物質地位（階級地位）的反映。有什麼樣的認識，才會有什麼樣的行動、態度。肯定資產階級思想的完全腐朽、反動，同時又肯定資產階級在人民革命事業中有積極、進步的一面，這怎麼說得過去呢？這豈不變成了思想和行動、認識和實踐的二元論嗎？

在這一點上，我曾犯了和別的一些同志相同的錯誤，必須提出自我檢討。我在答一位讀者的覆信中寫着：「……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們對這一革命事業所抱的態度，有其積極進步的一面，而不是指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本質，也不是指的他們的思想。在歷史的現階段上，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們的本質，實在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可言，更談不到什麼進步性了。他們的思想……本質上完全是腐朽的、醜惡的、甚至反動的。」（見四月八日，上海文滙報副頁，「關於資產階級積極進步一面的問題簡答讀者」）如果我們肯定今天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完全腐朽、醜惡和反動的，猶如帝國主義的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一樣，那末他們對人民革命事業怎麼還能產生積極進步的作用呢？我這樣的把思想和行動作二元的解釋，是跟我對中國資產階級思想抱教條主義的態度有聯系的。實際上，片面地強調資產階級思想的完全反動腐朽，結果必然是否定資產階級對人民革命事業的任何積極性。

認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完全反動腐朽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有兩個錯誤的思想根源。

一個是對資產階級思想作抽象的、教條主義的解說。不談則已，一談到資產階級思想，就認爲不外是十八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所固有的思想，如舊民主主義、利己主義、民族主義、種族觀念、改良主義、奴化思想、唯心哲學等，認爲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都是完全反動的了。這是不錯的。但這只是一般的原理，若把這種一般原理硬套到今天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頭上去，就不完全適當了。原因是今天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處在與美英等國的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之下：這裏工人階級的領導是這樣的強而有力，國營經濟的領導力量也正在日益加強，偉大的「五反」運動已在全國取得勝利，革命的民主改革正在社會每一角落積極推進，人民自覺自願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正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資產階級也被捲入在這些偉大的運動中）。在這一切強有力的革命因素和革命運動的烈火鍛鍊之下，再要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會老是同世界資產階級的「傳統」思想一模一樣，那是不能想像的。那是由於離開了事物與其周圍各種條件的聯系而孤立地觀察此事物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所造成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區別一般資產階級的固有思想和當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可能有和必然會有的思想——擁護共同綱領和服從工人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另外一個可能的錯誤思想根源是對剝削勞動和追逐利潤的思想作非歷史主義的評價，抽象地判定資產階級的剝削思想、牟利思想，不問時間、地點和具體條件如何，一律是反動腐朽的，沒有絲毫積極意義的。但這是完全反唯物辯證法的看法。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裏早已明確地教示我們，當我們評估歷史上的任何社會現象時，不可從什麼「永恆正義」出發，而應從這種現象所由產生的時間、地點和具體條件出發。他曾舉奴隸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主張二者爲例，說明此二者就今天蘇聯的條件來看是荒謬絕倫的反革命要求，但在原始公社制瓦解着的條件下，奴隸制度（因而奴隸制的思想）是比較進了一步；在沙皇制度的條件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是一種進步的革命的思想。同樣，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在封建制度瓦解着的時期和在資產主義幼年青年時期，較之封建的超經濟剝削思想是一大進步；資產階級從剝削和追逐利潤的思想出發，曾不斷地努力改進生產技術，改進企業管理與經營，一、二百年間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

今天新中國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發展人民生產力的要求來看，也不能看作是完全反動、腐朽的，只要它受着共同綱領和國家政策法令的約束而不發展成爲「五毒」思想就是。今天中國資產階級如果能眞誠遵守共同綱領和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從追逐利潤的思想出發，努力去改善經營，改進技術設備，鑽研生產方法，大膽採用生產合理化建議，努力擴充企業，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因而賺得大量利潤，試問這樣的剝削牟利思想有什麼不好呢？他們從這種剝削牟利思想出發，做着有利於國計民生、有利於國家建設的事，爲什麼還說這種思想沒有絲毫積極進步作用呢？毛主席所以要指示我們：「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就因爲容許一定限度的資本主義剝削，對於實現國家經濟上的眞正獨立，對於提高我國落後的經濟地位，是有積極作用的；因而，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是可以起積極作用的。這難道還有懷疑的餘地嗎？

但是必須着重指明，我們所反對的僅是把今天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完全評爲反動腐朽的那種看法，即反對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無兩面性的看法。這完全不等於說，中國資產階級思想是完全積極進步的。如果這樣說，那也同樣是抹殺了它的兩面性。我們要明確地指出，今天中國資產階級從剝削牟利的思想出發，可能發展成爲擁護共同綱領、擁護工人階級領導的思想，也可能發展成爲

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的「五毒」思想。

今天中國人民所希望於資產階級的，就是希望他們努力發揮擁護共同綱領的思想，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是要求他們放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的「五毒」思想。這正是偉大的「五反」運動的中心目標之一。因此，如果說我們不能要求資產階級放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思想，那顯然是一種右傾的有害觀點。而白亞同志的文章恰正發表了這種有害的觀點，他說：「資產階級的本質是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這一點是資產階級共同性，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不能例外。……但這種思想雖然是醜惡的、卑鄙的，可恥的，為我們工人階級所必須徹底反對的，但我們却不能要求資產階級放棄這種思想……。」不能要求資產階級放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等思想，就等於說不要搞「五反」運動，須知資產階級的「五毒」行為正是這些思想的產物啊。我們認為正確的說法應當是：不能要求資產階級放棄剝削思想、牟利思想，因為這樣的要求，就等於要求取消資產階級。而剝削思想、牟利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之下，是與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的思想，應該有所區別的。這一點前文已經說明了，這裏不再重述。

肯定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完全反動腐朽的人，還有一個理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資產階級思想本身不能混為一談。這話的意思是說，要不談則已，一談到資產階級思想，就只許指一般資產階級的固有思想，而在新的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可能會有的擁護共同綱領的思想，縱然它將會逐漸深入於資產階級意識中，也不能算是民族資產階級所有的思想，這是說不過去的。

也有人提出異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可以經過教育、改造而逐漸具備共同綱領的思想，但是共同綱領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製訂下來的，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亦即毛澤東思想的產物，這怎麼能說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呢？我們的答覆是這樣：共同綱領確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製訂下來的，它確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但它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綱領（即所謂最高綱領），而是體現各民主階級之共同意志、共同利益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因此它就可能為每一民主階級所接受（而且非接受不可），也就可能成為各個民主階級所共同具有的思想。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也能夠具有這種思想。

三　對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與思想改造問題

認識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兩面性，就不難確定這個階級在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中的地位，及工人階級對這個階級的關係和態度了。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有積極進步的一面，它就能成為革命統一戰線中的構成分子之一，也能成為人民民主國家的階級構成中的成員之一。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軟弱的一面，它就不可能居於革命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也不能在國家政權中佔主導地位。關於這一點，毛主席已有過明確的指示：「…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論人民民主專政」，解放社版，第十八頁）

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的更根本性的原因，也是毛主席一再指示過的，就是整個世界早已走入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全世界的歷史早已發展到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當整個世界資產階級早已完盡了它的歷史使命、基本上已反動腐朽透頂的時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充當革命領導者，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

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達勝利；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担當起革命的領導責任，並且把它領導到勝利。這已為四、五十年來中國的歷史所證實了。

那末，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又應該是怎樣呢？

誰也知道，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一點是無須多加說明的。但問題是在工人階級怎樣來實現對資產階級的領導？用什麼手段、方法，實現這一領導？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為避免篇幅拉得太長，作者想只以當前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為限，革命勝利前的情形不談了。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而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主要的正是表現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領導關係。工人階級主動地聯合和團結資產階級，領導它在共同綱領的軌道上，在國家政策法令的指導下，從事於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工商業，以促進新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聯合的客觀根據，就在民族資產階級具有積極進步的一面。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由於客觀上還需要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由於「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資本主義因素，」——由於這一切，民族資產階級才能夠具有這種積極進步的作用，因而工人階級「必須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領導，是要領導和幫助它來鞏固和發揚它的積極進步

的一面，領導和幫助它成爲一個新型的（即新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由於中國資產階級，作爲一個剝削階級，具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等與世界資產階級相共同的性格，即具有消極腐朽的一面，工人階級必須與之進行嚴肅的、不調和的鬥爭，這是反對其腐朽黑暗一面的鬥爭，是反對「五毒」的鬥爭。這種鬥爭，是爲了保護和發揚它的積極進步的一面，是爲了更好地團結他們，鞏固統一戰綫。工人階級通過這種鬥爭來規範和教育資產階級，以實現其對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因此，鬥爭也就是領導。

在經濟的領域內，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領導，具體地表現於國營經濟對私營工商業的領導。這一領導也同樣地要通過又聯合又鬥爭的方式。聯合的具體形式有如：國家和國營經濟對私營工商業的委託加工、定貨、收購、貸款，國家保障工商業者以合法合理的利潤，國家盡可能給私營企業以解決原料、銷路、技術等方面的困難的協助與指導，國家分配一部分計劃任務給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共同爲實現經濟計劃而努力，以及私營企業的工人階級爲發展生產和生產合理化而團結資方等等。通過這一切形式或方式（可能還有其他的方式），工人階級實現其對資產階級的領導。

鬥爭的具體形式有如：國家通過國營貿易公司控制重要物資。調劑市場供應和嚴格管制金融，以杜塞投機倒把之門，取締黃金外匯黑市，嚴禁囤積走私，國營經濟控制國家經濟要害部門，以及私營企業中實施工人監督等等。通過這一切及其他可能的方式或手段，來進行對資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通過這種鬥爭，來防止和消滅資產階級損害國家人民的利益的「五毒」行爲。自然，大規模的消滅「五毒」的手段，只能是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進行「五反」運動。只有通過對不法資產階級的全面的經濟鬥爭，才能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權。

但講到「又聯合又鬥爭」這個政策時，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列寧的一句遺教：「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關於辯證法問題」，轉錄「矛盾論」，第四一頁）在對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中，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絕對的，聯合却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鬥爭是爲了聯合、團結，沒有鬥爭，也就沒有團結。所以毛主席說：「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這幾句話雖是在不同的時期，就不同的鬥爭對象而說的，但基本原則上仍適用於對今天的資產階級的關係。我們今天以「五反」鬥爭來求得與資產階級的團結，則團結存而且固；如果我們對資產階級的種種不法罪行，採取退讓放縱的態度，那末我們的國將不國，還談得到什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團結和聯合？

認識鬥爭在統一戰綫中的絕對性之所以重要，因爲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建設時期中，國內階級關係中的主要矛盾，乃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爲在新中國的社會階級構成中，只有這兩個階級間的利害是根本對立的。這種根本對立性就在於一個是歸根到底要求消滅剝削，實現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另一個是根本上要求維持剝削，保護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因此，認爲今後我國的階級鬥爭會逐漸緩和乃至熄滅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而且是很危險的。這樣的思想，會引導我們放棄爲鞏固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鬥爭，錯誤地以爲社會主義是可以不經過激烈的階級鬥爭而「自然而然」到來的。列寧老早指示過我們，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一個「誰戰勝誰」的鬥爭——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呢，還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過渡時期的政治和經濟中的主要內部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綫、兩個前途間的矛盾，也就是代表這兩條路綫、兩個前途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基於這一矛盾而發生的鬥爭，必然將以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而結束。

由此可知，兩個階級的鬥爭是絕對的。在統一戰綫中，爲了團結，爲了鞏固統一戰綫本身，也爲了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工人階級必須堅持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批判、教育，是對資產階級進行思想改造。這是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的一個重大政治任務。

一談到思想改造，自然而然地會發生一連串的問題：對資產階級需不需要進行思想改造？有沒有可能改造資產階級思想？要改造資產階級的那些思想？用什麼東西去改造資產階級思想？

關於需不需要教育改造的問題，應該是毫無疑義地給以肯定回答的。毛主席明白地教導過我們，他說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如果說「資產階級的改造，不是個思想改造的問題，而是要他們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嚴格地遵守共同綱領的問題」（上引白亞文），那是不正確的。如果說對資產階級沒有思想改造的問題，那只有兩種可能的理由：或者是認爲對資產階級只須用教育以外的手段（如法律強制）去迫使他們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和遵守共同綱領；或者是認爲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本沒有消極腐朽的一面，所以無需乎改造。但這兩種理由都是完全錯誤、而且不符合事實的。

應當認清，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積極一面，即擁護共同綱領

和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思想，並非天生固有的，而正是要經過不斷的教育、改造才逐漸樹立和鞏固起來的。「五反」運動也正是對資產階級的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這個運動，已經在資產階級思想改造方面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它已使資產階級中的極大一部分人眞正認識了擁護共同綱領和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必要。自然，這種認識今天還是不够鞏固的，今後國家還要通過各種方式（如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繼續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的工作。

我們說鬥爭是絕對的，這種鬥爭當然不只是政治的、經濟的、而且也是思想的。同時，對資產階級進行政治和經濟的鬥爭，本身就含有思想教育的作用。反之，思想鬥爭、思想改造，本身也是爲了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務或經濟任務。必須對資產階級的傳統的腐朽思想，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等思想，進行嚴厲的經常的鬥爭，才能日益發揚和鞏固它的積極進步的一面。

這樣的思想改造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絕對把握的。懷疑這一點，就意味着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統一戰綫的鞏固缺乏信心。不可能的，是想在今天來改造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因爲剝削牟利思想是同資產階級共生存的，它是資產階級的本質；要取消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就等於不要這個階級生存，這是完全違反國家政策的。因此，對於資產階級的剝削牟利思想，在今天並不存在着思想改造的問題；而對於他們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利私、投機取巧的「五毒」思想，却必須堅決地給以改造。

剩下來的是用什麼東西去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資產階級思想應當依據什麼東西來做尺度的問題。

有人主張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毛澤東思想去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這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想法。資產階級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物質存在的反映。要不消滅資產階級的存在而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當然，首先是改造它的剝削牟利思想），這豈不是犯了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毛病呢？假如你硬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改造資產階級的尺度，那我可保證一定會有不少的資產階級分子會表示「忠誠接受，熱烈擁護」，但我也同樣可以保證，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百分之百假冒的。因爲企業老闆而兼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是根本不可思議的事。

因此，對於資產階級，目前還只能用共同綱領的原則去進行思想教育，只能依據共同綱領作爲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尺度。共同綱領雖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製訂出來的，但它並不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全部，因爲它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綱領，也就是說它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最高綱領，而只是這個黨的最低綱領。所以我們不能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改造資產階級思想，而只能說用共同綱領的原則去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前者意味着要求資產階級取消剝削思想，後者則意味着用共同綱領的原則去改造資產階級的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鋪張浪費、享樂至上的腐朽思想。

最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以下兩點：一、當我們說目前還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的標準、尺度，完全不等於說不要資產階級分子在自願的基礎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的學習是應該受到大力鼓勵和歡迎的。二、也完全不等於說其他各階級人民不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教育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武器，恰恰相反，對於一般人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武器來進行思想改造並批判一切傳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乃是當前國家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五日，上海。

（上接14頁）這首先使我們在思想上把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程縮短了，好像就是今天——明天——後天的事情一樣。

當然，忽視困難是不允許的。但是，堅定的信心，艱苦的戰鬥與工作，努力認眞的學習，就都爲的克服困難。在我們兩三年之間的勞動與創造的過程中，我們的勞動思想已在大改變中；我們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首先由他們的代表人物所反映出來，他們已經不僅爲個人福利而勞動，而且更共爲國家的富強而奮不顧身地勞動着；也不僅爲眼前利益而勞動，而且更共爲將來美好社會而精神飽滿地勞動着。特別應該承認的，是實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作爲政治的戰鬥任務，努力學習技術與文化，乃是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目前的熱潮之一。

這樣，一方面反對着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破壞，一方面一步一步把我們所有的勞動力與聰明才智都集中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創造，就是我們爲人類而進行的工作。這工作，將創造一切的奇蹟；但正如波列伏依同志所說，對於蘇聯人，所有的奇蹟是「日常的東西」；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也將要一天一天成爲「日常的東西」的。

我因爲讀了關於伏爾加—頓運河共產主義偉大建設的完成的消息，又想到了我們根治淮河的偉大工程，就寫了這些話，表示我的快樂的心情。我覺得，在現在，我們生活着和工作着，實在是有意義的。

訂正

本刊五月號第四頁上欄第三十三行『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官僚』二字係誤植，應刪去。

對於目前中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研究

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中國還是新鮮事物，但是這個新生力量却以驚人的速度在發展。爲了使自己對於這樣有重大意義的新事件進行學習，同時又爲了幫助將在暑期中出去參加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習的同學們得到一個較全面的認識，所以，我和本校農業經濟學系應廉耕主任以及系內教師王毓瑚、蕭鴻麟、周啓文、鄭維勤、郭象賢、楊芳林、吳敬業諸先生，根據各方面發表的報告及論文，集體地做了一番研究，寫成了——應該說是綜合成了這篇稿子。本文內容是不夠深刻的，看法上可能還有錯誤，希望讀者給予指正。

孫曉邨

一 目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概況

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到現在爲止，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已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前提，它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使農民獲得了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大大地鼓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土地改革僅僅是解放農民與發展農業生產的第一步，因爲，土地改革以後，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它基本上還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生產，而且生產條件也不平衡，在進行生產中，往往要遭遇到許多困難。爲了克服這些困難，進一步發展生產，農民紛紛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在農業生產上面通過合作互助的方式，實行組織起來。

目前組織起來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一、臨時季節性的勞動互助組；二、長期定型的與技術、副業、供銷相結合的勞動互助組；三、農業生產合作社。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目前比較高級的農業經濟組織形式。它是在勞動互助發展了的基礎上產生的。因爲，隨着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老區與半老區的農民已經不滿足於互助組的組織形式，條件成熟的互助組就發展成爲更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同時也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之所以產生，是由於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在一九五一年，全國已經有農業生產合作社四百餘個，到今年，在全國範圍內更有了突飛猛晉的發展。現在東北約有三千個，華北約有一千八百個，華東約有四百餘個，西北、中南兩區估計約有二百到三百個，總計約有五千餘個。個別地區還出現了集體農莊。

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按照土地佔有情況與分紅辦法來分類，目前大致可以分爲三類：

一、勞力和土地共同分紅的合作社；二、完全按勞分紅的合作社；三、只按土地分紅的合作社。

其中以第一類勞力與土地共同分紅的合作社爲數最多。它是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最容易爲農民所接受的，所以這一類合作社是我們今後要大力發展的。

二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出現與發展，指出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出現與發展，解決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這幾年來，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封建制度被徹底消滅了，農業生產力是獲得解放了，所以到處出現了買耕畜，修農具，除蟲害，施肥料，大力搞生產的蓬勃氣象。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了：今後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什麼呢？蘇聯革命後建設的初期，這樣的問題也曾被提出來的，所以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文中說得好：「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當按什麼道路發展呢？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而小商品經濟又是什麼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能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如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那樣；也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如在我們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所要發生的情形一樣。」（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斯大林在駁斥了反對派不相信可能把蘇聯農民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錯誤觀點後，接着指出：「……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按另外一條道路去發展，即按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去發展。這是條什麼道路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合作制各方面普遍合作化，把散漫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在農民中間，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然後是在農業生產方面，培植集體制原則。」（同上書）

中國農村在土地改革後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其基本性質與當時蘇聯的情形是相同的。所以，是不是只要簡單鼓勵農民「勞動發家，生產致富」，或長期停留，甚至自滿在這樣的階段呢？不是的。首先，這樣的方向並不能進一步解決農民窮困的問題；其次，這樣的領導等於自流，也就是放棄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坐視農村中的階級分化與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因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一九四三年，當老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毛主席就這樣說過：「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爲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毛澤東：「組織起來」）在這一段話裏，毛主席已經明確地答覆了，也就是指出了土地改革後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一指示，是完全符合於列寧和斯大林所提出的關於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農民經濟發展的原則的，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農業集體化的理論在中國具體環境中的應用。

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的指示，由於方向和內容的明確，由於適合於中國農村的實際情形，立即被農民所接受。到一九五〇年的時候，東北、華北等老區，勞動互助組已成爲農村中相當普遍，而且在生產上起着很大的帶頭作用的組織。但是，另一種的情況也不斷地在發展，就是一方面「由於土地改革後農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中農已成爲農村中的多數，特別是農村（中共）黨員的絕大多數已成爲中農，而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社又沒有隨着經濟的發展迅速提高，使勞動互助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解決農民擴大再生產的要求；因此，一部分農村黨員認爲：『生產發展了，農民生產困難已經克服，農民可以單幹了，互助可以不要領導了。』這是一種右傾觀點」。（中共黑龍江省委辦公室主任張士英：農村黨的組織對互助合作運動的領導應當注意一些什麼問題，見「中國農報」一九五二年第九期）另一方面，農民經濟初步上昇後，勞畜力的困難已經得到相當的解決，或者勞動互助組在這一點上已經滿足農民的要求了，但當時（指一九五〇年）這種組織還沒有提高，就是還沒有普遍地與副業、與技術，進而與供銷相結合，因此，幹部及農民都感到互助組前途有限，說：「中農與中農不必互助，中農與貧農不能互助。」因此，對於「組織起來」的信心不無動搖。河北省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比較有基礎的地區，在今年四月間召開的農業互助合作幹部座談會上，尚且指出：「全省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民沒有組織起來；各級領導機關對於互助運動的領導還有嚴重的放任自流的現象。縣以上機關沒有專人領導互助運動，部分區、村幹部滿足於經濟生活初步上昇的現狀，看不到中國農業生產必須由組織起來逐步走向集體化的發展方向，而不願意參加互助組。」（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范長江同志調查了山西平順縣川底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指出：「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組織起來和提高技術相結合的方針，因而對那時開始渙散的一般互助組的提高和鞏固，起了顯著的作用。可是，如果把『組織起來』僅僅限於『互助組』這樣的形式，而不包含更高級的形式，還是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的。就川底村來說，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可能採取的技術，大部分都採用過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看不見『組織起來』的道路可以更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前途，因而自發地走向單獨發展生產的道路。」在東北對農村經濟發展方向的右傾的觀點，以及由此所產生的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自流現象，也是有過的，這表現在對互助組領導的放任自流，表現在村幹部經濟上昇後滋長着單幹情緒和對資本主義思想的熟視無睹，表現在農村高利貸的迅速發展和商業投機的增長，表現在農村黨員僱用工人的發展等方面。高崗同志曾對此作了嚴厲的批評。

這種情形的出現，雖然有的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有的是由於互助組這樣形式在現階段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但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就是：雖然有了毛主席英明的指示和蘇聯先進的實例，可是有的人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還是認識不清。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出現和迅速的發展，尤其是它在生產上的優越性，給予這種人一個明確的解答，大家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已經從活生生的事例中得到了認識。這一事實，更光輝地證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英明與正確。

三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與生產管理制度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本特點是社員土地勞力入股，把生產資料集合起來，集體勞動，統一經營，全社所有土地、勞動力就能夠統一使用，統一分配。生產計劃性因而得以大大地加強。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目前還是在取得經驗的階段中，在組織和制度各方面，都是很不一致的。但根據已經創造出來的經驗，可以初步地談一談關於它的組織以及生產管理的種種制度。

一、分紅制度　上述三大類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按分紅的辦法區別的。第二類型是需要特殊的條件的，如土地原係國有，或由共同勞動取得的（如

集體開荒），或所有社員入股的土地大致相等，這種條件目前是很不普遍的，因此，這一類的合作社爲數極爲有限。第三類型的合作社是由互助組向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的過渡形式，它的土地的統一使用規定了它的性質是屬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範疇，但社內的勞動報酬則是採取工資制或類似齊工等價的辦法。這種形式不會維持長久的，一般只實行一、二年就要變爲第一類型。有些較高級的互助組爲了解決某些矛盾（這種矛盾是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在互助組內不可能解決的），就替各人入股的土地評定產量，然後加以統一經營，而按入股的土地多少分配收益。在這樣做的時候，按勞取酬的原則尙未被注意到。這類的合作社接受了正確的領導之後，就可能轉爲第一類型。因此，這一類型的合作社也是不太普遍的。（另外還有很多個別的分紅辦法，因爲意義不大，這裏從略。）

這樣說來，最主要的只是第一類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因爲今天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是容許存在的，所以土地與勞動同樣作爲分紅的根據，還是必要的。目前這種合作社的分紅辦法還可以細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按固定的比例，如勞六地四、勞地各半、勞七地三等，一般稱爲活分。目前情形大體上是已逐漸做到勞力分紅的比例大於土地。再一種辦法是計劃以內的收益按原定比例分配，超額部分則以勞力爲準。第三種辦法是支付土地以固定的地租，其餘按勞分紅（稱爲死分）。如果以勞力分紅的比重應當逐漸增大這一原則來衡量上述三種辦法的優劣，無疑地是第三種最優，第一種最劣。理由很明顯，隨着生產力的提高，收益也不斷增多，如果分紅比例是固定的，那就是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不斷地要被土地所有者吞食一部分，這當然是不對的。依照第二種辦法，從這方面來說，確是比第一種要好些。換言之，勞動力方面的損失要少些的。不過計劃以內的收益分配情形，也還是同第一種辦法一樣的，只有最後一種辦法，在目前還不能完全廢除地租的條件之下，是比較最接近於上述原則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兼營副業，社員另以資金入股，資金股也只分副業的收益，副業的分紅比例，一般也是勞多於資。如八比二或七比三，同時土地股也不得分副業方面的收益，至於使用在副業方面的勞動力，則與農業勞動力統一分紅，換言之，不論農業生產或副業生產的收益，凡是應分配與勞動力的部分，都把它來合併到一起，然後依全社的勞動力股統一分配。這同全社勞動力的統一分配使用的辦法是互相配合的。這種辦法也是增大了勞動力分紅的比重。

有的合作社還把社員土地以外的生產資料，折成資金入股分紅，這是應當逐漸加以改正的。不過這種情形不算太多，比較普遍的是把耕畜算成勞動力，實行記工分紅，這些現象目前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後隨着生產資料的逐漸公有化，自然是會歸於消滅。

總之，現階段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財產私有制基礎上成立起來的一種比較高級的組織形式，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現在拿來在私有基礎上加以統一經營，這樣在收益的分配上必然是要發生矛盾的。這表現在分紅比例的上面，這種矛盾如掌握得好，就可以收到刺激生產積極性以及鞏固合作社經濟的效果。掌握得不好時，就要發展成爲抗爭，對於生產會起破壞作用，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下面在第五節中還要加以討論。

二、評工記工制度　評工記工制度是同上面說到的分紅制度有關聯的。這也就是勞動日的問題；所謂勞動日，一方面代表的是社員向合作社投入的勞動量，另一方面也是收益計算的標準。因此必須計算得精密，儘量公平合理，最先進的辦法是採用按件記工制，即將每項工作依照數量和質量或工作時間定出標準工分（即勞動日）。社員每天的工作以標準公分爲單位民主評定，例如寧河大陳莊合作社規定十工分爲一勞動日，秧田播種需要熟練技術，每播種一畝定爲二十三工分，抹埂一畝（工作質量是裏面光不漏水）定爲三工分。這種辦法計算起來比較煩難，目前一般合作社還不易採用。比較普遍的，是先把每一社員的勞動力的強弱與技術熟練程度民主評定，然後按工作時間記工，例如以一個中常健康的人一天的勞動定爲一個工分。某社員的勞動力評定爲〇•八，工作十天，則爲八工分。這種辦法雖是有缺點的，如需要時常改評，非常麻煩，而且也不如計件辦法合理。但它簡單易行，農民有了互助組的基礎，都習慣了民主評工，所以目前很能解決問題。

有些規模較大的合作社採用勞動力分隊，土地分區，固定經營的辦法。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定質、定時、定量的耕作。凡是提前完成一定質量的工作和產量超出定額的，都有額外的報酬。這也是一種很有效的辦法。不過要實行這種辦法，除了合作社的規模要比較大些而外，領導骨幹比較強也是必要的條件。

在這裏要提到的，還有幹部記工的問題，一般的合作社對於幹部的勞動是予以特殊處理的，有的規定一定的勞動日報酬，或者依最高額計算，或者加以固定。如大陳莊合作社社長就是最高的報酬。會計則以全社社員的平均報酬爲準。有的給因公而誤工的幹部照常記工。也有的是允許幹部僱工自代而仍記幹部本人的勞動日的，這是因爲勞力分紅的收入比工資更多。總之，在現階段上，幹部的領導對合作社是起着決定作用的，因此，對於幹部的記工是應當予以適當的照顧。至於一般社員，則不許僱工代替；理由是合作社內部不應有僱傭勞動的剝削存在着。合作社本身自然也是不能僱用長工。富農帶長工入社也是不允許的。不過生產上所需要的臨時短工以及特殊技術人員並不受限制。這當然是爲了維持和發展生產。最後附帶要指出，個別入社的軍烈屬，如果缺乏

勞動力，目前在記工上還是要有照顧的。

三、關於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處理　首先是耕畜，目前存在着三種方式：一是作價歸公；二是歸原主保有，合作社要使用時向原主出資僱用；三是折工記分。以上三種方式，第一種最好，化私爲公由社統一分配使用，管理方便，並可當心飼養。第二種較差，不過可以逐漸改爲作價歸公。第三種方式最不合適，但目前却被普遍地應用着。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談到。

其次是農具，也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也是作價歸公，這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另外一種辦法，就是由原主暫借與社使用，而由社方貼補一定數量的糧食，作爲折舊費，這種辦法也還可以。總之，隨着合作社的發展，公有農具，特別是大農具以及農藥農械的數量勢必增多，社員私有農具相形之下，要越來越失其重要性，逐漸就不成爲問題了。

最後說到肥料，合作社一般使用是很多的，除了自積和購入而外，社員私家所積的肥料，也是作價歸公。爲了使社員不致因入社而不重視家內積肥，有的合作社規定出來每個社員每年須以一定數量的肥料賣給社方，這也是一種很好的辦法。

合作社成立第一年所需的種子，一般是向社員借用。次年由社方自留種子，就不再成爲問題。建社初期需要資金，一般是參照分配收益的辦法由社員分擔。最好的辦法是按勞力股分攤，以後需用的資金，就從社的收益當中，提出應用。

四、關於入社退社的規定　目前各地組織合作社，原則上都是根據自願，全部或一部入社的都有，並不一致。最好自然是一戶的大部土地和主要勞動力入社。這樣可以避免社和社員私人之間的矛盾。社員入社年齡的限制目前還沒有。社員單位有的是個人，有的是戶，也不一致。根據目前的經驗，最好是以勞動力（即個人）爲單位，而按戶記賬。社員在社內的權利義務完全平等，這樣可以避免家長式的包辦（如婦女和男子同工而不同酬等偏向）。按戶記賬，則照顧到目前農村還是以戶爲經濟單位的具體情況，計算起來也更方便。

土地在入股時要經過民主評定，主要根據當年產量，再參考距離經營中心的遠近、土質的好壞等條件，折成標準畝。這次的評定試用一年，第二年再加調整一次，即作決定。實際上先有了互助組的經驗，這種評定，一般只有一次就沒有問題。

社員原則上是有退社的自由的。退社時，除了他的原來入股的私有土地是要退還而外，公有財產中應當分給他的那一部分，也應當給他的。不過土地入社後，如果是經過了顯著的加工（如坡地改成平地、鹼地改成好地等），在退出時，是要給社方以適當的補償的。

五、關於公積金與公共財產的處理　公積金和公共財產的累積，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擴大再生產，改善經營方式的物質前提。目前各地合作社一般雖也能有了從收益中提出公積金的規定，但所定的比例數不大。例如耿長鎖合作社雖已成立很久，仍只佔五%，而且還沒有認眞執行。結果是社員富了，社沒有富。因而社裏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沒法改進。社員對於累積公積金不積極；說明他們對社的看法還不正確，也就是說，他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還沒有同社完全靠攏。在建社初期，合作社的生產力還沒有顯著提高，這種態度是難免的，以後隨着生產率的提高，情形是會改變的。

六、管理機構與會議制度　目前除極少數的合作社外，一般都還沒有成文的組織章程，不過一定的組織機構是有的。社長（或稱主任）是總領導人，各個生產部門也都有負責人，通稱組長。另外還有記工員，技術員，管理員等，一般都是由不脫產的社員兼任。社內一切事務，主要是依民主的方式研究處理。像耿長鎖合作社更明白規定了社員代表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社的生產計劃和其他一切重大事項都要經過大會討論決定後才能執行。這是值得推廣的。

四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及其在農村中所發生的影響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互助組有了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就過程上講，那時互助組已經與技術、副業，甚至供銷結合起來；但仍然有些問題不能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亦即提高生產上受到限制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所以，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具有比互助組優越的許多性能，是很顯然的。根據范長江同志對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調查，中共屯留縣委王太奎、宋子勤、肖寒三位同志對山西省屯留縣東坡村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報告，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農村工作委員會調查組對廣饒縣三柳樹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調查報告，以及其他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報告，一致認爲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具有很大的優越性的，這種優越性主要表現在：

（一）合理地使用土地　合理地使用土地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最大的優越性之一，而且從這上面使農民認識到原來那種個別的、分散的小生產方式是沒有前途的。在土地使用上，中國農民由於長期地在封建土地制度的剝削之下，本身不斷地分化、降落，因而，其所經營的土地是極其分散而細小的，這就限制了生產力的向前發展。互助組對於農民的生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其關鍵是解決了勞畜力缺乏的困難；其次是解決了若干農業生產上的技術問題。但是對於土地太分散，不能因地制宜實行種植，而只能按照自己家庭的生活需要，在十分不經濟的條件下實行生產，以及無法對於較大土地進行加工等情形，却無法改善。這個問題，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決，因爲農業生產

合作社是以土地入股爲基礎，雖然不可能是一整片，然而究竟把小塊地變成了大塊地，而且全社土地在統一計劃，統一經營下，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改變了土地分散、個體經營的生產方式。范長江同志說得好：「農民第一次從『吃甚種甚』的被動的生產情形轉爲『宜甚種甚』的主動局面，這就大大地發揮了土地的生產效力。」此外，輪作制度可以逐步實行了，對土地普遍進行了加工，並開始進行了土地的基本建設，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爲使用較大農具創造了條件。這一切，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前是不可能的。現在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大都爲一百餘畝至二百餘畝，這樣的經營面積單位，雖說還是很小，但由於集體的統一的經營，已在生產上表現出很大的優點。由此可以設想，農業生產合作社向前發展，土地面積不斷地增大時，土地合理使用的程度將愈來愈提高了。今年六月三日「人民日報」所載的關於山西平順縣川底村郭玉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段話，最足以說明這樣的前途：「入股土地更多了，更便於統一計劃，集體經營，合理種植，發揮土地效能。去年地少，仍比較零散，僅把十一塊小地合成四大塊，去掉了七道地界，擴大耕地五分。今年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十六小塊合成了七大塊，又擴大耕地一畝三分。這樣，就更便於使用新式農具了。……根據國家和自己的需要，全社種植穀子、玉茭、山藥蛋、大麻四種作物。這樣就較去年更進一步地打破了小農經濟的『吃啥種啥』的限制。」

（二）合理地使用勞動力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在勞力使用上是和土地的使用同樣地不經濟，不合理的，互助組在這方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由於互助組的基礎仍是分散的，不能打成一片後統一地支配勞動力，所以，在合理使用勞動力上，仍舊受着很大的限制，農業生產合作社却把這種限制衝破了。由於勞動力的統一使用，第一、可以適當地根據作業性質，按照社員的體力、經驗、特長等實行分工分業，把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結合得更好，達到人盡其才，大量節省勞力，提高勞動效率，改進生產技術的目的。如天津張貴莊各農業生產合作社專人育秧(水稻)、管水、防治病虫害；長治專區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大部都實行了按「把式」分別專掌犂地摇耬等，長畛社也分配專人管理棉花、蔬菜。像這樣分工分業的結果，對於提高勞動效率，改進生產技術各方面，都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第二、把原來在互助組中零星的剩餘勞動力（如婦孺老弱）集中起來，有計劃地使用到生產的輔助工作以及副業工作上面，這樣便擴大了剩餘勞動力的使用，解決了互助組中所不能解決的這個問題。例如王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男勞動力二十七個，祇需十七個人從事農業生產就夠了，可以經常抽出十個人進行其他生產工作。又如長治專區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年來共有剩餘勞動六千四百六十五個工，投入土地基本建設的共二千五百二十三個工，修地堰一千一百零五丈，開渠道三百七十丈，改良土壤三百四十一畝，打洋窰兩個，還有一部用於開墾河灘地與熟荒地，增加很多收入。用於副業手工業方面的計三千九百四十二個工，收入共達四千一百五十六萬餘元，等於全社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五。第三、土地統一使用，勞動的對象變成一個整體，再加記工分紅，按勞取酬制度的實施，多增產即可多分紅，就使個人利益和合作社利益結合起來，因此，大家的勞動積極性就空前地提高了。金時龍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沒有組社以前，互助組內發生種種矛盾，如早種、晚種，早收、晚收的矛盾；地早劃晚劃、上午劃下午劃、雨前劃雨後劃的矛盾；上工收工早晚的矛盾等等。由於這些矛盾的不得解決，組員們的勞動積極性沒法提高，但在一九五一年發展成爲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後，勞動熱忱大大提高，從而產量亦大大增加了。

（三）擴大了生產投資　這幾年來，老區農村中已普遍地出現了中農化的情形，這說明農民的手頭可以有些資金來投入生產了。就整個農村說來，這些資金的數目是不小的，但就每個農民而言，却很難有效地用到生產上去，國家的幫助也不可能解決每家每戶的問題，互助組在這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自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出現以後，由於它的集體經營，使資金統一集中使用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外加公積金制度的實行，因此，在數量上擴大了農業生產（包括副業）的投資，在質量上，使資金用到最有效最需要的方面。個人無力擴大再生產的困難被克服了，國家的幫助也可以更集中更有效地進行了。譬如長治專區十個社一九五一年就集資或貸款購買農具一百七十七件（內有新農具農械五十七件），牲口十七頭牛，這都是分散的個體經營或互助組很難辦到的。

（四）改進了生產技術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種進步的生產形式，它一開始便顯現出小農經濟分散經營時所不可能實行的技術的改進，首先是普遍地使用了新式農具，因此提高了耕種技術。華北各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普遍地作到深耕，多耕，而且一反以往的習慣，能及時秋耕。這種對於使用新式農具的要求，將隨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而愈益迫切起來。其次，在肥料問題上，根據范長江同志在川底村調查時所認識到的，一九五一年的施肥數量，每畝要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十五，倘與社外相比，那就比同村好的互助組每畝要超過百分之三十，也比同村單幹戶超過百分之六九。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土地統一經營，肥料集中使用，可以很科學地做到「因地施肥」。還有在水利方面，能够比互助組更大規模地搞起來，如長治十個社在五個月中，就打了二十七個井，水渠七條，並用其他方法，使七七四•一畝旱地變爲水田，同時打旱井三十四眼，修旱渠十八條，築旱池三三個，共可澆地四三三畝。同時由土地勞力的統一經營，統一使用和資金集中籌集較多，所以能有條件搞農業生產技

術的小型試驗研究，如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已設立了一個小型農業試驗場，有一畝四分地，一九五一年曾作了十種作物試驗，爲一九五二年選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在耕地、播種、鋤苗，收割四項工作的時間問題上，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比互助組優越得多，它解決了互助組在農忙時爲了爭取「及時」往往發生不團結甚至分裂的現象。所謂「越忙越旱，越不好幹」這種困難沒有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定縣的農民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有這樣的評語，他們說：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三能變：能將旱地變水田，冬閑變冬忙，壞人變好人。這說明了農民對這種比較高級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認識。從這種生產形式所共有的優越性上，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集體農莊的初級形式，也可以看到中國農業生產的無限光輝的前途。

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比之個體經營和互助組有上述各種優越性，所以它在農村中就必然產生各種有利於農村經濟向集體化道路前進的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第一、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力顯著提高，農民收入增加，因而社員生活顯著改善。這種情況可從范長江同志的川底村調查報告中充分地看出來。

該社在純收入方面，一九五一年七個月每社員平均爲四八七、五〇〇元，比一九五〇年的三五一、〇〇〇元多了百分之三八•七。如以一九五一年全年計，比例還要更大一些。一九五一年同村好的互助組，每人平均七個月的純收入爲三五三、九〇〇元，合作社每人平均比互助組多百分之三七，同年同村最强單幹戶每人平均純收入爲三三〇、〇〇〇元，合作社比它要多百分之四七•五。

由於收入增加，社員生活亦大大提高了，每戶都存了半年煤（過去普通農民祇能在過年節時才用一二百斤煤），多數社員做了過年的新衣。全社各戶共添置四條毡子，四條被子，兩條線毯，一條褥子。在吃的方面，細糧比過去多了，飯的花樣也多了。一九五〇年每日三餐只有兩餐吃鹽，一九五一年秋收後，三頓都吃鹽了，而且有了鹹菜，過去過年過節才吃醋，一九五一年平均都吃到了。社員已普遍點煤油燈，把剩下的豆油改善了伙食。蓋房的人也多了起來，一九五一年有兩家蓋了四間房，有兩家準備一九五二年蓋房，有一家糊了頂棚。

在十八戶社員中，十七戶一九五一年都有餘糧，一九五〇年祇有六戶有餘糧，一九五一年餘糧戶中多的餘六、七石，少的也有三、四石。

其他農業生產合作社如耿長鎖社、三柳樹村合作社、長治等區的十個社等都呈現着同樣的好氣象。

第二、對社員的思想意識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影響。存在決定意識。上面說到的現實利益，對社員們來說，就是活的教育，社員們的思想意識，已經發生了相當顯著的變化，而且正在繼續變化着。個人主義的思想已逐步削弱，集體主義的思想已逐漸加强，大家都能熱愛社，要求擴大公共財產，主動地愛護公共財物，有的社員竟把社當作自己的命根子。如川底村社員郭東先說：「在過去土地是個人的命根子，現在土地合作社（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我們的集體命根子。」

由於在集體生產中，便於進行政治教育，所以，集體主義表現在政治上的愛國主義思想也增長了。川底村社的愛國捐獻，共捐了四十三萬元，佔了全村捐獻總數的百分之三八。三柳樹村合作社捐獻飛機欵達四百餘萬元，每年總是把一等地裏的糧食晒乾揚淨交公糧。此外，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促進了社員學習文化的要求，川底村現有二九人學習珠算，二九人都有語文和算術課本，青年每天都學寫字。三柳樹村合作社現在有長年學校，學生三十二名，半日制學生十五名，婦女識字班學生十四名，冬季夜校學生二九名，參加上政治課的有三十多名，每個青年都參加了一種學習組織。再如正確的勞動態度，互助友愛的精神，也都初步培養起來了。

第三、對非社員農民也起了一定的影響。以川底村合作社爲例，由於該社在各方面獲得顯著的成功，原來對社抱懷疑觀望態度的人們，現在都異口同聲地說：「單幹趕不上互助組，互助組趕不上土地社（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一年秋季總結時，平順全縣十二個模範互助組三十二個代表到川底村參觀的結果，都普遍要求照川底村的模樣組織起來。同樣，五公村的人們提起了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都眼饞地說：「要想把種地的買賣做好，非像耿長鎖他們那樣組織合作社不行。」

在短短的幾年期間，使廣大農民在思想意識上有這種顯著的改變，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毛主席告訴我們，今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使廣大農民改變了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思想（尤其是小農的保守的個人主義思想），逐漸認識集體主義，這對於我們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前進是一個基本性質的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可置疑的。

五　基本的經驗教訓

從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功與失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下面幾點基本的經驗教訓：

（一）必須從互助組發展良好的基礎上過渡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平地起堆，就容易失敗。這個道理很簡單，農民集體的組織生活是需要逐漸加以培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比互助組又高一級的經濟組織形式，它的管理制度比互助組更複雜細緻了，沒有經過勞動互助組階段的初步集體生產和生活的鍛鍊，是很不容易運用這些複雜細緻的制度的。由互助組進到合作社是組織起來發展

生產的一般的正常的發展規律。如辛自修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就是很好的榜樣。倘不經過互助組階段，平地起堆而組成合作社，即使社的發起者，大部是思想進步，善於接受新鮮事物的勞模、村幹部，然因缺乏一定的基礎，就會形成骨幹積極，一般社員消沉的現象。結果反而欲速不達。如定縣、饒陽等縣，就有這樣的情況，各地應該引以爲誡。

（二）要掌握民主管理原則。經驗證明，凡是充分貫徹了民主，一切事情走羣衆路線，所有各種制度、紀律、重要決定，先交羣衆充分醞釀討論，然後作出決定，再交社員執行，這樣，社就能團結得好，生產情緒就會高。所以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以社員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定期召開社員大會，一切重大問題，社務會議（如長治專區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由社長、副社長、生產組長組成）必須在大會上向社員作報告，然後經大家討論，最後通過。社內一切都對社員公開，定期公佈經濟賬目，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樣，就可以密切社員與社的關係，增强社員對社的責任心，發揮社員的積極性，提高社員的生產情緒。如長治專區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年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够民主的地方，少數社有被區幹部包辦的現象。因此，有的社員認爲社是「公家的社」或「社長的社」，去年秋收後，作了一次民主鑑定與民主改選，改進了社內領導，同時規定了一年一改選，每季一檢查的制度，按期對賬公佈，修改了缺點，五個月來，十個社在生產上便獲得了顯著成績。這點證明：加强民主管理是鞏固合作社的重要環節。長治專區十個社的民主管理作法，就是很好的經驗，是值得推廣的。

（三）堅持自願互利的原則。由互助組發展爲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必須經過充分的思想動員的過程。針對社員的具體思想情況，解除各種顧慮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更應注意到社員家庭中每個成員的思想，這樣就需要開好家庭會，掃除組社的障碍，這是建社初期的重要的一環。中共屯留縣委介紹「屯留縣東坡村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初步成就與經驗」中說到：提出試辦合作社後，有的農民說：「這可不是耍的，是要定窮富哩；」土地入股時有的打算：「入遠地，留近地」或「入壞地，留好地」。因此，一開始就堅持了說服動員的方法，通過總結經驗，抓住組內的思想情況，宣傳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並進行思想教育，指明社會發展的遠景，然後反復醞釀討論，使大家明確合作社的性質、目的。並規定「進社自願」「出社自由」。合作社才能順利地組織起來。辛自修等試辦的成功的合作社的建社過程，也是這樣的。反之，倘不經過充分醞釀討論，不是羣衆普遍地對合作社有了深刻的認識與堅決的要求，而以强迫命令的方式組成，就必然會損傷了社員生產的積極性，結果必然不利於生產，合作社自然也不會辦好。合作社既然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的經濟組織，所以各種複雜的實際問題，例如入地、評產、生產資料入股、評工、分配比例等，領導上必須按照羣衆的覺悟程度，估計實際情況，遵照自願互利的原則仔細考慮加以解決。死搬經驗不結合實際情況，就會對社的發展與鞏固造成損失。例如分配問題原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中心問題。「勞動創造財富」，原則上分紅比例應以勞力爲主，這樣可以鼓勵勞動積極性，有利於生產。可是目前各地合作社分紅比例就有出入，長治專區十個社的經驗是：產量固定（入社時評定後不動），分紅比例則按各社每年的實際情況民主決定，上級批准。去年十個社分配比例是公積金佔百分之八至十，土地百分之三十七至四二，勞動力百分之五十至五三。定縣專區二百零一個社的統計是：勞四地六分紅的有一四二個，對半分紅的二十個（大部是舊社），勞三地七的八個，固定地租的二十二個，其他的九個。從這裏可以看出：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分紅比例是很難一致的，因爲，各社的條件與羣衆覺悟程度的不同，彼此相差是很大的，所以，在開始組社時，對分紅比例領導上應當很好地加以考慮，根據自願互利的原則，通過社員討論民主決定。以後生產發展，收益增加，覺悟提高，再逐漸縮小土地分紅的比例。這樣的作法，是比較穩當的。

（四）社員個人留地，應盡量地少，最好是僅留種菜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辦得有成績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個人留地少，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就可以減少自留地與入社地在耕作上發生矛盾，因而產生兩條心的不良現象。事實上，社員所種的自留地，並不比入社地種得好，反而在支配勞動時間上，增加了一層麻煩。山西武鄉窰上溝農業生產合作社，個人留地雖僅有五分之一，仍發現在勞動時間上個人與社有矛盾。去冬經過民主討論，規定了三項辦法：一、每戶自留地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二、只限於種菜、瓜、豆角；三、留較難耕作的極小塊土地。這個經驗是值得各合作社學習領會的。自留地少了，就可更集中精力，必能更科學地掌握勞動時間，合理地使用勞動力。抽出更多的剩餘勞動力投入副業生產，更增加收益，擴大與鞏固社的發展。

（五）必須有優秀的勞動模範、黨團員幹部爲骨幹，形成社的堅强核心。骨幹可以說是社的靈魂，一切要起帶頭作用。因爲他們有較好的品質，政治覺悟高，較易接受新鮮事物，工作積極，肯聯系羣衆，有較豐富的領導生產的經驗與能力，他們能先公後私，以身作則，教育羣衆，所以在羣衆中有威信，通過他們，可以帶動全組。長治專區十個社能辦得很成功，有黨團員與勞動模範爲社的核心，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辛自修互助組所以能够順利地變爲合作社，也是和辛自修等積極分子的帶頭領導分不開的。所有成功的合作社，都肯定了這一條經驗。

（六）必須有黨的堅强領導。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比互助組更高級更複雜的

農業經濟組織形式。社員雖然在互助組的階段初步培養了集體生活的優良習慣，但農民小生產者的散漫性和落後性，仍然根深蒂固，隨時隨地可以表現出來，形成個體與集體的矛盾。因此，黨的領導是絕對必要的。在初辦階段，尤其需要黨給予具體幫助。此外，更須對社員不斷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集體主義的思想教育。這樣，使農民除了收入上得到增加而外，在思想上也逐步得到提高。長治專區十個社去年的成績，不僅在生產上比一九五〇年互助組時有了顯著的提高，改善了社員的生活；而且在參加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愛國豐產競賽、擁軍優屬等運動上，也都較一般羣衆爲積極，通過這一系列的轟轟烈烈的運動，社員的政治覺悟更大大地提高了。另外，在文化學習上，也有很大的收穫。並在春夏秋三次評比中，有的社通過了羣衆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表揚和獎勵了好的，批評了壞的，因此端正了社員的勞動態度。無怪參觀合作社的羣衆會這樣說：「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但可以多生產，而且可以提高覺悟，提高文化，就是好。」長治專區十個社在建社第一年能在生產上、政治上、文化上獲得如此輝煌的成績，是和長治地委以及各縣縣委的堅强領導分不開的。這個寶貴的經驗，各地區就應該特別加以重視。

（七）國營經濟和供銷合作社等的幫助。銀行貸款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擴大生產投資，並加速公共財產的積累；供銷合作社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副業，並保證農業生產資料(如豆餅、肥料、農藥等)和生活資料的供應，以及經濟作物和副業的銷路。這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與發展都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如川底村合作社去年受到人民銀行貸款九百八十萬元的幫助，就能更順利地發展起來。又通過受平順縣供銷社的委託，給長治土產公司做了裝黨參的木箱五百個，也給該社副業的開展以很大的幫助。這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因此，今後國營經濟也應儘可能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給予各方面的幫助。

六　目前存在的較有普遍性的問題

截至目前爲止，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一般說來是順利的。但須指出：在某些方面也還存在着一些問題。爲了使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够更順利地向前發展，特別是爲了避免在發展過程中發生偏差，這些問題應當得到足够的重視。

第一、土地分紅的比重問題

前面已經說到土地分紅的比重應當小於勞動力這一原則，但在這個原則之下，也必須照顧到使土地入股多於勞動力的社員實際上不感覺吃虧，否則有的人就會不肯入社，或入社後要退社。自然，社員吃虧與否並不完全決定於土地分紅比例的大小，主要還是看社員入社前後實際收入的高低。例如：個別社員的土地在入社以前，只能種玉米，入社後，就能種蔬菜，這樣，即使土地分紅比重定得較低，但這個社員的實際收益，還比單幹時要高。一般說來，經營比較集約的地區，在入社時，土地分紅的比重定得較大，如河北省的土地分紅，就較東北爲高。但以後合作社的生產力逐步提高，就應逐漸減低土地分紅比重，農民在分紅問題上對於土地過於重視，自然是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原因的，但應逐步加以改正。否則，隨着生產力的增長，這種偏差也就會比例地擴大，它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爲了減小土地分紅的比重，目前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採用的方法是：（1）副業勞力股與農業勞力股統一分紅，此點前面已經講過。（2）規定了分紅的比例，而農業稅則由土地原所有者負担。不過，農業稅並不是單純的財產稅，而是統一稅，在合作社統一經營制度之下，它完全仍由土地所有者來負担，是否妥當，這一問題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3）超出計劃以外的增產部分，完全分與勞力股。不過，如果考慮到，計劃產量總是隨着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超額產量，總是不會很大的。所以，這種辦法不會發生太大的作用。（4）死分的辦法，比較起來當然最好，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土地分紅比重已經規定得大，就不能再硬性地減小，只能將目前土地的實際分紅量定爲固定的地租，以後生產效率再增高時，即與土地無關，這種可使農民比較易於接受。以後農民的政治覺悟逐漸提高，同時組成合作社之後，生產效率就獲得顯著的增長，這一事實會教育農民，使他們認識到所以能够增產的原因是勞動(集體勞動)，而不是土地，更進一步又可認識到，勞動才是眞正創造價值的，有了這種認識之後，上面的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解決了。

第二、耕畜當作勞力記工分紅的問題

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往往把耕畜也折成標準工，同人工一樣的記工分紅(如耿長鎖社，今年才改正)，這實際上是帶有剝削性的。這種辦法是由互助組中的人畜力評分等價交換的辦法演變出來的。這種剝削在生產力較低時，也還不甚爲人注意，生產力越提高，問題也就越顯現出來。如天津某社一九五一年每一勞動日分稻米三十九斤，畜力也照分，缺少耕畜的社員們就紛紛反應說：「牲口把人剝削了」，實際上是牲口所有者剝削了別人。解決這個問題的好辦法，是由社方備價將社員的耕畜收買過來(社方經濟力量不足時，可採分期付款的辦法)。

第三、公積金及公共財產的問題

有的社員因爲考慮到社員入社先後不同，能同樣享用社內的財產，因而對於累積公積金和發展公共財產不感興趣，這是一般農民尚未樹立集體主義思想以前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不過，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應該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就目前來說，合作社的公共財產主要是生產資料，不可能限制以後入社的社員享用。另一方面，如果因入社有先後而在收益分配上加以差別待

遇，顯然又妨礙了吸收新的社員，也就是限制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擴大。爲了解決這個矛盾，似可規定後入社的社員要繳一定數額的金額，這筆金額不必繳現，可由該社以後應分的收益中分年扣還。這樣，使舊社員不再感到吃虧，同時，新入社的，也沒有籌款的困難，以後社的生產力迅速地提高，每年扣還一部分收益，在新社員是不會感到負担的，有了這種辦法，公共財產就可順利地增加起來。同樣，對於積累公積金，大家也就沒有顧慮了。

社員退社時，是否要分走一部分公積金和公共財產，也是一個問題。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大部的意見對此是否定的，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如公積金和公共財產是由共同勞動累積起來的，不能算作個人財產。或者認爲允許退社社員帶走一部分公積金，就會影響整個社的生產。有的就說計算起來太麻煩。還有的指出合作社所以能有好的成就是和政府方面的幫助分不開的，假定公積金代表了這一方面的收益部分，退社的人是無權分享的。以上所舉的理由，雖然都很有力，但爲了維持自願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一定要堅持的），我們認爲不應絕對地加以否定。在一定條件之下，主要是在較大生產設備和工具不致破壞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分給退社的社員的。理由是：（1）無論如何，這項財產總是全體社員們的勞動所得。這樣，凡是參加勞動的人，都應當有一份。如果不許退社社員帶走，想退社的社員就會因此而苦惱。不但退社自由成了一句空話，社員的勞動情緒也多少會受到影響的。（2）目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公積金，祇能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它本身却還並不就是社會主義的財產，而是社員們的，亦即若干私人的共有財產。照這樣說，退社社員就有權利要求帶走他們的一份了。（3）計算每個社員應分的價值數量，誠然較不容易，但實際上也並不一定要求計算得不爽毫厘。換句話說，社和退社社員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是並不難獲得協議的。

以上所舉的理由，也還是表面的。基本上我們還得從整個農業生產發展的觀點來理解這個問題。爲了使農民自動自願地走向政府所指示的方向，這就必須照顧到他們的一切想法和解除他們的一切顧慮，在作具體的處理時，不應固執地引據大道理，而應首先考慮到農民的政治覺悟程度，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採用民主評定的方式來估定退社社員應當分走的公共財產部分，大概是沒有什麽困難的。如果入社後土地經過了顯著的加工，退出時也應給予社以一定的補償。可以想像得到，越是堅持退社可以分走公共財產的原則，社員們也就越對累積公積金和發展公共財產減少顧慮。更進一步說，關於退社分財的問題可以不必予以太多的考慮。更重要的還是想法把農業生產合作社搞好，社搞得好，社員自然不產生退社的念頭，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第四、農業生產合作社規模大小的問題

一般說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經營規模的大小，決定於兩個因素：一是具體的生產條件，二是幹部領導的強弱。目前東北和津沽水稻區的合作社規模較大，這是因爲前者工業比較發達，農業機械化的程度較高，後者則有國有土地和國營灌溉制度的基礎。像寧河大陳莊合作社就擁有七八十戶的社員和一千畝地，合作社規模越大，生產分工也就越精密，組織也就越複雜，因而幹部的堅強領導也就越需要，這個道理是很顯然的。

目前各地合作社的規模，一般是社員一二十戶，土地一二百畝，最小的祇有社員四五戶，土地數十畝。最大的可以大陳莊合作社爲例。規模過小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過大時，又不易管理領導。尤其是在與具體生產條件不能相稱的情況之下，規模大了，反而常常使經營趨向於粗放，這是特別要避免的；因此，在擴大合作社的規模時，必須是以上述兩個決定因素爲準則。

最後要補充指出的是所謂經營規模，並不完全以土地面積爲標準，如果條件具備，也可作深度的發展，例如加添或擴大養畜部門等等。尤其值得推薦的，是把因合作社經營而節省出來的勞動力儘量用於精耕細作、植林種樹、與修水利等方面。在一般情況之下，這是要比搞副業辦法好得多了。

第五、地塊調換的問題

因爲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依自願的原則組成的，所以一個社的土地雖有一部分可以化零爲整，但大部分不免仍分散多處，經營起來，自然有些不便。目前各地合作社是用增購和與社外農戶掉換的辦法來化零爲整，儘可能使土地集中，它雖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仍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由政府用命令來解決，也是要絕對避免的。唯一的前途，就是要在「組織起來」普遍發展的過程中，由組織與組織相互間進行掉換調整，這個問題就會順利地獲得解決。那時不祇一般人的政治覺悟都已提高，土地凌亂的不合理的情況也被每個人充分認識到了，自然不會讓它繼續存在下去的。

第六、農副業的比重問題

首先必須肯定的就是成立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目的，是在於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引導農業走向集體化的道路，因此就要設法加強這種生產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經營副業是爲了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調劑農業勞動的季節性，並增加社的收入，而其最終目的，正是充實合作社的力量，亦即發展農業生產。換言之，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是以農業生產爲主，副業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照這樣說，農業生產合作社內農業和副業的比重是非常明顯的，農業生產所佔的比重一定要大於副業。如果出現了相反的情形，就會發生偏差。目前有些個別的合作社，就已表現了這種偏差。如耿長鎖社「最近兩三年來副業逐漸增大，一九五〇年副業收入已超過農業」。就目前情形來說，社員對農業生產不

重視的偏向雖還不甚明顯，但「對農業技術的改進，土地的加工已表現得有些不够了」。尤其突出的例子是大名張希順的合作社，那個社是完全放鬆了農業生產，把主要力量用於副業方面，甚而至於計劃着要開磁器店、鐵貨店，簡直是向商業方面發展起來。該社的這種偏差，現在已經得到糾正，各地的合作社都應當接受這個教訓。還有些合作社把政府給予的生產貸款大部分用到副業上面。「地裏的肥料不足，却把國家貸款蓋房子，僱粉匠開粉房」。「借到農業貸款不用於農業而搞畜牧、運輸等副業生產」。像這種捨本逐末的作法，顯然受着單純營利觀點的支配，是亟須加以糾正的。

七　如何進一步發展

大家知道：互助組之所以擴大爲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由於農業生產力恢復和發展的結果，是由於互助組這種低級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滿足農民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要求。但是生產力是永遠向前發展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如果不把它的內容繼續加以充實，如果不把它的組織形式繼續向前發展一步，那末，農業生產合作社也仍然會發生渙散的現象。因此，我們對於如何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就必須予以考慮了。

在這個問題上，最基本的關鍵，便是要加强工人階級的領導。這裏，我們必須認清：保證逐步走向農業集體化的基本力量，是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因此，除了應加强政治教育外，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通過下列的工作來具體實踐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幫助：

第一、應領導農業生產合作社走向組織經營的合理化和擴大再生產的道路，並提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成分。如逐漸降低土地分紅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擴大公積金和公共財產的積累，逐步擴大經營規模，進一步提高技術和改進勞動組織形式等。這樣，就可使農業經營走向大生產和集體化的道路，使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經濟上和組織上進一步獲得鞏固與提高。

第二、國營工業應主要在生產資料的供應上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有其優越性的，它集中了土地勞力和資金，擴大了生產規模，爲農業技術的改進創造了條件。因此，城市工業，特別是國營工業就必須進一步來滿足農業生產上的需要，以新式的農具、肥料和農藥等，優先地供應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任務，從農業生產合作社新的發展速度來看，是會一年重於一年的。因此，今後國營工業就必須大量製造和供應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特別是對發展生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農業生產工具，更應有計劃地擴大生產和供應，目前各大行政區及省已逐漸建立了農業機具製造廠，大量製造新式農具，這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是會有很大幫助的。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長期地發生工業和農業的不平衡發展的現象，才能鞏固工農聯盟，才能加强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

第三、國營農場要在技術上給周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指導和幫助。在目前可以國營農場爲中心，訓練農業技術指導幹部，或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技術上的聯系等，以推廣新農業技術，而逐步總結和提高廣大農民的豐產經驗，加以傳播。尤其重要的是，爲了提高耕作技術水平，國營農場還須依據工業發展的條件，與農業生產合作社訂立耕種合同。總之，各級政府所領導的國營農場，是必須發展成爲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和科學化的模範，以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教育農民；並具體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改進生產方法，以提高它的生產力。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吸引農民參加到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組織中來。

第四、國家銀行應給予農業生產合作社以貸欵的幫助。因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是要求有國家財政的援助的。不但在建社初期，需要國家貸欵的幫助，就是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更需要有國家財政的支援來擴大再生產的投資，這樣就可以幫助解決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擴大經營，提高技術與發展生產上的各種困難；並加速其公積金和公共財產的積累。同時，國家銀行除給予農業生產合作社優先貸欵外，還應盡力給予低利的優待條件。

第五、國營貿易機構和供銷合作社，要在物資交流上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取得密切聯系，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解決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供給和農副業產品的推銷，並給予優先的權利。這就要求供銷社與農業生產合作社訂立預購合同，或成立其他形式的經濟聯系，以鞏固和擴大物資的流轉。這樣做了，就可以進一步增强國營經濟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具體領導，可以逐漸克服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的盲目性，增强生產的計劃性，使農業生產在適應國家經濟計劃的基礎上得到輝煌的發展。

最後，還必須指出：任何輕視互助組的傾向，都是不對的，必須防止片面地强調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而否定了互助組的作用的偏向。因爲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互助組可以在物質條件方面，農民的思想意識方面，以及集體勞動的經驗和習慣方面，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創造有力的條件；而且，目前全國各地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還不平衡，在廣大的新區，組織起來的比重還不很大，所以，目前的政策就應該是：「在全國範圍內，應普遍大量發展簡單的、季節性的勞動互助組；在互助運動有基礎的地區，應推廣常年定型的、農副業結合的互助組；在羣衆互助經驗豐富而又有較强骨幹的地區，應當有領導、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他專業性質的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亦應適當加以提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的决定」）我們必須遵照這個決定去努力奮鬥。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

胡 繩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已兩年。在這個偉大的科學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但天才地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語言學上的問題，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作了新的極其傑出的貢獻。斯大林同志的論文的發表，對於中國的學術工作，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發揮了關於上層建築和基礎的辯證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根本肅清了在這些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各種錯誤觀點。這種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錯誤觀點原來也出現於中國的學術界。

我們的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經以爲只要去收集一些關於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生產技術的材料，就可以表示自己是歷史唯物論者，就可以隨便判斷這一個或那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他們企圖用生產去直接說明上層建築。斯大林同志使我們看出，像這樣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基礎並不是生產力，上層建築不是與生產直接聯系，而是通過經濟基礎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的。經濟基礎的問題，當然要比生產力和生產技術問題更複雜得多。我們必須排斥那種只滿足於收集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材料，而不去充分地研究經濟基礎的辦法。這種辦法，表示了研究者的偷懶。

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工作者以爲只要說明了基礎，就可以不去具體地研究上層建築的問題。這就把上層建築看做只是消極地中立地反映基礎的。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因此，在對社會歷史的研究中，既須切實地研究經濟基礎，又必須切實地研究上層建築，即研究「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研究它們是怎樣反映了基礎，又怎樣起積極作用於基礎的。斯大林同志關於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的理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學術研究者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學術研究工作是屬於上層建築之內的。由於新社會條件使我們可以無限制地進行追求眞理的勞作，我們工作的成果就應該能够對於新制度的生長和舊基礎的消滅起重大的作用。新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應該是以無產階級爲首的中國人民推動自己國家向前發展的有力武器。但我們的研究工作在目前縱然還不至於「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却也和我們所應負的任務距離很遠。

斯大林同志的論文又使我們知道，各種社會現象，並不都是或屬於基礎或屬於上層建築的。有的研究工作者並沒有具體地研究一個個社會現象的特點，就任意地把它們配置到基礎或上層建築的框子裏去。斯大林同志的理論掃除了這種幼稚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各種社會現象之間雖然有其共同性，但「問題是在於：社會現象除了這個共同東西之外，還有着自己專門的特點，這些專門的特點使社會現象互相區別，而且這些專門特點對於科學最爲重要。」斯大林同志的話使我們想到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的論述。毛澤東同志說：「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因爲斯大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都重視具體研究，而拒絕只靠抽象的公式來討論問題，所以他們就成爲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徹底地戰敗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

斯大林同志的論文中，提出了使教條主義者驚訝的若干論點。他使我們懂得，有些社會現象，例如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他使我們懂得，有些社會現象的發展歷史，例如語言的發展歷史，是不需要經過爆發（註）的。斯大林同志區別了人民必須由下而上地進行革命的時期和革命人民已經取得政權可以由上而下地進行革命的時期。在後一時期中社會改革的實現，就可以不經過爆發。斯大林的這個理論對於我們研究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啓發。

斯大林同志在論文中關於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和簡單化的觀點的來源所做的分析，也適用於中國。

斯大林同志尖銳地批評了那種「認爲可以脫離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時期而

引證某一作者的著作」的錯誤。我們這裏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讀了很少的或較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他們選擇了自以為看懂了的句子和自己發生興趣的句子，拿來做根據，就以為有權利可以任意發號施令。這是很危險的。我們如果不堅決克服這種情形，就不可能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說：「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不深入事情底本質，不管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條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證，結果必然陷入走頭無路的狀態。」

在我們這裏，還有些人用一種可以說是在外部貼標籤的辦法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分析。例如，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歷史的基本方法。為要進行各種社會現象的階級分析，既需要對於當時整個社會的基礎和上層建築有足够的認識；又需要對於個別的社會現象進行具體研究。如果沒有這些研究工作的準備，只是就各種社會現象的外部關係想當然地貼上這個或那個階級的標誌，這顯然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毫無共同之處。人們必須知道，在一個演講或文章中充滿了階級的字眼，並不表示這個講演或文章就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的論文在這一點上對於我們許多公式主義者，也給了重大的教訓。

在我們這裏的某些部門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也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所說的「軍閥式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只能養成固步自封的習慣，不負責任的風氣和各種專橫的行為。我們的學術工作者中有許多是謙遜的、認眞的，對自己工作採取嚴肅的態度；但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自以為是，拒絕批評。在我們學術工作中認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極端缺乏的，這種情形對於學術工作的發展是嚴重的妨礙。

斯大林同志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見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的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定義使我們看到在中國的理論工作的無限發展的前途。我們國家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我們的國家將經過工業化而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的學術工作必須跟着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而向前發展。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的論文和其他著作給了我們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論文發表後的兩年來，我們還沒有足够地咀嚼在這論文中的豐富內容，拿它來武裝我們並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繼續努力。

（註）「爆發」，原來中譯本譯為「突變」，是譯得不對的。——編者

（原載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

馬特

編者按： 近幾年來，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問題，在蘇聯哲學界曾引起過爭論，也引起我國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經過一年多的討論，蘇聯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已經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可參閱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所載「蘇聯『哲學雜誌』關於邏輯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大貢獻。本文主要說明形而上學不同於形式邏輯，並對於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提出一些意見，現在發表出來，供讀者參攷

從本體論的形而上學到方法論的形而上學

要說明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從較遠的主題開始。首先，我們必須把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和本體論上的形而上學區別開來，但同時又要把這兩者關聯起來，因為前者的涵義是從後者的涵義發展出來的。

形而上學這個名詞淵源於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討論超越時間空間事物本體的原理的。亞里士多德原把它叫做第一哲學，又叫做神學。在教授的順序上，應先授物理學（即自然哲學），後授第一哲學。當亞里士多德死後，他的遺稿編輯之際（約紀元前一世紀），他的著作的整理者安得洛尼古斯，就把第一哲學的遺稿放在物理學的部分之後，因此把它叫做「後物理學」。我們之所以把它譯為「形而上學」，是根據它之作為研究超越時間空間事物本體的學說

這個意義。在我們中國的「易經」上曾有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說法。按照唯心論的觀點，所謂「道」，就是超越時間空間的事物的本體；所謂「器」，就是存在於時間空間的實際的事物。

最初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於形而上學加以批判而把它與辯證法相對立的是黑格爾。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全書綱要」中的「邏輯學」著作中（通稱「小邏輯」），曾指出舊式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的主要特點，「在於以抽象的有限的悟性範疇去把握理性的對象，並將抽象的同一性認作最高的原則」。「例如，就『上帝是否存在』這一問題來說，舊式的形而上學家便認爲這裏所說的存在爲一純粹的肯定、究極的概念。但……存在並不僅僅是一種肯定的概念，而是一極低級的概念，不足以表達理念，亦不配表達上帝。又如就世界之爲有限或無限這一問題而言，他們也以爲這裏所說的有限與無限是絕對對立的。但這却容易看出，當有限與無限兩者互相對立時，而這本應認作代表全體的無限，僅表現爲偏於一面，被有限所限制着的一面。但被限制的無限仍不過是一有限之物而已」。很明顯地，黑格爾在這裏所批判的，僅僅是康德以前的舊式的形而上學；他並且特別指明：「這種形而上學的材料是從古代的哲學家，特別是從經院哲學家那裏採取來的。……柏拉圖並不是這樣的形而上學家，亞里士多德更不是，雖然有許多人常常以爲他們也是這樣的形而上學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着形而上學這個名詞，但他們所批判的形而上學，主要地不是康德以前的舊式的形而上學，而是在十八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的條件下形成起來的一種思惟方法。按照這種思惟方法，「事物及其在人腦中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變的、固定的、永久如此的對象；它們應當各別的、彼此不相關聯地被研究。形而上學者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中思惟着，他們的語式是：是——是，否——否；不然的話，便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任何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樣，某一事物，不能同時等於自己又等於其他事物。正面和反面，絕對是互相排斥的；同樣，原因和結果，也是完全對立的」。（恩格斯：「反杜林論」，導論）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的特點，就在於「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不見它們的聯系；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不見它們的產生和滅亡；只看到靜止狀態，而不見它們的運動；一句話，只看到個別的樹木，而不見森林」。（同上）像這樣的思惟方法，在本質上仍然還是康德以前的舊式的形而上學的演繹和發展，這不但是因爲這種形而上學在思惟方法上與康德以前的舊式的形而上學相類似，而且因爲這種形而上學在其推論到最後必然要把上帝捧將出來，它是與唯心論中最反動的流派之一——目的論分不開的。

就這樣，原來是屬於本體論的「形而上學」這個名詞，遂被當作方法論的意義來使用。因此，如果我們把本體論的形而上學跟方法論的形而上學兩個名詞的涵義混同起來，固然是錯誤；但我們如果不能從歷史發展上看出這兩者的關聯，把這兩個名詞的涵義截然分開，也同樣是錯誤。

列寧對於方法論的形而上學的涵義，曾有非常簡括而明確的規定：「這個名詞（即形而上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來說，就是反辯證法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形而上學方法論是在怎樣的自然科學條件下形成起來的？

這個反辯證法的形而上學方法論是在怎樣的自然科學條件下形成起來的呢？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形而上學方法論的形成，從自然科學發展的條件說，有兩個根本的原因。第一個根本原因是：從十五、六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分門別類的研究，在這個情況下形成了從孤立中看問題的態度。

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曾作如下的分析。恩格斯說：

「自然界中個別部分的分析，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之分成一定門類，有機體內部的各種部分的解剖研究——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四百年間自然科學知識的偉大進步之基本條件。可是這種研究方法，同時也傳給我們以一種習慣，把自然對象及自然過程孤立地加以觀察，把它們從事物之一般的大聯系中分離出來；從而不是把它們從運動中去觀察，而是從靜止中去觀察；不是被看做本質上變化着的事物，而是被看做固定不變的事物；不是被看做活的，而是被看做死的。以後培根和洛克就把這種觀察事物的方法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中，這樣的對於事物的見解，造成了上世紀來特殊的狹隘觀點——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反杜林論」，導論）

形成形而上學方法論的第二個根本原因是：從十五、六世紀直到十八世紀末，自然科學基本上還停留在機械力學的階段上。牛頓在天文學上的機械論的觀點，林耐在生物學上的物種不變論的觀點，曾是這時期的支配的意見。

按照牛頓的運動定律：「一切物體，若不受外力作用，則靜止的常靜止，運動的常以不變的速度，依一直綫而運動。」

牛頓的運動定律，從方法論的意義看，它的缺陷就在於只看到物體的機械的位置移轉的低級運動，而沒有看到物質存在形態的互相轉換的高級運動，如由熱轉變爲能，轉變爲電，轉變爲光等等。因此，牛頓就只能陷於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泥坑中，而不可能有辯證的發展的觀點。這是牛頓時代的自然科學發

展的條件限制了他，他還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的時代。

林耐是十八世紀瑞典的植物學者，他在生物分類上曾有非常大的功績；但他的物種不變論，却是使得生物學塗上形而上學色彩的觀點。依照林耐的意見，自然界不同種類的動植物，完全是在孤立中存在着，彼此不發生任何聯系和變化。從原始時代直到今天，永遠存在着一定不變的物種數目。

恩格斯在論到這個關於自然界之絕對不變性的見解時，曾作了如下非常生動的描寫：

「然而這個時代的特徵是一個特殊的總觀點的完成，這個總觀點的中心，就是關於自然界之絕對不變性的見解。不論自然界本身是怎樣產生的，只要它一經存在，那末，便永遠這樣繼續存在下去。行星及其衞星，自從被神秘的『第一推動力』把它們引入運動以後，便照着它們預定的軌道一直永久地運轉下去，或者至少是運轉到一切事物都完結的時候。恒星永遠靜止地固守在它們的位置上，藉『萬有引力』而互相維持。地球從泰初的時候起或從它被創造的第一天起（不論那一種情形），便永遠不變地保持着原來的樣子。現在的『五大洲』永遠存在着，它們永遠保持着同樣的山嶺、溝谷、河流，同樣的氣候，同樣的一地方的植物和一地方的動物，這些植物和動物只是由於人工的關係才發生一些變化或移植。植物和動物的種類，在它們產生時便從此永遠地確定下來，相同的東西總是產生相同的東西，並且當林耐說，由於雜交可能在這兒或那兒產生新種的時候，他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了。跟在時間上發展着的人類歷史相反，自然界的歷史只被認爲在空間上有着擴張。自然界中的任何變化、任何發展被否定了。在開頭的時候曾經如此革命的自然科學，却突然站在這樣徹頭徹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其中，甚至在今天，一切事物都和泰初的時候一樣，並且直到世界末日或千秋萬世，一切事物都將仍然和泰初的時候一樣。」（「自然辯證法」導言）

形而上學在社會歷史問題上的反映

從當時的自然科學發展的條件所產生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反映到社會歷史問題上，便成爲反對聯系、反對運動、反對質變、反對矛盾的觀點。

舉例來說，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在他們反對封建主義的時候，曾是進步的；然而他們却不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對於封建社會採取了一律罵倒的態度，不了解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必然關聯，不懂得如果沒有封建社會，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社會。他們認爲封建社會曾是人類愚昧的結果，是人類理性的錯誤。他們把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認爲是天然人對道德人的鬥爭，而用永遠不變的人類理性來說明何以資本主義要來代替封建主義。

與此相聯的，是十八世紀歐洲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看法。無可否認的，在他們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進步的；但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却不得不承認私有財產制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牢不可破的社會基礎。社會是爲着保護私有財產而創立的。照他們的意見，社會不能剝奪人的財產，因爲社會聯合的目的就在於保護每個人的財產。荷爾巴哈、黑爾維修他們，曾經企圖證明私有財產是人類天生的和神聖的權利，甚至比自由還神聖的權利。這樣，他們就在承認封建主義可以變、可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的觀點中，而仍保留着某種東西可以而且應該永遠不變的觀點、私有財產制度不變的觀點。

否認了這一事物與那一事物之間互相聯系的觀點，否認了由這一事物到那一事物之運動、變化、發展的過程，必然地就要反對事物的質變，並從而否認事物的內部矛盾。因爲承認事物的內部矛盾及其發展過程中的質變，就不可避免地要與上述觀點相反對，而走到形而上學的對面——辯證法的觀點上去。

現代西歐各國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思想和改良主義思想，就其邏輯錯誤來說，主要地就是只看到事物的量變，而抹殺事物的質變。

機會主義思想和改良主義思想的產生，按照列寧的說法，是由於西歐資本主義各國小商品生產大量存在的結果。這個思想的最大的基本特徵，就是反對用革命的飛躍的方法使得一種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制度，因而主張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修補社會的漏洞，藉以延長舊社會的壽命。照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純粹的量的發展，如財富的累積、勞動組織形式的改善、局部經濟計劃的出現、國家資本在某些方面的支配等等，就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長成。他們甚至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議會，也認爲是在資本主義內部發展起來的現成的社會主義。因而他們主張用參加資產階級的「選舉」來實現「社會革命」，而反對用強力去顚覆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觀點，從方法論的意義看，正就是只知量變而不知質變的結果。

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之所以反對質變，反對革命，又是由於他們不願看見事物的內部矛盾，不願看見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之不可避免和活生生的事實，因而主張階級調和的緣故。

從杜林到布哈林，在現代歷史上，一連串的機械論者和革命叛徒，都抱着這種形而上學的反對矛盾的觀點。他們或是只承認事物的外部矛盾，而不承認事物的內部矛盾（像杜林）；或是雖承認事物的內部矛盾，但不以爲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相反地，認爲事物的內部矛盾只是在事物的均衡狀態被破壞的時候才出現的現象，是均衡破壞的結果，從而否認事物內部矛盾的

普遍性或絕對性，實際是藉此來取消事物的內部矛盾及其對事物發展的決定作用（像布哈林）。

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之所以背叛革命，只就其邏輯錯誤說，正是由於抹殺了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中，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從而墮落到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照他們的意見，在目前南斯拉夫的條件下，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中，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是階級鬥爭的日趨削弱。他們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把農民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來看，而沒有看見或不願看見農民中分成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階層的差別，並由這些差別而必然發生的矛盾和鬥爭。他們的觀點，從方法論的意義看，也正是抹殺事物的內部矛盾、否認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之形而上學的觀點。

形而上學與形式邏輯

形而上學與形式邏輯是不相同的。過去我們由於反對形而上學，連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傳統的形式邏輯也反對掉了，這是不對的。自然，形式邏輯，作爲一種科學或學說來說，曾被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和現代資產階級的學者歪曲成爲形而上學或概念遊戲，把形式邏輯中的規律和形式看作與客觀事物的關係毫不相關的東西，並把這些規律和形式絕對地和孤立地僵化起來，成爲超越時間、空間和條件的漫無限制的「眞理」。像這樣的形式邏輯，也就是形而上學，這是我們所應反對的。並且，就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傳統的形式邏輯中，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其中仍然夾雜着形而上學的成份。然而不管怎樣，形式邏輯中的規律和形式，對於各個不同時代的各個不同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對於歷史上和現在各個不同的民族也是一視同仁的。這些規律和形式不是基礎上面的上層建築，所以是沒有階級性的，而具有全人類的性質。和語言一樣，作爲形式邏輯研究對象的思惟的規律和形式是與人類的生產活動以及其他一切活動直接聯系着的。對於研究這樣無階級性現象的科學的形式邏輯，我們不能與那些研究有階級性現象的科學，如社會歷史科學，混同起來。社會歷史科學，就其整個本質來說，是有階級性的；而邏輯科學雖然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在它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曾被各個不同時代的各個不同的階級所利用，但按其基本內容說，却不能認爲是有階級性的。對於這樣的形式邏輯，我們就必須把它跟形而上學區別開來，而不能把它跟形而上學混淆起來。

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學之所以被有些人們混淆在一起，主要是由於它們在歷史發展中曾經發生着交叉的情形，特別是由於形式邏輯曾被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和現代資產階級的學者所歪曲，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這種被歪曲成爲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而對於亞里士多德的傳統的形式邏輯，則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加以批判吸收。就是說，對於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傳統的形式邏輯在某些方面的脫離生活、脫離實踐的偏向，以及對於思惟的規律和形式在某些方面的唯心論的和形而上學的解釋，必須加以徹底的批判和克服。這就是我們對於歷史上作爲一種科學或學說的形式邏輯所應採取的態度。

例如，「是——是」、「否——否」的公式，如果單純從這個公式本身來看，它可以是形式邏輯的公式，也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公式，問題是在於你怎樣去解釋這個公式。從形式邏輯的觀點來看，「是——是」、「否——否」的公式如果是在亞里士多德的三節法的範圍內，即在對象、時間、關係的同一的界限內，是正確的，因爲（舉例來說）美國在此時此地的條件下，它只能是帝國主義，而不能是任何帝國主義性質以外的國家。但如果離開了亞里士多德的三節法，即從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是——是」、「否——否」的公式是錯誤的，因爲它把一個對象的性質看死了，把這個對象的性質離開它時間空間的適用的範圍而變成絕對，這樣，就使我們的思惟不能達到正確的判斷。（形而上學把形式邏輯絕對化了，所以，主觀主義必然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的基礎，它的判斷必然是錯誤的。而形式邏輯就不是這樣，因爲，在正確的應用下，它是可以擺脫主觀主義和武斷的。——編者）

所以，當馬克思反對黑格爾的「是——否」、「否——是」的公式時，指出黑格爾這個公式是把對立麻痺、中和、和取消的方法。爲什麼呢？因爲這個公式，如果用來指事物發展的過程，這個公式是正確的；但如果把這個公式拿來指事物在特定條件下的相對穩定的性質時，這個公式就不適用，因爲這個公式把事物在特定條件下的相對穩定的性質破壞了，從而我們的思惟就不能達到正確的判斷。舉例來說，資本主義之所以爲資本主義，正就是由於它是社會性的生產和私人性的佔有之間的矛盾的統一。如果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社會性的生產這個因素的存在，就以爲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這就把我們思惟的確定性破壞了，把矛盾麻痺、中和、取消了，而不成爲矛盾的統一了。——在這個場合，辯證法和形式邏輯中的規律是可以貫通的，因爲形式邏輯中的規律並沒有超越辯證法的範圍；相反地，辯證法和詭辯論却是完全處於對立的地位，因爲詭辯論和形而上學一樣，完全離開時間、空間、條件去考慮問題，把思惟對象看成是一種抽象的、騰空的、絕對的東西，而離開它活生生的具體內容。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有沒有進步作用？

到這裏，我們可以作出結論來了。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有沒有進步作用呢？我們可以說，不會有過進步的作用。爲什麼呢？因爲方法論的問題，正如世界觀的問題一樣，只有正確和錯誤的分歧，我們不能想像，錯誤的思想方法可以在歷史上發生進步的作用。

人們也許會說，形而上學不是在自然科學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一種思想方法嗎？爲什麼它不能有進步的作用呢？

從表面上看，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的確是伴隨着自然科學在它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但這僅僅是一種現象。透過這個現象，我們必須看出本質的所在。

本質是什麼呢？事情的眞相何在呢？事情的眞相就在：推動自然科學發展的是在當時逐漸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而作爲這個具有近代形態的世界觀的先驅的，則是培根所倡導的拋開教條、面向自然的經驗論（唯物論）和歸納法，而不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僅僅是自然科學在它發展過程中的副產物。這個東西必須在自然科學自身的壯大、成長的過程中才能完全被拋棄。十九世紀以後自然科學的發展就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培根所倡導並爲後來的人們所發展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怎樣會成爲推動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一種力量呢？如同大家所知道，培根當時所倡導的反對四種幻像論，即所謂種族幻像、洞穴幻像、市場幻像、劇場幻像，實際上就是對當時被經院哲學的教條所禁錮的思想方法來一個大革命，要求人們擺脫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憑信自己的理性，放開自己的眼界，向大自然蒐集活生生的材料，找尋具體的眞理。所以，培根說：「哲學的事業如蜂，蜂在園庭和原野的花上採集材料，但却以自己的能力消化而變化之。」（「新工具論」）培根的偉大功績，不在於提出偉大的系統，而在於提出一種主張，這種主張把人帶到廣闊的自然界，從僧房解放出來，看到眞實的世界，它打開了現代科學的門戶，使現代科學的研究成爲可能。照培根看來，眞理的標準就在於有用（這與中世紀經院哲學脫離實際、獵取玄想有別）。他說：「知識上的原因，就是工作上的規則。」「凡工作上最有用者，在知識上即最眞。」（「新工具論」）培根以爲人對於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知識愈大，則其統治諸事物即愈確定、愈自由。培根的這種思想，自然還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在基本上却不失爲當時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一面旗幟，成爲以後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發展的條件之一。自然，在培根的思想方法中仍然還帶有形而上學的成份，他把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從哲學的領域帶給自然科學，却又從自然科學中把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帶給哲學。培根的思想方法中的這種局限性和矛盾性，是他的時代所規定的，他的資產階級的立場所規定的，他不能超越他的時代，也不能離開他自己的階級。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到最後才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克服。

既然推動近代自然科學進步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拋開教條、面向自然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不是形而上學，那末，形而上學也就不可能有什麼進步意義，雖然它在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水準上曾是不可避免的；從而我們也就不能想像，一種沒有進步意義的錯誤的思想方法竟會比在歷史上雖是比較粗糙、比較單純的自發的辯證法來得進步。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早就有過非常肯定而明確的解答。恩格斯說：

「雖然十八世紀前半時期的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要高過希臘古代，可是它在理論地掌握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却比希臘古代要低得很多。對於希臘哲學家，世界在本質上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是某種發展着的東西，某種形成着的東西。對於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家，它便是某種硬化了的東西，某種不變化的東西，而對於他們大多數人，則是某種一下子被創造的東西。科學還深深地禁錮在神學之中。它到處從外面尋找和覓得從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說明的推動力來做最後的原因。如果牛頓所誇張地命名爲萬有引力的吸力被當作物質的根本性質，那末，首先使行星循着軌道運動的未被說明的切綫力是從那裏來的呢？植物和動物的無數的類別是如何產生的呢？而早已確證並非亘古就存在着的人類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於這樣的問題，自然科學常常僅僅以萬物創造主來搪塞。哥白尼在這一時期的開端寫了一封擯棄神學的信；而牛頓以神的第一推動力的假定結束了這個時期。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最高的總的思想，是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是淺薄的伏爾夫的目的論，依據這個目的論，貓被創造出來是爲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爲了被貓吃，而整個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爲了證明創造主的智慧。當時哲學的最高的光榮，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所引入迷途，而它——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都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而把詳細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自然辯證法」導言）

恩格斯的這一段話，可以作爲我們對於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的總解答。這就是說，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十八世紀的自然科學，就其一般發展水平來說，固然高於希臘古代；但在其對於自然的總的觀點上，却比希臘古代低得很多。它之所以要比希臘古代低得很多，主要地就是由於希臘哲學家對於自然的看法還是帶有辯證法的，而十八世紀的自然科學家對於自然的看法却是形而上學的。而後者之所以沒有什麼進步意義，這又是由於後者的觀點在其推論到最後必然要與神學相聯系的緣故。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說，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在歷史上、在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中，雖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推動自然科學發展的力量，從而也就沒有什麼進步意義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從伏爾加—頓運河的通航想到中國的今天、明天與後天

馮雪峯

去年到斯大林格勒去參觀的時候，我沒有機會能够看到在建設中的伏爾加—頓運河的偉大工程。但我們在莫斯科已經看到過它的設計模型；在斯大林格勒兩天停留中的一個深夜裏，也聽到過市委書記講述它的大概輪廓。我當時這樣覺得，雖然沒有親眼看到，我也能够想像這工程的巨大規模，瞭解它的偉大意義的，因爲我們在蘇聯境內已經看到過許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

現在回想起來，在蘇聯參觀時的我的心境，可以說是完全被一個思想所支配的，就是，什麼叫做共產主義呢？我自己回答說，這就是人們能够把自己所有的勞動力和高度的技術都集中於幸福生活的創造的意思，於是那時候，過去人類所想像不到的奇蹟，將都成爲平常的現象了。而我每次這樣想的時候，又總想到解放後的我們祖國人民的創造。我覺得，蘇聯已經開始進入共產主義時代，而我們中國離開共產主義時代也並不遠。我這樣覺得，只根據於我得到的常識，因爲我知道在蘇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第一，依靠列寧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第二，依靠工人和全體勞動人民爲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而矢志不移的勞動與創造；第三，依靠一天提高一天的科學技術，現在蘇聯的技術高度已經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了。我想，我們也有毛主席和百戰百勝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是和蘇聯的工人與勞動人民同等優異的；我們就只在技術上還落後，但既然有了上面這兩個條件，則技術是可以努力學習好的，有蘇聯的先進經驗的幫助，還可以使我們在學習與發展技術上增加許多的便利。這是明明白白的眞理。我們和蘇聯走的是同一條路。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也都在走同一條路。世界上所有民族將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只是比起我們來，蘇聯是先進者，動身得早一些，現在就要由社會主義前進到共產主義去了，我們則還是新民主主義。但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明天——社會主義，後天——共產主義，這日程已經排定。我們既然看得見蘇聯人民已經走到的地點，那我們就一定追得到，因爲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這路程對我們的意志和氣概來說，並不很遠。

最近伏爾加—頓運河工程已經勝利完成了，我讀着報告它的勝利完成的一切消息，讀着歌頌這個勝利的作家們的文章，我的興奮當然是不用說的，但我並不覺得奇怪，雖然這應該說是人類空前的奇蹟。如上所說，這是因爲蘇聯人民已經建設了三十多年，他們做的什麼事，他們是怎麼樣的人，我們都是早已知道的緣故。關於這個偉大工程，我們就早已聽說過，同時這是建築在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鞏固基礎之上的工程。我們如果要奇怪，那首先使我們奇怪的應該是創造這奇蹟的蘇聯人；但蘇聯人只是使大資本家老爺們覺得奇怪和甚至覺得可怕，而對於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他們是容易瞭解的。他們使我們尊敬、熱愛；他們的創造使我們興奮、狂喜、努力學習，却不使我們覺得奇怪或不可想像。蘇聯人所以成爲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先進者和榜樣，就因爲他們做得到的事情，各民族人民也將都做得到，學習得到的。

在我個人，我對於這偉大工程的完成只感到興奮而不覺得奇怪，還因爲我是拿我們全國解放後還不到三年之間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所做的創造，和蘇聯人在三十多年中的創造加以比較的緣故。這裏我決沒有要表示我們的驕傲的意思。我們還不到三年中的偉大成就，是有蘇聯的幫助在內的。如果說要驕傲，那就是我們和蘇聯人民的共同的驕傲。我只覺得，深刻地覺得，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我們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勞動精神、創造精神及其所從事的事業，是和蘇聯人民的精神和事業，完全相通的，雖然蘇聯人民比我們走在前頭一些。我覺得從這種比較上，我就能够瞭解蘇聯人民的偉大創造。加以我個人對於科學和技術的知識是很少的，要根據通信社的報道去瞭解像伏爾加—頓運河這樣依靠非常高度的技術的工程，究竟是很困難的；但我能够瞭解這工程的創造者們——組織者、工程師、工人以及所用機器的創造者們——的勞動精神與創造精神。無論怎樣高度的技術，都不外是高度的勞動與創造精神的結果，同時都不能不依靠用的人有這種精神去施用。這種高度的勞動與創造精神，都是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所富有的。例如我們所熟識的，蘇聯著名的作家波列伏依同志，在爲了慶祝伏爾加—頓運河的勝利完成，替我們的「人民日報」寫的「五海通航」一文裏，有這樣一些話：

最後，談談在修建這條偉大航路中起了那麼大作用的巨大的掘土機罷。記得飛到這個建設場所的時候，我們要求總工程師送我們到那個正在進行最大的工作的地方。我們去到伏爾加—頓運河的分水嶺，那裏建設者們必須在一處高地開一個很寬的缺口。我看過莫斯科運河的修建工作，到過國外運河建設的地方，當然我以爲會在這種偉大工程的地方看到成千成萬的人。

當我連一個人也看不到的時候，我是多麼驚奇呵。一個巨大的草原勇士——「ЭШ—14—65」式掘土機正在大量地掘土。它的槽斗一下就可以裝十四立方公尺的土，六十五公尺長的鋼桿把它們高高舉起，送到離挖掘地點一百餘公尺的地方，再拋到看來好像山脈似的坡上。

這個執行幾萬名掘土工人的工作的龐大機器，是由只有五個人組成的掘土小組管理的。

幾百部蘇聯各種牌子的掘土機担任着主要的工作。其中佔主要地位的，是「ЭШ—1」式小型移動掘土機和每槽斗能容三立方公尺土的電動履帶掘土機。成隊的吸土船，幾百部普通刮土機和履帶式刮土機，幾千輛自卸卡車，幾十部多斗掘土機都在幫助它們。這些機器跟在掘土機後面，好像是在梳理傾斜的運河河岸。

在這項建設工程的各個地方走過的時候，我看到了蘇聯技術的極大的勝利，並且想起斯大林早在一九三一年所說過的英明的話：「……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便能支持我們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等於希望可用匙子吸盡海水了。」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蘇聯人民，由於記住了偉大領袖的這幾句話，所以創造了强大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又以自己的全部威力大大地幫助我們解決規模空前的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

我們在運河旅行的時候，我們所遇見的那些人，我們認識並且作了朋友的那些建設者們，也使我們感到很大的驚訝。這是我們的同胞，是普通平凡的蘇維埃人。但在這種爲人類所未曾看到過的設計規模的建設事業上工作的時候，在蘇聯工業供給他們的這些人類還未曾見過的機器上工作的時候，在把蘇聯科學上的最新成就運用到實際中來的時候，他們，就是這些人，好像是超越了時代，已經學會以共產主義的標準來生活和思考了。

這些話是使我特別興奮的，第一因爲蘇聯人已經達到人類智慧的這樣的高峯；第二，這正是我們今天不可企及、但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能達到的遠景。這些話，就完全不是「海外奇談」，專爲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的；它們說的是蘇聯人在做的實實在在的事實，這些事實分明指出蘇聯人的創造的道路——偉大導師斯大林所指示的道路。我們讀了這些話之後所增加的，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信心。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沒有高度的科學和技術是不可能的；而懂得了這個道理，我們的信心就增加了。我們今天自然還沒有這樣高度的科學和技術，但我們已經有它的最基礎的東西，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我們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勞動與創造；我們今天還沒有像蘇聯那樣高度的科學和技術，但明天和後天就會有了。因此，從最根本的精神和意義上，我們就完全能够瞭解蘇聯人的偉大創造。

這樣，像我們根治淮河的偉大工程，就並不會因有伏爾加—頓運河的共產主義偉大建設而降低了它的偉大性。事實上，我們倒是因爲在技術和經濟條件都不如蘇聯的情況下而能勝利地進行如此偉大的工程，這才能够容易地瞭解蘇聯人民的偉大建設的。同時，也因爲有蘇聯人民在建設共產主義，做了我們和全世界人民的榜樣，才又使我們的勞動與創造增加了重要性，顯得更有前途，並使我們非更加努力不可。

以我們的情況而論，人民剛拿到了政權，我們就一面進行着驚動世界的抗美援朝運動，一面進行着多方面的改造與建設，根治淮河是其中之一，——那麼，在淮河兩岸佈滿着二、三百萬民工的場面，跟伏爾加—頓運河分水嶺上那「執行幾萬名掘土工人工作的龐大機器，只由五個人組成的掘土機小組管理」的場面，在基本的精神上，其壯觀是不相上下的。我這樣說，並沒有輕視高度技術的意思，絕對沒有這意思。我是說，能够動員和團結二、三百萬人，組織成像一部機器一樣，晝夜不停地勞動着，在短短一年之間，就把千年以來爲害的河流在基本上控制住了，這難道不也是一個奇蹟麼？然而這却是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中國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們，克服了種種的困難，同時也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之下，所做出來的實實在在的事實。由於這樣的事實，五千年以來爲中國人民所紀念和禮拜的傳說中古代治水者的大禹，立刻被人民拋在腦後了。人民現在要歌頌的是人民自已的力量和自已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由於短短兩三年間的、剛剛開始的創造，就已經使我們不必再以古代的、像萬里長城之類的建築爲榮了。中國人民有其偉大的過去，但更有其加倍偉大的現在與將來。我們現在是更其向前面看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蘇聯就在我們的前面。所以，我是說，現在能够爲一個工程動員二、三百萬人，組織得像一部機器一樣，在短期間內創造出奇蹟來，則不久就能够創造出代替幾萬人勞力而只須五個人管理的大機器來，是用不到懷疑的；而那時候，我們也就進到共產主義時代了。

總之，可以這樣說，我們今天在從事着新民主主義建設，但我們勞動與創造的精神在基本上已經是共產主義的。這是因爲有蘇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要向這目標走去；於是，我們和蘇聯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由於精神上相通，當我們勝利地從事着像根治淮河這樣偉大工程的中間，傳來了伏爾加—頓運河共產主義偉大工程的勝利完成的喜訊，就比什麼都使我們增加信心了。（下轉23頁）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蘇・斯傑潘尼揚著
林 秀譯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以來，已整整兩年了。在過去兩年中，蘇聯學術界對於這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已全面地展開學習，並作了深入的研究。現已編成「論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問題」一書，集有十二篇重要的論文，這裏發表的，就是其中的一篇。全文較長，先節譯最重要的部分，以供讀者參攷。文內的三個小標題是編者加上的。——編 者

斯大林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是最完備的定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發現了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發現了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革命改造世界的規律，它本身也在共產黨和勞動羣衆爲工人階級的終極目標的完全勝利而鬥爭的過程中豐富起來，得到了發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偉大改造作用和它的創造性，在共產主義的天才工程師—約・維・斯大林的實踐和創造活動中全面地光輝地表現出來。約・維・斯大林在深刻地總結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人民大衆鬥爭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寶庫的一個新的最偉大的貢獻。斯大林的著作對社會發展中新的業已成熟的任務，作了深刻的理論說明，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力量。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達到了全面、深刻研究社會發展規律中的最高階段。在他的著作中，斯大林駁斥了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分子，明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具體化了並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最重要的原理，從而以對複雜的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武裝了蘇聯人民和世界各國的先進人士。

表達了現代物質生活發展中業已成熟的要求，預見到正在醞釀中的未來的世界事件，斯大林以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規律的正確認識武裝了各國的共產黨。

我們生活着的是偉大的斯大林時代。在這個時代中，蘇聯正進行着勝利的共產主義建設，各人民民主國家也在順利地進行着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在所有國家中勝利的前提和條件已在迅速成熟了。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根本問題，斯大林都是從我們時代這些業已成熟和正在成熟中的條件加以探討的。

在斯大林自己的新著作中所作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中，就完全貫穿着在共產主義基礎上改造世界的思想了。

斯大林寫道：「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㈠

在他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中，斯大林總是把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任務放在每個歷史發展階段中的主要地位。這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光輝表現之一。

在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分子鬥爭的時期，斯大林就指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可分的統一性。機會主義分子爲了取消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和蘇聯的共產主義改造的國際意義而拚命拿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列寧主義乃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斯大林的定義給了共產主義的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揭破了卑鄙的資產階級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及其他工人階級敵人故意把列寧主義描寫爲狹隘民族的、純粹俄羅斯的現象

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的企圖，斯大林指出列寧主義作爲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綜合經驗。希特勒分子妄想消滅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嚴正地說：馬克思主義是消滅不了的，正如工人階級是消滅不了的一樣，因爲馬克思主義乃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的表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蘇聯順利地建立着共產主義的物質和精神基礎，社會主義的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迅速發展了，自然和一切科學部門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實的理論基礎上進行改造的時候，當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蓬勃發展的時候，當美英帝國主義者心勞日拙地妄想阻止革命的人民解放運動的高漲、延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的時候，斯大林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定義着重指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學說的一切基本方面，這些基本方面已由社會發展的行程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上。

斯大林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定義是最完備的定義，它總結了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多年來的經驗，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的偉大經驗。斯大林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定義反映了爲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徹底勝利準備一切先決條件的歷史過程。

斯大林進一步發展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

斯大林關於語言、生產、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原理，對於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對於正確了解用革命方法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都有着莫大的意義。

斯大林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有關的論點，對生產、基礎、上層建築作了經典的定義，揭示了它們的特點，指出了它們的相互關係。斯大林進一步發展了他早在「無政府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部著作中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使它們具體化起來。必須承認，在教學和宣傳工作的實踐中，同樣在通俗化的哲學著作中，我們的哲學家們往往把基礎同社會生活、同生產混爲一談，把上層建築同社會意識混爲一談，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中庸俗化的現象之一。

斯大林教導我們，科學不能以研究現象的一般特點爲限，而應該更進一步，揭開每一個現象所有的特性。不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深刻地正確地認識世界，就不可能發現用革命方法改造它的規律。而關於社會的科學也應該和關於自然的科學一樣精確。

如果對這些概念如生產、基礎、上層建築等等的特點不明確，就不可能正確了解現代社會生活的規律性的發展，就不可能製訂各共產黨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科學的綱領。

斯大林教導我們，不能把基礎和生產混爲一談。

機會主義分子的特點就是把基礎同生產、同生產力混爲一談。大家都知道，機會主義分子咬定社會主義不能在生產力沒有發展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得到勝利。這個教條主義的、庸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是和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對立的。列寧和斯大林揭破了第二國際及一切其他機會主義分子的教條，並且教導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不一定需要生產力發展的最高水平。革命是在最弱的一環上衝破帝國主義鎖鏈的結果。

我國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乃是列寧斯大林的這一原理的明顯的證實，即：在革命的時候，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最高水平的國家中，也可能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而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革命可能在祇有中等發展水平的生產力的國家中取得勝利。這個原理針對着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後者連社會主義的勝利所必需具備的最低限度的客觀前提這一點，都加以否定了。

關於把基礎同生產混爲一談的不可容忍性，這一事實也有了說明，即按經濟制度的性質—社會的基礎來說，我國早就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整整一個時代，但在按人口計算的工業生產規模上，我們還得在未來的幾個五年計劃中追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關於拿科學和上層建築混爲一談的不可容忍性也是一樣，因爲按照上層建築的性質，我們也超過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完整的時代，但在一系列科學部門的發展水平上，還有待我們去超越它在國外的成就。

作爲任何人類社會發展出發點的生產，以及和生產直接聯在一起的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它們本身還不足以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任何社會爲了要存在，就得生產。生產的第一個和最活動的方面—這首先是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是不斷發展着的，它們對各階級也是一視同仁的。它們沒有階級性，因爲它們是爲社會上所有的階級服務，它們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改良，一代一代傳下去。每一新輩人都得到現成的一定的生產水平，這是前輩人工作的結果。斯大林教導，每一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都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應當去適應這些東西，以便有可能生產物質資料。㈠

生產、生產力—這是社會的這樣一個物質基礎，它不但在一種階級結構過渡到另一種階級結構的條件下不會消滅，就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也並不會消滅。因爲，誠如斯大林所說：生產工具、機器，「既可以替資本主

㈠ 見「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七三二頁。

義制度服務，也可以替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㈠

斯大林嘲笑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斷言十月革命後在我國保留下來的鐵路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這樣的鐵路是不體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築新的『無產階級』的鐵路。由此他們獲得了一個外號叫做『穴居野人』」。㈡

但是，就生產方式的另一方面，即：人們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來說，那末，在階級社會中，這些關係是有階級性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由和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總和所構成的。斯大林指出基礎的歷史性質，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基礎觀。斯大林寫道：「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㈢

由此得出結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被消滅的並不是社會本身，不是它的生產技術基礎——生產、機器、物質資料的生產者、文化的一切成就，而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它那表明人在生產過程中的統治和從屬關係的生產關係被清算，即資本主義的基礎受到了清算。

斯大林關於上層建築及其特點的確定，不但對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分子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對於正確了解最重要的共產主義建設道路，也有着巨大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上層建築並不包括社會意識的一切形式，並不包括社會的全部精神生活，它所包括的，只是某些特定的觀點，即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觀點，以及建立在基礎之上並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制度。

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作了天才的說明，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寫道：生產關係的總和組成爲「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㈣

從這個關於社會生活各不同方面的經典定義中，可以得出結論：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的諸形式並不是同等的概念，兩者雖然有着密切的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共通點，就在於它們都是反映了現實的基礎。

它們不同的地方則在於：如果上層建築是隨着舊基礎之被清算而遭到清算，那末，社會意識的諸形式並不受到清算，而是發生相應的變化，越來越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客觀世界，逐步擺脫一切反動的、非科學的東西。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指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及其上層建築消滅的時候，全部以前的科學、全部藝術、文化、歷時幾世紀才形成的勞動羣衆的道德標準，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道德並不隨之消滅。祇有「無產階級文化派」之流的庸俗分子才說出什麼消滅全部以前的文化、建設無產階級的新文化來代替的糊塗話。

列寧、斯大林嘲笑了、斥責了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分子，並教導我們：社會主義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在眞空中創造出來的，而是有規律地在前輩所創造的知識和文化的基礎上生長起來，並在激烈的階級鬥爭過程中鍛鍊出來的。列寧再三地昭示我們：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必須批判地利用科學、技術及其他物質的和文化的珍寶。列寧說得好：「若不清楚了解到，祇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祇有改造這種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若不了解這點，我們便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爲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爲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滙發展底必然結果。所有這一切大途小徑，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通向於無產階級文化，猶之馬克思所改造了的政治經濟學向我們指明了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指明了進到階級鬥爭，進到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㈤

馬克思主義作爲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是從它的創造者們批判地改造了的人類知識總滙中產生出來的。

在自己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斯大林並不是偶然地一再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辯證唯物主義是以前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各種科學發展的產物」。㈥這個指示是針對着現代的那些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分子而發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用革命的共產主義方法改造整個現代社會的觀點，特別是共產黨所指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體系，是適合於這些思想和觀點的。這個政治的上層建築是適合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的。

在用革命方法把資本主義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基礎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受到了清算，社會主義的基礎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基礎就建立了起來。

（未完）

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
㈡ 同上
㈢ 同上
㈣ 「馬恩選集」，第一卷，俄文本，三二三頁。
㈤ 「列寧文選」，二卷集，中譯本，第二卷，八〇三頁。
㈥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

人民民主國家中的新知識分子（續）

蘇·杜勃魯斯金著
茹　晉　譯

契爾文科夫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論及破獲科斯托夫匪幫的教訓時指出，黨內的警惕性不够，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引用舊專家於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時，往往把關鍵性的國民經濟部門的領導權交給他們，而並不保證予以監督，這就便利於偽裝的敵人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

波蘭發生過特務混入國家機關的事，波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右翼社會黨人利用了若干經濟計劃機關，企圖藉以破壞全國的計劃經濟，破壞對蘇聯的經濟關係並陷祖國於英美帝國主義的奴役之下。

由於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的增長，世界舞台上兩個陣營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引起人民民主國家內部階級對立的尖銳化，所以，吸取審判叛國案的教訓，是特別重要的。

列寧說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階級鬥爭不僅不會消滅，而且相反地尖銳起來，被推翻的剝削者力圖恢復其統治，加強對人民抵抗，列寧的這一指示，重新為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了。

階級鬥爭也顯然反映在文化和思想領域中。喪失了自己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階級敵人，竭力盤踞在思想戰綫上，企圖利用若干舊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惡毒思想，是敵人的思想武器。

在人民民主國家的許多高等學校內，揭發了反動教授在其講義和「學術著作」中宣傳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魏斯曼主義、宗教愚昧主義等卑污的思想，妄圖用資產階級思想的毒汁來戕害青年的意識，並且反對共產主義的羣衆教育。但是，大多數科學技術工作者反對這種舊制度的殘餘，他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進自己的工作。共產黨對殘餘的特務進行着堅決的鬥爭，把敵對分子清洗出國家機關、經濟與學術機關，從思想上打通動搖分子，爭取他們到自己方面來，並且以共產主義的原則教育他們。

廣大知識分子階層逐漸擺脫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桎梏，擺脫關於知識分子「獨立」作用的幻想，擺脫帝國主義者及其右翼社會黨人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營壘中出身的應聲虫宣傳所謂「第三條道路」、「中庸之道」的幻想。他們確信，只有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知識分子才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量、自己的能力和天才。

現在知識分子中所有的優秀分子，都和無產階級並列前進，他們在思想上也和共產黨結合起來，而最先進的智力勞動者完全把自己的命運和共產黨聯系起來，加入黨的隊伍之中。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契爾文科夫在共產黨情報局華沙會議上宣佈道：「保加利亞最偉大的藝術、科學、技術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我們黨的黨員。」

大部分舊專家轉變到人民民主這方面來，還不能解決知識分子幹部問題，因為無論就質的方面或就量的方面來說，舊知識分子幹部並不能滿足建設着社會主義制度的日益增加的國家需要。工人階級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領導思想，不僅用改造舊專家的方法，而且首先用從工農中提拔並訓練新知識分子的方法造就自己的人民知識分子。這一歷史過程的基礎乃是文化革命，使千百萬勞動人民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掌握科學與文化。

由於人民民主革命的結果，文化方面的變革也成為可能，一切文化的成就，變為「……全民的財產，從此人類的智慧和天才，再不會變成強力的工具，剝削的工具。」（「列寧全集」，第二六卷，第四三六頁）

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革命，是在蘇聯的援助下進行的，是利用了列寧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大規模文化革命的經驗進行的。學習蘇聯的經驗，乃是文化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工人、農民、工程師、農藝家、作家、作曲家、演員——各種各樣職業的人物——經常地訪問我國，瞭解蘇維埃經濟與文化的成就，瞭解蘇維埃人在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的成績。一切民主國家的共產黨組織蘇維埃文化週會和月會，俄羅斯作家和蘇維埃作家、藝術工作者紀念會，蘇維埃戲劇電影聯歡節，翻譯蘇聯作家的書籍及其他措施，專為使勞動人民廣泛認識蘇聯的經驗。在一九四九年保加利亞的蘇維埃文化週和保蘇友好月期間，一共舉行了一二、七九九次報告，聽衆約為二百萬人，組織了一、〇五八個蘇聯藝術展覽會，一、〇三〇場電影，四四五次晚會，一二四次無線電廣播（參看「保加利亞文化新聞」，一九四九年第三期，第五頁）。

蘇聯著名科學、文學與藝術工作者應各團體之邀，有系統地訪問各人民民

主國家，發表有關蘇聯文化和科學的演說，並且作了報告。

蘇維埃作家和詩人積極幫助解放了的各國人民，建設新興文化，使他們認識自己的創作，協助掌握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方法，並且領會古典的民主主義文化遺產。烏克蘭卓越的詩人帕弗洛•陀琴納 Павло Тычина 把捷克、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的民歌翻譯爲烏克蘭文，把保加利亞文學古典作家伊萬•瓦佐夫 Иван Вазов 的小說「受壓迫」加以校訂，他訪問過許多人民民主國家，並給文藝團體以各種援助。

羅馬尼亞在全國解放後的五年中，出版了一千一百種蘇聯的書籍，印數爲一千五百萬冊。如果羅馬尼亞總人口爲一千六百萬人，那就顯出蘇聯書籍在這個國家中有如何巨量的銷路。訪問過羅馬尼亞的弗塞窩洛德•伊萬諾夫 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 曾經叙述過蘇聯作家的優秀作品給予勞動人民大衆的影響，叙述過合作社社員們如何從蕭洛霍夫 M. Шолохов「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書中學習愛護公有財產，免受階級敵人侵害。羅馬尼亞工程師們，多腦河——黑海運河的建設者們如何從阿熱耶夫 B. Ажаев 的「遠離莫斯科」長篇小說中，學習爲超額完成計劃而鬥爭。這些事實顯然指出蘇聯文學——蘇聯經驗的宣傳者所具的世界意義。羅馬尼亞最老的作家米哈伊爾•沙多瓦努 Михаил Садовяну 說：蘇聯文學，「好似旭日東昇，給我們照耀着生活的道路」。

聯共（布）中央關於思想意識問題的歷史性的決議，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特別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於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具有特殊的影響，因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一本流行最廣的書，是人民民主國家全體先進人士的必讀之書。

人民民主國家中「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了幾十版，共計有四百五十多萬冊。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巨著，也正在大量出版。這就有助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勞動人民中的傳播，有助於用認識和改造社會的強大武器來武裝他們。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工人階級新知識界的形成過程：「……組成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知識界的，不僅會有高級學校畢業生，而且還會有我們企業裏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鑛井裏的工人階級文化人材。」（「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六七頁，俄文版。中譯文摘自「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五九——四六〇頁）

工人階級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內，知識分子形成的特殊道路是典型的，是和資本主義國家造就知識分子的道路在原則上不同的。這些差別的出發點，乃是人民民主制度根本和以剝削勞動人民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人民民主國家內的知識分子幹部，不能像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無計劃地、自發地形成。

造就幹部的新辦法，也正如蘇聯一樣，具有以下的特徵　明確的共產主義原則、集中的國家計劃、民衆的積極參加。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知識分子主要是由有產階層中補充的，因而深化並尖銳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對立。恰好相反，在人民民主國家內，知識界由工農中形成，這就是說，提高了勞動人民文化技術水平，使那從資本主義制度遺傳下來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對立狀態加以掃除。

工人階級的當權提高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積極性，創造一切條件，以便從民間培養出新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工人羣衆在政治和勞動方面所出現的高漲情緒，顯然表現在社會主義競賽上，這種競賽已經在國營工廠、鑛山中展開了。匈牙利工業中一九五一年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參加了這種競賽。

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人民民主國家工人階級權威的導師。蘇聯著名的鏇工波科夫 П. Быков 所著論高速切削一書，成爲匈牙利斯達漢諾夫學校中的教學原理。波科夫在匈牙利的許多門徒中，已經湧現了完成二十個乃至二十個以上定額的勞動英雄。

共產黨特別注意的，是建立並鞏固國家機器，把效忠於人民的兒女、特別是工人共產黨員提拔到國家機關和軍隊的領導地位上。貝魯特 Б. Берут 在他的一次演詞中說道：「解放後的初期，波蘭工人黨集中全部力量建設新的政權機構。波蘭工人黨的黨員，是社會保安機關、波蘭人民軍隊、新的國家行政機關和市政機關最初的工作人員」（「人民波蘭的五年」，第八三頁，莫斯科，一九五一年）。根據一九五〇年的統計數字，波蘭僅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就提拔了一萬七千名左右的男女工人担任廠長、車間主任、班長等領導職務。

匈牙利全國領導核心幾乎有一半——一萬一千人——是工人，其中有一千多人是各種企業的經理；羅馬尼亞僅在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把三萬多工人和勞動農民提拔担任國家機構的負責工作。

羅馬尼亞冶金與化學工業部的領導核心，全部是由不久以前還是工人的分子所組成：部長是過去的鐵路工人斯托伊克 K. Стойка，副部長是銲接工人龍海爾 K. Попгер，部長顧問是工人杜古 Ш. Дуку。

中國共產黨在吸收工農担任領導工作方面，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例如，在東北政權機關中的十六萬七千工作人員內，就有十六萬五千人是由民衆中提昇的（參看尼基佛羅夫 B. Никифоров，愛倫堡 Г. Эренбург，尤利耶夫 M. Юрьев「中國的人民革命」，一九五〇年，第一二八頁）。

匈牙利作家德里 Дьердь Дери 的短篇小說「新職務」中，鮮明地指出新型工人的道路，這條道路由於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才成爲可能。德里短篇小說中的那個主角，是沿着革新者的道路前進的，他作了有價值的發明，他被提拔担任

部內的領導工作，後來又被派爲社會保障委員會主席。這個具有國家主人翁感覺的工人，迅速地熟習了他以前所不瞭解的事務，而在短期間內就大大改善了對勞動人民的服務。麥沙羅什 Meйсарош 由於模範工作獲得突擊隊員的獎章，並且被提拔担任外交部更負責的工作。

斯大林說：「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徹底百倍」（「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八三——八四頁。中譯文引自「列寧主義問題」第三二頁）。這種英明指示的正確性，拿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就重新被證實了。

從人民當中造就知識分子及其不斷成長，是只有政權屬於人民的那種社會制度才能具有的發展規律之一。

共產黨和工人黨對青年幹部給以巨大的關懷，幫助他們成長和鍛鍊，替他們創造最有利的條件。爲了提高青年幹部的技能，到處設立了許多講習班和學校，青年人民知識分子不脫離工作，學習管理的技術，取得技術和經濟方面的知識，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共產黨、工人黨和他們領導下的青年與婦女社會團體，到處是提拔新知識分子幹部的組織者。

民主主義制度在人民民主國家社會與國家生活中，已經根深蒂固，對勞動人民文化政治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從勞動人民中培養出國家的積極工作者。勞動人民作爲黨和工會的中心成員、宣傳員、鼓動員、國民議會代表與其他地方政權機關代表、合作社理事等而進行積極的社會活動，往往是提拔工農担任領導工作的前提。在這種社會和政治工作中新幹部迅速地成長並堅强起來，他們養成「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六頁）的習性和技能。

共產黨黨的教育系統，在從工農中提拔並培養新知識分子幹部的事業中，具有重大的意義。用各種方式把共產黨員和非黨勞動人民包括於黨的學習中的人數很多。波蘭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一這一學年中，只在一些政治學校中學習的，約有三十萬黨員和好幾萬非黨分子。這些在共產黨領導下教養出來的幹部，是黨的、行政的和經濟機關的優秀後備軍。

新的、人民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形成的。

造就新的、人民知識分子的第二條道路，是以廣泛開展國民教育網——從初小到研究科——爲基礎而進行的。

肅清反動統治所留下的沉痛的遺跡——知識貧乏，是羣衆文化發展方面的第一步。阿爾巴尼亞的文盲現象，居歐洲的第一位，其識字人數，不過佔了百分之十。貴族統治時代的羅馬尼亞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沒有知識的。在新羅馬尼亞，已經有幾百萬勞動人民，掃除了自己的文盲狀態，而在全國五年計劃中連一個文盲也將沒有了。波蘭和保加利亞幾年前共計有百分之二五至三十的文盲，而現在幾乎成爲全部識字的國家了。

人民民主國家到處實施義務初等教育制。中小學校過去是沙文主義的、反人民的教育青年學說的溫床，而現在是對人類施以共產主義教育的武器，是培養新知識分子幹部的有力工具。中等教育也實行了根本的改革，這種改革所根據的是：學校脫離教會，掃除舊的、反科學的教學方案和教科書，把全部教學過程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與文化改造的任務建立起一種有機的聯繫。在所有學校中都講授政治綱領、憲法以及俄文。

王朝時代的阿爾巴尼亞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九的廿年中，總共只開辦了一九〇所新學校，而人民政權僅僅在四年之中，就創辦了一、二八一所學校。資產階級地主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在中學就學的兒童只有五六、二六八人，而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度，則有一六六、七六八人，共中有十萬多人就學於培養中等技能的專家的專科學校。

人民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是爲少數民族建立廣大的學校網，這些民族過去飽受民族壓迫的痛苦，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獲得完全平等的權利。少數民族首先有可能以本族的語文教育其子弟，培養自己的專家幹部。

高等學校也根據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進行改造，這對培養人民知識分子幹部，起着最大的作用。在高等學校內部設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大學生們進行了生產實習。社會主義經濟與文化日益發展，使高等學校網不斷地增加。波蘭戰前計有二十九個高等學校，學生有四萬五千人，而一九五〇年就有七十二個高等學校。包括學生十一萬八千人。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等學校數從九所增到二十四所，學生數增加了一倍，即從二萬人增加到三萬九千人。阿爾巴尼亞人民政權建立以前，連一所高等學校也沒有，而現在有三個專科學校了。保加利亞創辦了三所新大學，而學生數增加了四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後的短時期內，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面，已經達到巨大的成就。一九五〇年全國計有高等學校二二七所，學生十三萬四千人，幾乎超過英法兩國高等學校學生總數的一倍。

破獲以專家資格混入人民民主國家領導崗位的敵人，成爲共產黨的重要的警惕，使它們注意從勞動人民隊伍中加快培養新幹部的問題。

貝魯特在一九四九年底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全會上指出，黨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加快教育和培養我們黨的、行政的與經濟的幹部的速度，提高他們政治認識和思想鍛鍊的水平」。

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學生的社會成份，基本上也發生了變化。

在舊波蘭進中學的有產階級子弟每一千人中，升入高等學校的有二百五十人，而一千工農子弟中僅僅有七個人。在人民波蘭，大半的大學生是由工、農出身的，百分之四十强是知識分子的子弟，還有百分之三—四的大學生，屬於「其他」成分，主要地是在大學的高年級。

捷克斯洛伐克大學生中的工人階層，一九四五年只佔百分之七•五，一九四九—五〇年佔百分之二七•六，而在一九五〇—五一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參看「高等學校公報」，一九五一年，第六期，第五六頁）。

人民民主政權竭盡一切可能，使羣衆易於掌握科學，受到一般的與專門的教育，中等的與高等的教育。按照蘇聯工人高等學校的典型，建立起專門訓練班網來，以便在高等學校內訓練青年工人。

大部分大中學生得到津貼、宿舍、衣着和膳食，他們能够脫離生產學習。

在國民教育和培養專家方面，蘇聯對人民民主共和國給以大量的援助。蘇聯學校的教案、教科書和教學法原理，是國民教育的基礎。人民民主國家有成千成萬的青年人，在蘇聯高等學校內學習。

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府關於培養新幹部的關懷，已經在所有國家行政、經濟與文化的領域中建立起數以萬計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隊伍。

雖然學校網在不停地增加，新幹部也在逐年增加，可是人民民主國家仍然感到專家奇缺之苦，尤其在社會主義工業和經濟部門方面。因此，許多國家除開正規高等學校和技術專科學校外，又設立了一年制和兩年制的訓練班，以便由熟練工人—先進工作者培養專門的工程師。

由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實施，培養幹部在最近幾年中，具有遠大的前途。

匈牙利政府修改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對培養知識分子幹部方面也把計劃草案予以擴大。大學生數目增加的，不是如以前規定的八千人，而是三萬人；由此可見，將要培養出十萬新的專家來。

人民民主羅馬尼亞的五年計劃規定訓練二萬新的中級技術專家，一萬左右農業上的高級專家。人民民主國家專家人數的增加，顯然超過了一般工人人數的增加。例如，按照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六年計劃，工程技術工作者人數增加兩倍，而同時工業中就業的職工總額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造就新的人民的、由勞動者出身的知識分子，由於顯著提高工農比重，所以根本上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成份。這也把婦女廣泛地吸引到知識分子的隊伍裏來。婦女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獲得廣泛的受教育的機會，在管理國家中起着巨大作用。現在婦女中有出任部長和部長顧問、上級和地方政權機關的代表、企業的經理和學者的。

人民民主國家中農村知識分子大軍：教師、醫生、職員，已經成長起來了；新的青年農民知識分子隊伍——農村合作社、吸引農民於社會主義勞動和文化方面的勞動團體的工作者出現了。

知識分子成份的改造和擴大，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受到的思想教育，在較短的時間內，就使人民文化的發展，有了巨大的成就。在城市和鄉村中湧現了許多文化基地：俱樂部、圖書館、劇院、電影院；這些文化基地，提高了工農文化水平，以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工農。在羅馬尼亞有一萬六千所羣衆圖書館，而美國人口數超過羅馬尼亞八倍，却只有圖書館一萬二千所，並且這些圖書館是很少能爲勞動羣衆接近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版社正在出版着大批的書籍和期刊。

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工作者把自己全部創造性的工作，致力於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鬥爭，反對人類最兇惡的敵人—美英帝國主義者的鬥爭。

爲蘇維埃藝術成就和自己人民光榮勞動偉績所鼓舞的藝術工作者，創造了許多高度思想性的作品，他們在這些作品中表現了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情，指示出新人——人民民主建設者的面貌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蘇聯」這個題材：它在爭取和平與民主鬥爭中的巨大成就，它對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鬥爭，它在解放歐洲各國人民於法西斯壓迫之下的決定性作用，在民主知識分子的藝術創作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其他藝術領域中，也達到驚人的成就。保加利亞革命前只有十五個劇院，現在有四十一個劇院、六百五十個電影院，八個交響樂隊。波蘭現在有四十三個劇院、五個音樂館、幾百所電影院和文化宮。

在廣泛擴展的學校網中，以飛快的速度培養了新的藝術知識界。在過去，這種學校寥寥無幾，而且是由「被選拔」階層中培養藝術工作人員，現在僅在波蘭人民共和國一個國家中，就有幾百個中小藝術學校，十四個高等藝術學校，在這些學校裏，主要地從勞動人民子弟中，培養出各種專門的藝術工作人員來。但是，這並不是唯一補充藝術幹部的源泉。工人階級的業餘藝術活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在波蘭，戲劇、歌詠和其他團體，三年來在企業中增加了九倍。而參加的人數則從一萬五千人增加到十二萬人。其中有不少的天才，這是因爲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才發現了這些天才。從民間已經湧現出來幾十個青年無產階級作家、詩人、藝術家、劇作家。先進工人不僅是文化珍品的消費者，而他們本身也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創造者。

科學工作者和其他知識分子的隊伍一起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些國家的歷史上，科學家利用了蘇聯先進科學的經驗，破天荒地開始爲人民服務。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許多學者力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科學上，宣傳米邱林的農業生物學，尖銳地批評魏斯曼主義的、迄今在科學上的曲解。

共產黨領導着創造性的討論，幫助着先進科學的發展。在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內舉行了學術性的會議，專門對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進行深刻的研究和應用。

爲了使學者與實際工作者和蘇維埃科學接近起見，成立了專門研究所（匈蘇、羅蘇專門研究所等）。這些機關幫助學者們了解蘇維埃科學的種種成就，並且掌握這些成就。人民民主國家的學者們，追隨着蘇聯科學與生產工作人員組織創造性聯繫的經驗，對國家工業化、發展農業、建設防護林帶給以幫助。布達佩斯工藝學院的教授們幫助工人從科學上論證改進工業製造過程的合理化建議。雅海龍大學內科學工作者幫助波蘭農村先進工作者爲提高農業單位面積產量而鬥爭。

舊式科學院和人民脫節，通常只研究抽象的、而沒有實際意義的題目。統治階級把科學院變爲假科學的溫床，培養種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培養對人民、對人民的創造性以及過去歷史上光榮傳統的輕視和敵對態度。

在人民民主政權下，科學院的工作進行了根本的改造，改造的基礎是把科學院的工作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非常密切地結合起來。科學院是先進科學的中心，是黨和政府的助手。羅馬尼亞科學院研究出來了工業上利用天然甲烷、製造新的、高級水門汀的方法，正在研究着提高工農業勞動生產率，改善勞動人民福利的許多題目。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設有十三個研究所，大約有一千名科學工作者在裏面工作。科學院對各部管轄的二十四個科學機關能够發生影響。幾百名羅馬尼亞學者和工程師都在科學院領導之下，他們在一九五〇年的科學院大會中，參加了全國電氣化計劃的擬訂，並且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和補充。

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培養科學幹部，主要地是通過研究所進行的。科學知識幹部在依照聯共（布）中央直屬社會科學研究院典型成立的高級黨校中培養起來。以日丹諾夫命名的羅馬尼亞高級社會科學學校，可以作爲這種學校的範例。其中就學的有二百人——未來的教研室指導者、社會科學教師及其他科學工作人員。

新的科學幹部不僅在研究機關內形成，而且也在生產崗位中形成起來，先進工人——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研究並應用生產工作的科學方法。

發明的發展和生產的合理化，是工人巨大創造性增長的指標。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六個月中就收到三萬五千件合理化建議。工人發明創造精神的熱情，得到政府和企業領導人的全力支持。在榮膺國家獎金的名單中，我們不僅看到享有盛名的學者和青年科學工作者，而且也看到生產革新者。優秀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常到高等學校講演。匈牙利紡紗工人費林茨內 Ференце 和、織布工人德多夫 Дедов 在布達佩斯的高級技術學校講課。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先進工人就其文化水平說，正接近於工程技術勞動的工作者了。

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科學發達的過程中，創造出新型的學者。學者是公民、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和人民有有機的聯繫——現在是人民民主國家中科學工作者的主要典型。

技術專家們和學者手携手地緊張工作着。工程師們研究了蘇聯工業中所應用的蘇維埃技術和最新方法，努力把這種經驗應用於自己的工廠。加多維茨基礦山設備工廠工程師保爾科夫斯 P. Борковский（波蘭）是應用蘇聯工程師郭瓦廖夫操作法的倡導者，並且使勞動生產率獲得大大提高。他號召波蘭全體技術知識分子參加競賽，最迅速地應用郭瓦廖夫操作法於生產中。

新舊知識分子在一切經濟與文化部門中，這樣友好地共同工作着，積極地參加着社會主義建設。知識分子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的作用，比起帝國主義國家來，是無比的高。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知識分子爲資本家狹隘自私的利益服務。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知識分子爲全體人民服務，爲勞動人民羣衆服務。提高知識分子作用的巨大因素，是思想意識這個上層建築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影響，大大地超過了資本主義社會。人民民主國家中的青年知識分子，爲蘇聯的偉大成就，爲斯大林共產主義建設工程令人神往的計劃所鼓舞。被解放的各民族的文化工作者永遠會記着：蘇聯文化在他們的生活上，在他們的成就上起着怎樣決定性的作用。巴洪 Пархон 院士說：「蘇聯文化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影響，給人類生活和意識上帶來偉大改革的和平的、深刻的影響，是進一步推動人類社會的必要的歷史因素。」（「羅馬尼亞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第六七頁，布加勒斯特，一九五〇年）

社會主義文化和新的人民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人民民主國家在一切經濟文化生活部門中的兄弟般的合作。這些國家在過去歷史上特有的相互猜忌和民族糾紛已經消失了，爲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國人民兄弟般的友好，正在成長和鞏固起來。各國知識界的先進工作者建立了相互的密切關係，交流文化和文化建設的經驗，彼此相互幫助。有系統地舉辦文化交誼週會（羅匈、保羅等），相互觀摩和表演等。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範例，蘇聯境內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友誼，他們和其他各國人民以互敬互信爲根據的國際關係，鼓舞着這種卓越的創造性的民族間的合作。

先進知識分子的活動，受到國家政權和共產黨的完全支持，國家政權和共產黨全力爲知識分子創設最優良的條件，千方百計地對專家們的創造性的成就予以鼓勵。追隨蘇聯政府設立斯大林獎金的先例，匈牙利設立了科舒特 Кошут

獎金，保加利亞設立了季米特洛夫獎金；其他國家也規定了國家獎勵辦法，以獎勵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方面的卓越的成就。

「在過去，任何一個執政的政黨，也沒有像勞動人民黨這樣關切科學、文學和藝術」——沙多瓦努陸士對羅馬尼亞工人黨所說的這些話，也可以完全適用於領導文化戰綫並關懷知識分子的所有其他各國的共產黨。

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知識界十分明白，擺在他們面前的偉大任務，是和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爭取和平的鬥爭密切聯系着的。知識分子和本國工農一起，積極參加保衛和平，用自己的創作和社會活動宣傳全世界的和平事業。先進的民主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熱望，為保加利亞女作家葉里沙威塔•巴格達娜表達出來了：「我國人民切望和平、和平勞動、和平建設。他們要把我們美麗的國土變成花園，把祖國變成陽光所普照的大廈」（「保加利亞文化新聞」，一九四九年第一期，第四頁，索非亞）。文化工作者力圖追隨蘇聯知識界的先例，也影響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向西方的專家們寫信、發宣言，號召他們為和平事業而鬥爭。波蘭高等學校的五八七位教授和代表，向美國學者發出公開信，號召他們起來鬥爭，反對戰爭挑撥者。

造就人民民主知識分子的經驗，顯然證明列寧斯大林關於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知識分子學說是英明的和有活力的。「知識界從來不是一個階級，而且也不能是一個階級」（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五二六頁。譯文引自中譯本六九三頁）。斯大林關於知識分子的社會本質的這種原理，重新又獲得了證明。新的、人民知識分子的種種成就，顯然表明：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領導下，他們才能夠成為巨大的社會力量，而且「如果知識分子反對工人階級，他們就會變成什麼也不是」（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六一一頁）。

一些可憐的反民主的知識分子，反對人民民主制度，把自己的命運和正在死亡的剝削階級結合起來，是這樣的斷送着自己的生命。只有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才能造就為勞動羣衆利益服務的人民知識分子，才能造就原則上異於資產階級的、按照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形成和發展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逐漸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產階級殘餘成見和遺毒，嚴肅而誠實地捍衛人民的利益，高高地舉起先進的、民主文化的旗幟。

蘇聯知識分子更進一步提高人民民主國家青年文化幹部的責任，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教育他們的責任正在增加着。蘇聯知識分子會記着日丹諾夫的話：必須「幫助我們的國外朋友和弟兄用科學社會主義意識的陽光，照耀着自己為新社會而進行的鬥爭……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教育他們並武裝他們」（「哲學問題」，一九四七年第一期，二七二頁）。

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革命，造就新的人民知識分子的初步成就；具有顯著的意義。這是更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巨大因素，是造成全民道義與政治一致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更迅速地繼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科學、文學與藝術的保證。

造就新知識分子幹部的成功，對於英美戰爭挑撥者妄圖使知識分子與人民脫離，成為自己工具的罪惡計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在資產階級文化日趨腐爛萎縮的條件下，在美英強盜式帝國主義蠻橫地迫害先進知識分子，破壞文化和藝術，利用文化藝術作為挑撥新世界大戰的工具的時期中，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各國文化的高漲，現在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創造先進的民主文化和造就進步的知識分子，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經驗的國際意義，人民民主共和國和偉大蘇聯友誼的意義，這種友誼「正如日光和空氣之於一切生物，是生存上所必需的」（季米特洛夫）。

走向共產主義的蘇聯人民，執行着自己的國際義務，對正在建設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各族人民給以大公無私的援助。「……作為國際主義者，我們也確信其他各國工人和勞動人民將有效地運用我們的經驗的時候就要到來了，並且他們不僅在技術方面，也在社會改造方面利用我們蘇聯的經驗」——莫洛托夫還在一九三二年時說過的話，現在正在這樣地實現了（莫洛托夫：「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演說與論文集，三五五頁，一九三五年）。

人民民主國家接受了這些偉大的經驗，正在勝利地解決着造就人民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在為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而鬥爭中所掌握的重要武器——的問題。

（譯自「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一期）

·本社新書預告·

中國文字改革問題

鄭林曦、魏建功、曹伯韓、黎錦熙、林漢達等著

「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一書，是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協助下，由本刊約請中國語文改革運動者合力編寫而成的。本書中包括文字改革問題論文十二篇，就漢字的性質和發展過程、簡體字、注音字母、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問題和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史實，作了系統地論述，為討論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重要參攷資料。現正排印中，本月內可出版，將由新華書店總經售。

新書介紹

介紹「歷史唯物論」

長冬

蘇聯康士坦丁諸夫教授主編的「歷史唯物論」一書，受到蘇聯學術界的極大注意。莫斯科學術界曾爲此書舉行了一次連續三日的討論會，眞理報等會發表了書評。本書的優點是：「書中詳細叙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歷史唯物論各項基本問題的基本思想，並引證了大量的實際材料；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徵，蘇聯社會與國家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在書中佔據着顯著的地位；書中說明了日趨尖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批判了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學說。」

人民出版社已經把這本書陸續翻譯出來，分章出版。現已出版的是第一章「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沈志遠譯），第二章「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劉羣譯），第三章「生產的三個特點」（王子野譯），第四章「從原始公社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王子野譯），第六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北流譯）。本文就已出版各章作一介紹。

什麼是歷史唯物論

第一章概述了歷史唯物論的研究對象及基本思想要點。

什麼是歷史唯物論的研究對象？ 作者引述了斯大林的經典性的定義來回答：「歷史唯物論就是把辯證唯物論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論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本書一頁）歷史唯物論研究的只是社會發展中的最普遍的規律，即：（一），研究整個社會的發展規律，（二），研究社會生活各方面因素的相互關係，並確定這些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歷史唯物論要解答如下的問題：「什麼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發展決定於什麼，一種社會制度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過渡，例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依靠什麼。」（二頁）

作者正確指出：「歷史唯物論是解釋社會發展，解釋從一種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完整和嚴密的科學理論。同時它又是研究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別方面的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是研究各種具體歷史現象和整個地研究各國及各民族歷史的方法。」（三頁）

歷史唯物論所確定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什麼，在本章第三節中作了回答。作者指出了以下諸要點：（一）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社會的精神生活形成的根源，政治制度發生的根源；（二）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築，社會的上層建築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派生，服務於基礎並對基礎起反撥作用；（三）社會的發展雖然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但必須通過人民羣衆的實踐鬥爭——階級鬥爭，才能實現。

在本章第二節中，作者批評了資產階級的各種唯心史觀。作者引述了列寧對馬克思以前的一切歷史理論的批評：「第一，它們在最好的場合也僅僅考察了人類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不研究這些動機是什麼東西引起來的，抓不住社會諸關係體系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看不見這些關係的根源是在物質生產的發展程度上；第二，過去的理論恰恰沒有包括人民羣衆的行動。」（八頁）

歷史唯物論確認社會歷史發展是一種有規律的過程，由此，歷史唯物論就給予了把歷史看作偶然發生的、由人類的精神狀態所決定的種種資產階級的謬論以徹底的批判。無產階級不僅要認識世界並且要改造世界。無產階級必須洞悉歷史發展的道路，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然後才能保證自己在革命鬥爭中的勝利。

歷史唯物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斯大林指出過：「一切都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爲轉移。」歷史唯物論規定了社會各方面的因素的相互關係的規律，但構成現實歷史的社會各方面的因素的相互關係，却是十分複雜的，所以一切民族、國家的歷史雖然有其共同的規律，却又有很大的差別性。當作革命行動的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掌握具體歷史、實踐的曲折，才能既把握住歷史的共同性，也把握住歷史的特殊性。

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

本書第二章指出了社會物質生活的三個條件：（一）圍繞着人類社會的地理環境，（二）人口，（三）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

本章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並引證了許多實際材料，指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的謬誤。

作者證明了地理環境和人口雖然都是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發展所必要的、經常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的條件。社會越是向前發展，地理環境和人口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就越是減少，而人類的社會實踐愈能改變地理環境和人口狀況。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曾經打破了經濟生活中的國家界限，減弱了生產對某一地區是否存在着某種自然財富的依賴性。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束縛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進一步的改造，只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才給予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以無限寬廣、遠大發展的可能。

但是，地理環境和人口對於社會發展當然是有其作用的，「有利的地理條件，加速社會的發展，不利的地理條件，延緩社會的發展。」（三頁）「在其他的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某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這一國家開發新的土地的可能性以及經濟發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着人口密度的大小和增長的速度。」（二五頁）我們偉大祖國的廣博豐饒的自然條件和五億之巨的人口，在舊中國的罪惡統治下，完全不能發揮其偉大的潛力，但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就成爲我們國家建設發展的巨大的有利條件了。

然後作者指出了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決定社會發展的力量。

作者指出：「某一時期倒底要向那種社會制度轉變，這完全不取決於人們的專斷，取決於人們的主觀願望，而歸根結蒂取決於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已達到的階段。」（四一頁）奴隸制底下生產力的低微水平，奴隸勞動者對於生產之毫無興趣，使奴隸制度必須經過封建制度才能到達資本主義社會。在封建的小農的分散生產和工業的落後情況下，社會不可能一下子轉變到以集體佔有生產資料、生產的高度集中和高度機械化爲特徵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當資本主義發展了大生產，排擠了小生產，暴露了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人性的深刻矛盾時，資本主義的滅亡就成爲不可避免，社會之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成爲必然。

生產的三個特點

在本章中，作者分析了斯大林指出的生產的三個特點。

生產的第一個特點是，生產是經常地變化和發展的。作者指出：「生產過程是不間斷的、經常更新的。全社會的生產一旦停止，即使是幾星期，社會便會滅亡。」（四頁）

生產的第二個特點是，生產的變化和發展是從生產力的變化，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開始的。生產力的變化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生產關係——社會制度的變革。

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如生產力是生產之最活躍的、最革命的因素，它歸根結蒂決定整個社會的發展，那末……生產力本身的發展是由什麼決定的呢？」（一一頁）

作者批評了普列漢諾夫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也批評了叛徒考茨基用認識的發展、科學的發展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唯心觀點。科學固然能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一定的科學的存在和發展首先就需要生產的一定發展，即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一定發展。「蒸汽作爲動力和能的泉源這個性能還在古希臘，在所謂亞歷山大時期就已被發見。然而利用這個發見，在當時奴隸制生產方式的條件之下是不可能的。天才的俄國的機械學者波爾蘇諸夫的偉大發見——蒸汽機——在封建制生產條件之下是不能被利用的。」（一四頁）

作者指出：「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的、決定的原因不應當在生產以外，而應當在生產本身中、在生產方式中去尋找。」（一八頁）

首先：「每一新的世代都繼承前一代所創造的生產力；這些由前人所創造的生產力對於新的一代是作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起點和出發點。生產力發展的每一新的步驟都是由生產力發展已達到的階段來決定。」（一九頁）但生產力發展的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每一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性質。在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比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規模，並且生產力有着不受限制的發展的一切可能，這就是因爲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優越於充滿着社會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生產的第三個特點是，在新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不是在舊的制度破壞、消滅以後發生的，而是在舊的制度內部發生的，不是由於人們自覺的、有意識的活動的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離開人們的意志發生的。只有在舊社會懷抱內成熟了的新的生產力與原來的生產關係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時，歷史的自發的發展才讓位於先進的革命階級的自覺的革命活動，這時候，強力變革代替了和平發展，革命代替了進化。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第四章着重敘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生產力的進步，只能在生產關係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之下發生。作者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初期，其生產關係基本上適應於生產力，因而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形式。但是，這種適應不排除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發生之時起，它便在自身內包含着內在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的、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之間；生產及生產力的無限制增長的傾向

和經常限制着生產發展的有限制的生產目標之間；生產和爲勞動羣衆貧困的生活條件所規定的有限的需要之間；在個別企業中生產之有組織和社會上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之間；工人和當作資本工具的機器之間；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科學和工人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資本主義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四七頁）

資本主義的這些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每一步發展並不能消除上述的任何矛盾，而是使矛盾更加尖銳化。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期，這些固有的矛盾就顯示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完全不能適應。在獨佔資本統治之下，生產力和技術的發展是停滯了。但在個別部門和個別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甚至比在資本主義初期還來得快。作者指出了這種發展之帶着極端不平衡的和災難的性質，它的發展，日益增加了社會的階級對抗、革命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的鬥爭、戰爭的可能。因爲這種發展，往往是在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擠和對廣大人民的殘酷的壓榨的基礎上發生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戰爭與革命的前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自身滅亡的前途。

作者指出了「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前夜」。這一判斷的正確性特別爲資本主義之進入總危機所證實。進入總危機時期的資本主義，由於下列原因而使它的滅亡成爲直接的現實。這就是：（一）社會主義國家之生長與勝利，徹底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勞動人民啓示了擺脫資本主義造成的痛苦生活的鮮明的道路；（二）殖民地人民革命鬥爭的激化與革命的勝利，更加縮小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使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的國內矛盾空前尖銳化，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日益衰頹，日益瀕於潰滅。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

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切社會生活和鬥爭，在階級社會中都是階級關係及鬥爭的反映，無產階級在一切革命工作中的決策的根據，是階級分析。作者引述列寧的話來說明了這點：「祇有研究某一社會或幾個社會內全體成員趨向的總和，才能對這些趨向的結果作出科學的判斷。而每一社會所分成的各個階級的各不相同的生活狀況和條件，則是各種矛盾趨向的根源。」（一頁）

作者批判了資產階級之種種模糊現成社會階級關係的荒謬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實質是：「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爲彼此敵對的兩大階級代之以劃分人們爲不確定的『等級』，以便掩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根本的階級的對抗。」（一〇頁）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實，在馬克思以前就已被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發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特點，是指出階級是歷史的和經濟的範疇，階級鬥爭必然走向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是爲了消滅一切階級，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階級和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策略基礎，斯大林指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策略基礎，是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學說，因爲這是無產階級手中最有力的武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藉以奪取政權然後剝奪資產階級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武器。」（五頁）

作者指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階級特徵：「地主與獨佔資本家的結合」。作者指出：「地主和資產階級在反對民主、反對人民的鬥爭中彼此相互支持，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三一頁）

作者簡明有力地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黨之作爲工人階級的戰鬥的先鋒隊的作用、組織原則和戰鬥作風。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裝，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類型，一切國家的共產黨都建立、鞏固和發展起來，這是世界勞動人民能够打敗帝國主義者，獲得革命的勝利的最强有力的保證。

蘇聯學術界對於本書的優點和缺點的指陳，除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者說明」中指出的材料之外，還有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蘇聯關於『歷史唯物論』一書討論總結」一文（「新華月報」五月號轉載），讀者都可參考。總的說來，本書概括地敘述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理論，能够使讀者對於歷史唯物論得到一個完整的、正確的了解。這對我國讀者，是極爲需要的。

談中國語言問題

蘇聯東方學家康拉德教授

卓越的蘇聯東方學家康拉德教授最近發表了一篇報告：「以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見地來談中國語言問題」。他强調指出：斯大林所下的結論已促進了蘇聯漢學家們的研究工作，這個結論已證明：馬爾關於包括中國語言在內的某些語言發展問題的僞科學理論——所謂「語言發展階段論」，是完全荒謬的。他接着指出：中國民族語言的發展是與高度的中國文化分不開的，中國語言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足以充分表現複雜的人類思想的十分適當的工具。就用語的力量和豐富性、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言，中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這一點已反映在孫中山和毛澤東的著作中。中國語言的力量和潛在力，也已由那些用中國語文翻譯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世界文學經典著作的譯文加以證實。最後提到：蘇聯漢學家們正在進行許多關於中國語言各種問題的重要研究工作。

學術論文提要

這一欄的增闢，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每個提要，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中心思想，以便讀者參考。——編者

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M·李昂諾夫

哲學是上層建築的社會意識形態之一。與其他形態的思想體系不同，哲學是一種世界觀。哲學的使命是提供一種關於世界及其規律性的完整觀念。

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不限於它在思想上爲推翻舊生產關係準備條件。當哲學成爲佔統治地位的哲學後，它的作用表現爲替該基礎服務。

作爲上層建築組成部份的哲學的第一個專門特點，在於它研究思惟對存在的關係。第二個專門特點在於：它與上層建築其他部分相比，是與社會經濟基礎有最複雜的關係的。誰不懂得哲學，上層建築與基礎相互作用的辯證法，他就必然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第三個專門特點，在於它與一般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有密切的聯系。

因此，哲學是有高度黨性的理論，並對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發生巨大影響。很顯然，作爲世界觀的哲學的社會職能，要比思想上層建築其他一切部分廣泛得多。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建設性的職能，在於把社會主義意識輸入工人運動中；組織和動員工人階級去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從思想上武裝先進的科學家去反對唯心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上層建築的建立不是爲了滿足某一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爲道德政治的統一鞏固起來的全社會的需要，因此，哲學的服務作用也發生改變。它的使命不是爲某一階級服務，而是爲全社會及其所有友好的階級服務。在蘇聯哲學已成爲千百萬人的財產。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是唯物論的最高形態，它在自己的發展中不斷豐富起來，但並不改變它的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現在的哲學，而且是將來的哲學。因此，它不斷發展，改變，爲新結論和新公式所豐富，但它不爲任何某種哲學所代替。

（摘自「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五號）

論邏輯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凱德洛夫

按照列寧底意見，邏輯底對象是關於眞理的問題，即關於導至眞理、認識眞理的思惟底規律和形式的問題。就是說，邏輯是關於使我們可以認識到眞理的思惟底規律和形式的科學。

邏輯可以是唯物論的，也可以是唯心論的，看它如何解決自己的基本問題而定。哲學史，特別是邏輯史有許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

思惟底一些基本形式——概念、判斷、推論——是形式邏輯所研究的，也是辯證邏輯所研究的。兩種邏輯所研究的對象有共同性，所以就不能說兩種邏輯是互相分離的，原則上互不相容的和互相排斥的。但是邏輯有不相同的發展階段——低級的、所謂形式的邏輯和高級的、所謂辯證的邏輯。它們在自己對於對象的態度方面、在自己指示對象的全面性和深度方面，都是互不相同的。

列寧曾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就是辯證邏輯。」同時又表明，辯證邏輯底要求就是馬克思主義底要求。認爲有兩種平分整個認識領域的邏輯存在的論斷是和馬克思主義相矛盾的。

把現象領域交給形式邏輯，而把本質領域交給辯證邏輯的企圖，也是和馬克思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辯證邏輯把握着認識眞理的整個道路：從直接的現象開始，再從現象進到本質，從比較不深的本質進到比較深的本質。

形式邏輯把「靜止」看作和運動孤立起來的、從思想發展底一般進程中抽出來的東西；而辯證邏輯却把它看作運動底特殊場合，看作意識底發展、思想底運動最終達到的結果。

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起來是很危險的，因爲這會造成用形式邏輯來代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便利條件，而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起來，就會走向列寧一再防止產生的折衷主義。

形式邏輯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階級敵人底武器，它是具有全人類的性質的。辯證邏輯却是辯證唯物論——布爾什維克黨的世界觀——底一部分。

必須記住：形式邏輯並不是辯證邏輯——即馬克思主義——底組成部分，不是它的「因子」，不是它的一方面，也不是它的特殊場合。

形式邏輯是辯證思惟底必要條件和前提，這並不是因爲它比辯證法有更重要的意義，而祇是因爲辯證法決不能在不遵守邏輯思惟底最起碼規則的、思想模糊不清、互相矛盾、互不聯系的糊塗腦袋中產生和保持。

（摘自「科學通報」三卷五期）

學習斯大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

劉大年

斯大林在語言學問題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

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典型定義；而且繼續發展了他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關於生產關係的論點。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這一點上，具體指明了經濟基礎與生產間的區別。

從斯大林的指示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懂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社會制度、社會性質的時候，不是要單純地分析生產、生產力的狀況，更不是要單純地分析它的上層建築；而是要着重地分析社會經濟基礎或社會經濟制度。

按照斯大林對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分析，人們在進行社會制度的研究中，必須弄清楚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生產，生產工具與經濟基礎的區別和相互關係問題。

不論是馬列主義理論，也不論是歷史事實，都一致反駁了那種單純用生產工具來衡量社會制度的片面、機械的見解。要是我們贊成那樣的見解，那就必定要把生產——生產技術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區別與相互關係去作各種不適當的解釋；失去歷史眞相，也造成認識上的混亂。

依照斯大林對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分析，人們在進行社會制度的研究中，必須弄清楚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上層建築，特別是社會思想、理論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問題。

歷史唯物論指出：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現象，社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從生的現象；社會的物質生活是不依靠於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沒有社會物質條件的先行變化，人們的思想和整個社會上層建築的變化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分析所有社會上層建築時，可以而且必須首先瞭解它的經濟基礎；但是反過來，分析某一社會基礎時，却不是首先要瞭解它的上層建築。

我們不是說，上層建築在社會制度研究中毫不重要，或者竟不需要加以討論；而是說從這樣的分析中來尋出社會經濟基礎，是把歷史事實輕重倒置了。其所得的結果，是根基不穩，難以信賴的。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所謂經濟基礎或生產關係，原來不是別的，就是社會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由誰支配的問題；是生產資料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單個人、集團和階級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的人、集團和階級的問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就是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也就是社會的經濟基礎。

不言而喻，斯大林在語言學著作中所發展了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學說，對於實際的革命活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當舊中國的反動的國家機器——軍隊、法律等積極地爲舊基礎服務，保護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經濟基礎時，不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不消滅蔣介石的反革命國家機器，就不可能消滅舊的社會經濟制度，不可能使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爲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在這時，中國人民就只有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社會變革的科學規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革命鬥爭，終於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這就推動了中國社會歷史的飛躍發展。

隨着舊基礎與舊上層建築的消滅，在中國建立了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基礎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由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爲領導的五種經濟成份，構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以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作爲中國人民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符合於人民利益和爲人民利益服務的道德、文學、藝術及其他觀點與制度等等則構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

把斯大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學說的某些重要原則應用於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和主要問題上，其意義便是如此。

（摘自「光明日報」六月二十日）

學習戰鬥的巴甫洛夫學說

丁瓚

蘇聯偉大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學說的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近代自然科學——特別是在生物科學上繼米丘林學說的又一次光輝的勝利。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把醫學科學從十九世紀以來就統治着病源學、醫療學的微耳和的狹隘的學說中解放出來。

巴甫洛夫用在個體生存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條件反射的事實，說明了個體如何與周圍環境發生交往的過程。這就爲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提供了科學的解釋。在這一點上，巴甫洛夫堅決地擯絕了生機或活力等虛妄的唯心論概念，而是強調了大腦半球所產生的條件反射的物質概念的。關於獲得性的遺傳，巴甫洛夫也是相信主動改變神經系先天性特點的可能的。

從貝考夫、松尼克的「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朋達寧科的「研究巴甫洛夫生理學的哲學基礎」、斯切方采夫的「蘇聯生理學的成就」等七篇論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巴甫洛夫的卓越貢獻，已經使近代生物科學起了新興的前進的變化。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四日在莫斯科舉行了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的聯合會議，並且公布了使巴甫洛夫學說進一步發展並加強其與實踐的聯系的正確決定以後，蘇聯科學家們在巴甫洛夫學說的研究方面又有了不少新的收穫。

我們今天是生活在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工人階級爲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之中，我們的思想——包括自然科學工作中的指導思想，就必須是以工人階級思想——即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爲領導的。巴甫洛夫學說正是這種正確思想在自然科學工作中的具體的體現之一。我們首先必須批判我們自己長期地從英美資產階級科學思想所受的那些錯誤的影響，特別要克服那種錯誤的客觀主義的態度，確立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爲我們從事自然科學工作時的指導思想，那才能使我們認眞地學習蘇維埃科學的先進經驗來提高我們的工作水平，祇有這樣的來學習戰鬥的巴甫洛夫學說，才能使我國的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的科學工作前進一步。

（摘自「科學通報」三卷五期）

向米丘林學習

周建人

達爾文的學說不是全部正確的。有正確的部分，也有錯誤的部分。達爾文學說的正確部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已被折磨得幾乎祇剩痕迹。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却繼續發展着。米丘林把達爾文學說的錯誤部分去掉，而發揚和

充實其正確部分，成爲「創造性的達爾文學說」。

米丘林掌握了辯證法的一切東西皆不永恒存在的一般原理，掌握了大凡生物因受外界生活條件的影響得來的新性質都可以遺傳的原理，並且進一步掌握了控制植物、改造自然的方法。

他認爲生物體和環境是一個整體，不能分離的，所以外界條件對於生物體的諸性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是說：外在之物，吸收入體內，變成爲內在之物。但這內在之物不是常住不變的。它還是變，並且分化爲個單的物質，排洩到外界去，轉化爲外在之物。生物體和環境的關係可知是密切的。又如陽光、空氣、溫度、濕度等許多生活條件，無不影響生物形體的構成，即各種性質的形成。

可以斷言，生物是在變異的。但是生物有變異，同時也能遺傳，因爲有遺傳，所以能把變異的性質鞏固下來，遺傳下去。以後再發生變化，再遺傳下去。沒有遺傳的變異是不可想像的。正如沒有停留的移動一樣不可想像。

生物體的生活過程中，存在着變異和遺傳這一矛盾，從短暫的時間來看，好像變化並不顯著。但如從長期的歷史來看，變化是顯著的。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論」一文中所說：「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爲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生物體的變異和遺傳的矛盾也是這樣。

米丘林認爲改變生活條件是可以使生物體發生變化的，但是因爲生物的遺傳性又有保守性即穩定性，所以爲了易於改造（或稱爲教育），使它能達到人類所需要的目的，須要把它的穩定性變爲不穩定。他常常採用營養雜交及有性雜交等方法來達遺蹟。拿有性雜交來說，有性雜交所得的雜種，遺傳性就不大穩定，容易適應不同的環境了。它的可塑性就大些，容易改造些。米丘林認爲雜交使生物的遺傳性的保守性變爲不穩定，因此可以改造它。有這等方法和原理，就有了改造自然的信心。

我們向米丘林學習，不要僅僅祇學習他的技術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學習他的工作和思想方法。就是更要學習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樹立全心全意爲勞動人民服務的工作精神。自然科學者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非常之必要；克服從舊社會裏帶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思想（如果存在着的話）非常之必要。

列寧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

（摘自「人民日報」六月七日）

馬卡洛娃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天才地預見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需要經過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一預見，已由列寧和斯大林發展成爲關於過渡時期的完整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的發生與發展的重要規律性。

過渡時期的經濟特徵，就是它具有數個結構，這些結構中，在大多數國家裏都是小商品農民經濟佔着顯著的地位。過渡時期的複雜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保留商品生產以及利用商業、貨幣和價值法則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建設中利用商業和市場的政策，在我國稱之爲新經濟政策。

列寧斯大林的新經濟政策學說，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構成部分。這個學說決定着在過渡時期的複雜經濟結構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的手段和方法。

列寧根據經濟結構的複雜的性質，得出了結論說過渡時期將發生尖銳的階級鬥爭。他根據對於過渡時期經濟所進行的分析，科學地論證了過渡時期的基本問題，是按「誰戰勝誰」原則進行鬥爭的問題。

爲了從複雜的經濟結構過渡到社會主義成分佔統治地位上去，必須利用市場、商業、貨幣等管理經濟的方法、形式和方式。市場、商業、貨幣雖然是資本主義制度遺留下來的，但在政權和經濟命脈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的情形下，它們是會爲社會主義服務的。

爲了使各種形式的商業——有組織的（國營的、合作社營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和無組織的（農民的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服務，需要具備一個極重要的條件，那就是要由蘇維埃國家來掌握整個商業的發展。

由於准許有商業，在國營企業裏也必須要改變組織方法和管理經濟的方法。大工業企業的過渡向經濟核算制，是與過渡向新經濟政策有聯系的。

在過渡時期的條件下，在容許有商業、市場、發展商品貨幣關係的情形下，各種形式的合作社起着很重大的作用。合作社，能夠把農民的個人商業的利益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新經濟政策在其發展中，經過了幾個階段。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緊接着國內戰爭後的階段——，這是恢復時期。在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積蓄了力量和資金，引導國家走向了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工業化階段。

新經濟政策的最後一個階段，意味着社會主義展開全綫進攻，以及由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過渡向肅清資本主義成分。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就是國家進入社會主義時期，這時社會主義部分已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一切槓桿。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

（摘自「計劃經濟」第三十九期）

Г・柯茲洛夫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指出，「貨幣是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經濟那裏拿到自己手裏來適應社會主義利益，盡量擴展蘇維埃商業，藉以準備條件去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的一種工具」。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直接強調了蘇維埃廣布的意義，認爲它是加强經濟核算制和鞏固城鄉經濟聯系的極重要的槓桿。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執行什麼職能？

首先表現爲價值尺度，即體現於商品中的社會勞動的尺度。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計劃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經濟必然性，因此，商品價格以貨幣來表現，主要是用有計劃的規定物價這種方法的。貨幣之所以能夠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只是因爲它本身就是具有價值的勞動產品，它是貨幣商品。黃金從歷史上就起着這種作用。

蘇維埃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藉助於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可以對蘇維埃國家商業週轉情況進行一種特有的檢查。我們商業機構工作得愈好，商品賣得就愈快。作爲流通手段的蘇維埃貨幣，可使我們廣泛開展集體農莊貿易，這對於更好地滿足城鄉勞動者的物質需要也有重大的意義。保證蘇聯通貨穩定的，首先是國家所掌握的大批商

品（不僅是黃金儲備）。蘇維埃通貨的穩定要求有計劃地調節貨幣流通，要求貨幣的數量符合於貨幣流通規律所決定的流通的需要。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執行儲蓄和預備金的職能。在我們這裏勞動者的儲蓄是廣大人民羣衆日益富裕、物質生活日益提高的結果。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保證國家預算中的收入經常超過開支，使國家能有系統地年年建立起大量的預備金。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也發揮支付手段職能。

既然蘇維埃貨幣有一定的含金量，它也就能執行並且在一定範圍內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它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新的世界市場上起着價格標準與清算手段的作用。

利用經濟規律來有計劃地管理整個國民經濟，擬定商品流轉計劃，編製貨幣收支對照表和國家銀行的信貸計劃與出納計劃，這一切，就是蘇維埃貨幣制度的優點和特點，這些優點和特點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摘自「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五號）

論會計核算的階級性

馬洛

關於某些經濟科學的階級性問題，直到現在，在我國某些知識分子中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因而他們還在散佈着這樣的論調，說什麼許多經濟科學沒有階級性，這些科學的內容在任何社會經濟形態中都是不變的。

不僅會計核算的方法和技術，連其內容以及目的和任務，在一個社會制度被另一個社會制度所代替的時候都是不變的。這是完全錯誤而又十分有害的論調。這種論調不僅是在替資本主義會計的原則和組織辯護，而且是要在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提倡保存這些原則和組織。其實，祇有那些不知道這門科學的發展歷史的人，祇有那些不瞭解會計在階級社會中所起的作用的人，才會否認會計核算的階級性。

事實上，會計在其以往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中曾是人剝削人的工具之一。它從發生的時刻起，就一直被統治階級用來監督所得收入的數量和用來尋找可以增加這些收入的方法。這時，擺在會計面前的任務不僅是要查明企業佔有者所得收入的數量，同時還要將這些收入表現爲不是剝削的結果，而是由於佔有者對自己企業所貢獻的「勞動」而得的報酬。

起初，還在古代時候（二三千年以前），就在皇宮中以及在教堂中和大土地佔有者那裏實行了核算，依靠核算來觀察這些經濟所具有的財富，觀察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在中世紀末葉（十四——十五世紀），由於生產力顯著的發展，引起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成長，使核算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改善。這時，核算已開始按照一定的制度來處理；這些制度，在會計方面最早的一些著作中曾經叙述過。必須指出，在這些著作中不僅沒有掩蓋會計核算的階級性，反而把它公開地强調出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會計核算向保護新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方向發展了。在這裏，它實現着鮮明的階級職務的作用，成爲各個單獨企業的核算，成爲企業佔有者所必需的並且爲他服務的核算。擺在資本主義核算面前的主要任務，是要顯示出資本家所得到的利潤。藉會計核算的幫助，資本家可以尋找新的方法，提高對工人剝削的程度，來增加利潤。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會計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於是開始出現形形色色的會計核算理論。這些理論並不是對於會計內容進行深刻的研究，而祇是企圖爲會計上的一些主要方法尋找根據。

當資本主義制度被社會主義制度或新民主主義制度所代替之後，會計的目的和任務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新的制度中，核算不應該服務於少數剝削者的利益，而應服務於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利益，應該幫助着顯示出所發生的各種過程的本質，而不是掩蓋它們；應該指出改善勞動人民物質生活的道路，而不是使其惡化。

在新的制度中，核算的本質、目的和任務，和資本主義時期比較是有着那樣急劇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也會使核算的形式和技術在短期間內發生變化。蘇聯的經驗就證實了這一點。在蘇聯，會計已經逐漸取得了祇爲社會主義核算所特有的那種特殊的形式和技術。

毫無疑問，我國政府的有關領導部門在建立會計核算這方面的進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根據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要求，按照核算在國營企業中所應負的任務，而製訂出能充分擔負起這種任務的核算形式和技術。

（摘自「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四日）

對資產階級地理學理論的批判

巴達耶夫

地理科學也像其他的知識部門一樣，被帝國主義的統治上層用來替他們的卑劣與血腥事業辯護。資產階級地理學者儘量曲解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的野心，替帝國主義對大多數人民的剝削做辯護，甚至爲愚昧與無人性的大量屠殺做辯護。

資產階級學者所散佈的反科學理論的醜陋的花束是由以下這些學說構成的，如：地理環境決定論、種族主義、地理政治學、全球地理學、馬爾薩斯學說等。

所有上述資產階級的學說都是從社會現象是服從於自然規律的論點出發的。

自然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眞實作用是由歷史唯物主義所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證明社會是不可能服從於自然規律的。在人類社會中有其特殊的社會規律在起着作用。

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爲社會現象是服從自然規律的。顯然，這一學說是被資產階級學者故意用來替帝國主義對別國領土的侵略做辯護，替金融寡頭的汚穢事業做辯護，是爲了麻痺殖民地的人民並奴役他們。

虛僞的種族學說的本質是在於用人類的生理特點來解釋社會現象。這一類說法的根據是成見，其目的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野心的。

「全球地理學」一詞是美國的資產階級地理學者爲了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捏造出來的，是世界主義的一種變相，是美國獨佔資本的思想武器。

地理政治學是資產階級政治地理學中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的代表者企圖證明，國家的政策不是決定於經濟條件，而是決定於地理條件。地理政治學不僅是以帝國主義無限擴張做基礎的僞科學，它在本質上是英美統治集團的現代軍事政治戰略，其基本目的是準備挑撥反蘇與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戰爭並建立英美對全世界人民的獨佔統治。

馬爾薩斯的學說，顯然與實際存在不相符合的，但美

國地理學者却把這種學說大肆宣傳。馬爾薩斯的高談闊論祇是帝國主義者用來爲他們對人民的獸行做辯護的。馬爾薩斯者徹頭徹尾是人民的敵人——黑暗勢力。

中國地理學者偉大而光榮的任務是批判地改造地理學的著作，清洗這些著作中的資產階級理論並著述有價值的、具有豐富科學內容的地理書籍。

（摘自「地理知識」一九五二年四月號）

我們是怎樣對資產階級思想作着堅決鬥爭

——廈門大學「三反」運動中的教師思想批判總結

王亞南

資產階級思想的本質表現：1，唯利是圖、剝削人民、損人利己、假公濟私、投機取巧。2.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宗派思想、狹隘民族主義。3.鋪張浪費、享樂至上。4.客觀主義、僱傭觀點、名位思想。5.超階級、超政治的純技術觀點。

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高等學校教師中的具體特殊表現：1.帝國主義長期統治下的物質文明崇拜和歐美崇拜。2.不關心政治的純學術觀點。3.不知道把蘇聯和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本質區別開來的狹隘民族主義及買辦思想。4.强調從技術上求得改進的改良主義傾向。5.把一己名利地位看得極其重要的個人主義觀點。6.個人主義擴大的本位、地域、宗派思想。7.不關心公物，對人民事業也表現得非常冷淡的僱傭觀點和作客思想。8.只圖自己方便，不顧同學需要和學習水平的不負責任的教學態度。9.充分顯得理論脫離實際的洋八股式的教條主義和毫無批判能力毫無原則的經驗主義。10不過問校務，不重視系務，不習慣集體組織生活的自由自在思想傾向。11過份抬高自己，壓低別人的自高自大思想。12相當强烈的享樂要求，腐朽生活和假公濟私的貪汚思想。

我們學校兩百多位教師在領導檢查及普遍檢查階段顯出的典型，一共有四十位，他們分別成爲以次六種思想的擔當人物：

一、買辦奴化思想　這種思想的典型，有的竟表現到了忘懷自己是中國人，或不甘心做中國人那樣的突出程度。

二、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思想　這種思想的典型，差不多在各單位都可以找到的。

三、享樂腐化墮落思想　這種思想的典型人物，簡直腐化墮落到了令人難於置信的程度。

四、自私自利，只顧發財，不管教學的唯利是圖思想不只一面當教員，一面做買賣，還要到處找「外快」。

五、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教條主義和天才教育思想　大概强調天才教學的，都是脫離羣衆、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受了天才教育意識的毒害，就不可能好好爲人民服務。

六、分別由官僚政客惡霸作風或買辦法西斯行爲所混合表現出的反動思想　封建惡霸式的官僚政客行爲，買辦兼法西斯的反動行爲，今天雖不敢明目張胆的表現出來，可是那類思想，還顯然是很深蒂固的存在着。

通過這些典型，使我們明確了：一、所有這些典型，通是受着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都是可能而且必然會相伴存在的；二、任何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或其派生物變形物，都是不會孤立的表現着的，它們之間，不但是相通的，有的是可能相互轉變的，並且在各個主要的突出的典型周圍，必然存在着不少次要的沒有顯著表露出來的同類意識思想形態。

我們的教師們，在「三反」檢查階段所揭露出來的許多缺點，特別是教學上存在的問題，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在學習過程中，沒有分辨出眞科學假科學，沒有把科學眞理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好好區別起來。

我們要認清，要批判，要洗脫資產階級思想，要使自己名符其實的變成工人階級，具有工人階級的思想，就要不斷認眞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學習當中，隨時要聯系自己的思想狀況，隨時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對於所接觸的事物，所發生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所研究教學的科學知識，必須用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衡量。在思想生活上，在思想方法上，逐漸把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建立起來了，那對於資產階級思想毒菌，就可能保有極大的免疫力量。

（摘自「新廈大」第三十五期）

「國家與法律的歷史」

蘇聯M・尤利斯頓特著

該書主要論述下列諸問題：（一）馬克思、列寧論國家與法律的起源與本質的學說；（二）國家與法律的歷史發展；（三）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是歷史上最高類型的國家；（四）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五）資產階級關於國家起源的幾種理論的批判；（五）國家與法律是怎樣發展的？（七）國家類型和國家形式的歷史概念；（八）奴隸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國家與法律的簡明分析。

該書特點就是作者應用具體的國家與法律的歷史材料，結合斯大林同志在研究語言科學問題上，證明了經濟基礎和各種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該書綜述了全部社會史就是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國家與法律底歷史和整個社會史是分不開的。任何個別的、孤立的國家與法律底歷史是沒有的，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產生了國家。而法律是以國家的存在爲前提的。馬克思的國家與法律史科學正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

本欄介紹的國外期刊，祇能限於最近收到的各期。由於篇幅的限制，對於各期的重要學術論文，祇能作簡要的介紹。

——編者

蘇聯·「哲學問題」雜誌

一九五二年　第二期

「哲學問題」雜誌爲了紀念列寧發表「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一文第三十週年，本期特別發表了一篇社論。作者指出，列寧在這篇文章中，全力揭示了辯證唯物論對無產階級專政下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列寧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正當布爾什維克黨剛剛完成了從軍事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在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開展恢復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規模工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改變了鬥爭方法，而且更加積極了。美、英、法、日干涉者在公開的戰鬥中失敗後，妄想用經濟封鎖的壓力來扼殺新興的蘇維埃共和國。破壞分子和暗害分子們根據帝國主義偵探機關的指示，在國內積極展開活動。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敵人，聯共（布）黨內的反黨分子（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進行了反對列寧黨的鬥爭。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據聯共（布）黨中央的提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旗下」雜誌，列寧的「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一文，就發表在這個雜誌的第三期，決定了雜誌的工作綱領、蘇維埃哲學家的工作綱領，並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中新的有價值的貢獻。

社論繼續指出，列寧的這篇文章也決定了哲學雜誌和蘇維埃哲學家的工作方針和路綫。列寧鼓舞了蘇維埃哲學家和蘇維埃物理學家，堅決地反對唯心主義哲學。列寧的這些指示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哲學戰綫上思想鬥爭的基礎。列寧特別注意於研究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他要求研究辯證法時以自然科學方面的最新成就爲基礎，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概括爲基礎，以勞動人民大衆革命解放鬥爭的經驗爲基礎。研究唯物辯證法的一切原理和範疇是必要的，而現在有重要意義的，是了解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建設新生活的過程，資本主義國家解放運動的過程。

作者堅定地指出如果對唯物辯證法缺乏研究，唯物論是不能成爲戰鬥的，進攻的。所以根據共產主義的建設經驗、根據自然科學成就的概括來研究唯物辯證法，乃是蘇維埃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列寧對蘇維埃哲學家研究歷史唯物論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務。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繼續深化，歐洲許多國家中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爲歷史唯物論問題哲學的概括和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本期除開轉載了斯大林同志對美國報紙編輯所提問題的答覆外，並且發表了以下重要論文：（一）意見的爭論和批評自由是先進科學發展的最重要條件（M·T·伊奧夫楚克）、（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基本特徵（Φ·B·康士坦丁諾夫）、（三）論蘇維埃社會中矛盾的本質問題（B·E·科茲洛夫斯基）、（四）論發展過程中由舊質狀態過渡到新質狀態的路綫（B·M·加干諾夫）……。

蘇聯·「計劃經濟」雜誌

一九五二年　第二期（三—四月號）

蘇聯「計劃經濟」本期發表了以「重新減低日用品零售價格」爲題的一篇社論。社論寫道，戰後時期第五次減低國家零售價格，是偉大斯大林對提高蘇聯人民物質幸福和文化水平的顯明表現。減低物價百分之十至三十，是大量提高蘇聯全體人民實際收入和幸福的源泉。這次減價推廣到出版物方面，也包括教科書在內，這就有助於廣大城鄉羣衆更進一步地提高文化水平。有系統地減低零售價格的基礎，是蘇聯工農業生產方面的成就，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和生產品成本的減低。這些特點顯然向全世界表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優點，以及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比的優越性。社論繼續指出，正當蘇聯奉行始終不渝的和平政策，不斷擴張民用品生產，實現規模宏大的水力發電站和灌溉系統的建設，實行徹底減低物價政策、系統提高勞動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的時候，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營壘裏，却實行着瘋狂的軍備競賽，無止境地增加稅捐，提高日用品價格，失業增加，實際工資跌落與工農職員生活水平下降。第五次減低物價中人民所獲的純益高達二百八十億盧布。蘇維埃盧布因此更加鞏固，而盧布的購買力也予以提高，職工的實際工資大大增多，集體農民取得巨額利益，領取養老金和津貼的人的地位大加改善。

社論認爲蘇聯重新減低零售物價，乃是蘇維埃國家徹底維護全世界和平事業，加强國際合作愛好和平政策的顯明表現。社論在結語中說道：蘇聯人民以新的生產高潮、以爭取提前完成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計劃而開展社會主義競賽，以進一步加强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威力的鬥爭中新的勞動業績，來報答黨和政府增進勞動人民福利的關懷。

本期重要論文，還有：（一）改善基本建設的設計工作、（二）一九五二年的國家預算、（三）充分利用工業生產能力的後備力量、（四）爭取煤油業更進一步地提高、（五）機械拖拉機站是社會主義農業高漲的新動力、（六）蘇聯的住宅建築、（七）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成就。

蘇聯・「國家與法律」雜誌

一九五二年　第三期

本期發表了科學院法學院士A・Γ・莫若罕納的「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對國事犯進行鬥爭」一文。作者首先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爲蘇聯紅軍所解放的歐洲各民族，創立了人民民主國家，實現了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屬於人民。大工業、交通運輸和銀行屬於國家。領導力量是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各勞動階級的聯盟。

作者闡明人民民主國家的刑法，具有保護和鞏固人民國家的任務。它保證同那種侵犯工、農、知識分子各階級的利益，侵犯人民民主法律秩序，侵犯人民身體自由和財產權的行爲作鬥爭。

人民民主國家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極其猛烈的，因爲反革命分子的階級利益和人民大衆的共同利益是根本矛盾的，他們對於舊制度、舊社會依戀不捨，所以想盡方法來維護舊制度，破壞新制度，抵抗不了，就設法拖延或假裝應付，公開不能活動，就秘密活動，搞特務，搞暗殺，一旦有機會則企圖復辟。所以這是一場長期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決不能麻痺不仁，否則政權就要動搖，國家就會受到損害。

現在，歐洲人民國家都建立了人民軍事法庭，這種法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用嚴厲而公平的刑法來對付反革命罪犯。

著者最後指出，歐洲各民主國家在現階段，主要的是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嚴厲鎮壓統治剝削階級。這樣人民的政權才能鞏固。列寧曾指示我們：「法院的首要任務，就是反對敵對階級的復辟。」所以每一個司法工作人員必須不屈不撓地同國事犯進行鬥爭，使用人民的法律，嚴厲懲罰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走狗、間諜、破壞分子、以及其他洩漏國家秘密的罪犯。

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

一九五二年　第八期、第九期

第八期發表了A・阿齊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文。作者寫道：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世界各國工人與勞動者爲消滅一切剝削制度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過程中緊密地團結起來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政策。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所處的實際地位，就構成了產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方面，資本的力量日益壯大而成爲一種國際的力量；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隊伍也隨着生產力的提高、資本的集積和集中而迅速增大。在各個國家中迅速增大的無產階級力量，必將進而成爲國際的力量。而且，歷史也要求它成爲國際的力量。列寧指示我們說：「資本成爲國際的力量。爲着要戰勝它，必須要有工人的國際聯合，工人的國際友誼。」

資產階級正以一切方法來破壞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他們一手製造的狹隘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事實上會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起着破壞的作用。今後我們必須加強兩條戰綫上的鬥爭。一方面，反對狹隘民族主義，這主要是資產階級在落後國家中提出來的，其目的正在於模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破壞世界無產階級的團結，以求擊敗國際工人運動。另一方面，要堅決反對沙文主義，因爲，如果民族壓迫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與殖民地附屬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並無二致。他們之間可能而且絕對必須建立起統一戰綫，爲粉碎帝國主義的壓迫，自求解放，而共同努力。

作者最後指出：無產階級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必將形成一股無往而必勝的力量，這力量將在全世界範圍內擊毀資本主義的統治，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創造條件。

此外，本期的重要論著還有Γ・柯茲洛夫所寫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

第九期刊載了毛主席的「矛盾論」的前半部。另有的重要論文爲B・切帕拉河夫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寫道：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基本法則之一。在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在不同的階段，它的表現則不同。在資本主義的上昇時期，各國的經濟發展還比較平穩，落後國家要經過較長時期的努力，才能趕上先進國家。同時，世界尚未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還不一定能導引到世界規模的武裝衝突。而到帝國主義時代，情況就大爲不同。先進國局限於原有的陳舊設備，發展極緩。而落後國家則由於應用了最新的技術設備等條件而迅速地趕上甚至超過了先進國。於是，不斷改變着的各國實力對比，就不斷要求着世界市場的再分配。但這時世界已經瓜分完畢，各國間的愈益尖銳的矛盾，就終於釀成了武裝的衝突。

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發展，就愈來愈不平衡，而資本主義世界又比戰前更爲縮小。因而，發展得快的國家，就進而奪取發展得慢或停滯不進的國家的市場。這樣，也使得各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就迫使帝國主義國家加強剝削本國工人農民與殖民地附屬國的廣大人民，從而更加深了統治階級與本國工農以及殖民地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這就是戰後各國工人運動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的基本原因。

英國・「共產黨評論」雜誌

一九五二年　四月號

本期刊載了C・阿爾的「中東在前進中」一文，該文綜述了一年來中東國家，從北非的蘇丹直到中亞的伊朗，反帝鬥爭的形勢。該文說：中東的局勢對於英帝國主義來說是十分黯淡的。無怪乎壟斷資產階級的喉舌泰晤士報在回顧一九五一年時也不得不承認「中東的政治形勢在一九五一年中遭到沒有間斷的並且沒有一國能例外的破壞」。埃及的人民，在今年三月間納哈斯政府垮台之後，面臨着恐怖統治，成千的工人被逮捕了，但是蘇彝士運河區的工人仍拒絕復工，他們知道工作就是爲了加強帝國主義力量和戰爭準備。這些人儘管被「經濟學家」、「泰晤士」等反動報紙稱爲「叛民」、「烏合之衆」，他們大多不會讀書不會寫字，但在反帝和爭取和平的雙重鬥爭中卻表現了在西方先進國家中所少見的政治覺悟。

蘇丹的人民積極支援埃及人民的鬥爭。今年二月五日在卡爾通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新成立的蘇丹工會已申請加入世界工聯會。落後的約旦有二萬二千多人在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上簽名，對於大部是游牧性質的約旦人這是很驚人的數目。在伊拉克也有二萬一千人在和平公約上

簽名。

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在伊朗問題上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摩沙德政府不敢接受美國的條件，這並不因摩沙德其他伊朗的政府領袖是反帝的，而是因爲伊朗人民決心要驅逐帝國主義。摩沙德本身不得不濫充伊朗民族利益的保衛者，一面與英美妥協，一面又不得不向人民讓步。伊朗人民的自由解放運動是這樣的蓬蓬烈烈，以至現在的政府至今還不敢公開與帝國主義簽訂賣身契約。

中東的反帝鬥爭是很艱苦的。因爲在中東英帝已有一百年的統治，更駐紮有英國軍隊。但是中東的人民不願意戰爭，不願意永遠做帝國主義的奴隸。人民正在前進，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他們爭取獨立和平的鬥爭。

本期還刊載了愛彌兒・班斯的「科學、藝術與上層建築」、傑克・華地士的「國際友好是英國的傳統」等論文。

英國・「勞動月刊」

一九五二年　四月號

本期社論號召英國人民加強團結展開一個全面動，共同來爭取一個進步的新綱領，並在這新綱領的上選舉新的政府。社論強調指出：只有團結，共同來推進這樣的運動，才能轉變英國的世界地位，開闢經濟和社會徹底改造的道路。爲了這樣的目的，凡是關心英國目前局勢的階層，儘管政見不同，思想不同，但在制止第三次世界戰爭和維護英國民族獨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目標之下，就有了團結合作的基礎。毫無疑問，有了這樣的團結合作，就能在工人運動中爭取到大多數的人，而使那些依附保守黨和美國財閥和戰爭販子的右翼領袖孤立起來，以便打敗保守黨。

本期還登載了亨利・帕希爾的「自由貿易還是限制貿易」一文。文中對於英國的經濟現狀及其前途有所論述。作者說：英國的經濟是不適於在貿易戰線上進行「冷戰」的。英國要想生存，就必須向能以物資、糧食和原料供給英國人民需要的世界各地區進行貿易。事實證明，爲了挽救英國的經濟危機，只有衝破美國的經濟封鎖政策，而與社會主義世界進行貿易。關於這一點，英國的工業家、經濟學家，甚至右翼的領袖們都很清楚。所以，我們不難了解，爲什麼在英政府的[illegible]壓之下，仍有許多工業家和經濟學家都希望到莫斯科參加這次的國際經濟會議。

提到蘇聯的經濟政策，作者說，蘇聯的經濟政策一向是願意與任何國家進行和平貿易的。蘇聯從未違背過商約。所以，在今天的世界，能在莫斯科簽訂一個貿易協定就是一筆最安全的投資。

同期還載有黎歐得的「我們怎樣開始鬥爭」、伯奈爾的「利奧那多・達・芬奇」、易溫斯的「里斯本北大西洋公約各國會議及會議以後」、斯特拉瑟的「細甸在前進中」等重要論著。

世界科協執委會舉行會議

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於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在維也納舉行會議。會議由協會主席約里奧—居里主持，會議批准了蘇聯高等學校和科學機關工作者工會、波蘭教師聯合會科學組以及匈牙利科學與技術團體聯合會加入協會。因此，協會的會員總數已達八萬四千名，成爲一個眞正的世界性的科學工作者的組織。

會議改選了協會的領導機構，並聽取了中國代表涂長望教授關於美軍在朝鮮和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執委會責成協會主席向協會各國分會發出通告，號召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細菌戰。

經過改選後，協會副主席現包括：貝爾納教授（英國）、李四光教授（中國）、奧巴林院士（蘇聯）、包林教授（美國）和鮑威爾教授（英）。

蘇聯科學院準備印行「通鑑綱目」俄文譯本

蘇聯科學院東方問題研究所東方手稿博物館準備印行著名的中國「通鑑綱目」的俄文譯本頭四卷。這是由上一世紀的俄羅斯學者比邱林翻譯的，但從未刊印。博物館保存了這位傑出學者豐富的文學遺產，他曾耗費了十三年的時間在中國深入而廣泛地研究中國人民的語言、文化與生活。現在正在刊印的比邱林著作的選集中，包括「談中[illegible]義」、「鞏固黃河堤壩」和「論茶」——這些作品都是饒有科學趣味的。

蘇聯出版約里奧—居里傳

蘇聯國家教育書籍出版局最近出版庫茨涅佐夫教授著「約里奧—居里——科學家與和平戰士」一書共五萬册。這本書敘述法國人民的優秀兒子：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的生活、科學活動及爲和平而進行的不倦的鬥爭。

庫茨涅佐夫教授寫道：進步人類尊敬約里奧—居里，不但因爲他是爲科學的眞理而鬥爭的一位學者，同時因爲他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豐富我們對自然界的知識的光輝的實驗家。世界上一般人民都把約里奧—居里做揭穿戰爭販子們的血腥計劃的英勇戰士，把他看做世界各國友好運動的卓越組織者之一。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二一九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毛澤東著作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800元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500元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	900元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000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00元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700元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300元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1,300元
實踐論	1,100元
矛盾論	1,800元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	800元
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700元
反對自由主義	600元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1,000元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1,700元
論持久戰	3,500元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1,200元
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600元
戰爭和戰略問題	1,200元
青年運動的方向	900元
[共產黨人]發刊詞	1,000元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即將出版)
新民主主義論	2,500元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900元
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	900元
論政策	800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09－331)